

## 摘 要

本論文主要以後殖民論述在臺灣現代小說中運用之狀況為研究目的，同時縮小討論範圍，而以陳映真先生與王禎和先生的小說作品作初步分析。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以援引西方後殖民理論（薩依德、史碧娃克、巴巴、法農等）及其他社會學理論（如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等）作為依據，爬梳文本，探討其潛藏的深層意義，即「症狀閱讀」。

章節安排次序首先鋪陳出臺灣後殖民的時空背景，爾後依次討論相關問題：國族主義、本土化與認同、跨國企業與全球化、諧謔語言、陰陽二性的圖象、中產階級與知識份子，以及霸權和東方主義等。研究結論則為歸納二位作家的各個層面（包含人生歷練、所受的文學影響等）以及文本中張顯的意識，並對自二次戰後迄今的臺灣文學走向帶有後殖民意味的部份作一整理，對臺灣文學未來的方向提出個人的看法。

### 〔 關鍵字 〕

後殖民(post-colonial)、陳映真、王禎和、離散(diaspora)、認同(identity)、跨國企業(transnation corporation)、全球化(globalization)、霸權(hegemony)、東方主義(Orientalism)



## 目 次

<b>第一章 緒論</b>	
第一節 前言	1
第二節 研究動機	4
第三節 文獻回顧	5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範圍	6
第五節 論文架構	6
<b>第二章 跨世紀的風風雨雨 簡論理論基礎與背景層面</b>	
第一節 名詞界定及理論基礎	8
第二節 發展背景探論	12
第三節 鄉土文學的興起與影響	16
<b>第三章 且把他鄉作故鄉 論文本政治中的國家認同與族群自覺</b>	
第一節 歷史重建 記憶再現	18
第二節 國族主義、故鄉與省籍情結	21
第三節 本土化 v.s.認同	27
<b>第四章 逐流而不相屬 經濟奇蹟下的表相與實質</b>	
第一節 無孔不入的跨國企業	35
第二節 邊緣鄉村與中心都市的互擬	39
第三節 全球化下的臺灣	42
<b>第五章 魅惑的工具 論文本中的語言意義及性別表徵</b>	
第一節 言語權力和語言使用	48
第二節 此時無聲勝有聲？	56
第三節 性別角色的顛鸞倒鳳	58
<b>第六章 我思故我在 論文本中之階級意識</b>	
第一節 一階比一階高	61
第二節 市鎮小知識份子	62
第三節 社會的良心	64
<b>第七章 強者為王 霸權的建立與東方主義的凝塑</b>	
第一節 抗拒有理？	71
第二節 「霸」氣十足	74
第三節 幽黯的東方主義	77

第八章 結 論	80
參考書目	83

## ??? 僊 嶸

?? 乏 ? 岨

(一)

晚近批評理論的一個重要發展趨勢，即為非西方世界以書寫反擊西方，其目的在於從西方與非西方文化關係的重組中，建構一個有力的「他者」發言位置以批評主導文化。早期後殖民主義最為人所詬病的，是一方面摒棄西方，一方面卻又寄存於西方的文化體系中進行研究；而在當前的後殖民批評中常常看到的，則是以突顯地域「本源」及性別，作為表達文化和政治立場的一席之地<sup>1</sup>。

阿什克羅夫特(Bill Ashcroft)認為「後殖民社會是各從文化對立，轉為以平等地位對待並接受彼此文化差異的世界。文學理論家和文化歷史學者逐漸意識到，建設和穩定後殖民世界的基礎在於『跨文化性』；對跨文化性的共識，可能終止人類被純種迷思所惑造成的互相爭鬥歷史。」<sup>2</sup>

史碧娃克(Gayatri C. Spivak)在對小說進行評論之前，首先提出了文學作品和歷史敘述的異同問題。一般均認為，文學作品是虛構的，而歷史敘述是真實的。然而，傅柯的話語理論卻打破了兩者之間的嚴格界限：由於歷史記載和小說一樣都需要語言來完成，因此兩者都是話語的產物；又由於話語受知識權力機制的操縱，就更使得兩者之間的界限趨近於模糊。而史碧娃克認為文學教師與史學家的取捨仍有所不同：史學家試圖藉由文本的闡述，給予其他階級一個主體地位；而文學教師則透過對文本的解讀揭示出主體地位是如何被分配的<sup>3</sup>。

在後現代時期，「自我」和「他者」的問題代替了東西方對抗的問題。薩伊德透過對東方主義的反思，提出一種後現代的說明：「文化可以表現為一些區域，其中有控制也有放縱，有記憶也有忘卻，有強迫也有依賴，有排斥也有合作，世界歷史上發生的一切都是我們的組成部分。」<sup>4</sup>。「他者」(other)不再只是一個理論概念，而是指涉歷史上被排除的群體和民族，即那些被奴役、侮辱、甚至被滅絕的群體和民族。分裂投射、否認和拒絕等精神分析的範疇，變成了分析殖民和被殖民之間心理 政治關係的方式。

近年來有關後殖民的論述都強調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混雜交織的結構，並調整以種族為中心的純文化視野。當我們承認被殖民者並不能自決自主此一事實時，我們方能檢視在權力支配下，作者們爭取空間所作的努力。

<sup>1</sup> 見陳麗芬：《文學批評與文化身分 周蕾 後殖民 香港》，收於自著：《現代文學與文化想像》，頁1 頁6。

<sup>2</sup> 見廖咸浩：《愛與解構 當代臺灣文學評論與文化觀察》，頁24。

<sup>3</sup> 見曹 莉：《史碧娃克》，頁152。

<sup>4</sup> 見王逢振：《文化研究》，頁104。

(二)

呂正惠教授曾說：

陳映真的理智總是讓他先看出時代的問題，總是讓他走在時代的前面。所以，他最早批評現代主義的知識份子，也最早談論到臺灣的殖民經濟本質<sup>5</sup>。

陳映真於 1976 年的「原鄉的失落」試評《夾竹桃》<sup>6</sup>，是戰後臺灣文壇較早注意到臺灣文學的殖民地性格，甚至可以說，它是最早關注臺灣文學後殖民論述的一篇論文<sup>7</sup>。呂教授又說：

在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聯合出擊的一系列殖民經濟小說裡，我也相信《小林三部曲》<sup>8</sup>是最有價值的<sup>9</sup>。

黎湘萍先生曾說：

這兩部作品（按：指《將軍族》、《唐情的喜劇》），雖然沒有出現目前很時髦的「後殖民主義」、「族群」研究之類的概念，卻是臺灣最早的「後殖民主義」和「族群」研究的典範作品。他的這些作品（按：指《六月的玫瑰花》、《賀大哥》、《文書》及《第一件差事》），是迄今為止臺灣文學關於「記憶」以及「記憶」之政治性、道德性、歷史性等諸多因素相互糾纏影響的最生動的表現。從 70 年代末開始的一系列關於跨國公司之反省和批判的「華盛頓大樓」小說，是當代中國文學最早的反映全球化時代跨國資本及其組織形式對人的異化的小說<sup>10</sup>。

王德威教授說「從存在主義到現代主義，從鄉土運動到後殖民風潮，都可由（陳映真）的作品找到見證<sup>11</sup>。」又說：

賀大哥、纍纍及屬於「華盛頓大樓」系列的「夜行貨車」

<sup>5</sup> 見呂正惠：《從山村小鎮到華盛頓大樓——陳映真的歷程及其矛盾》，收於自著：《小說與社會》，頁 67。

<sup>6</sup> 此文原刊於《現代文學》復刊號 1 期，現收入鍾理和：《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

<sup>7</sup> 見應鳳凰：《鍾理和文學發展史及其後殖民論述》，收於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臺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頁 183；黎湘萍先生亦持相同意見，見《臺灣的憂鬱》自序，頁 21。

<sup>8</sup> 指《小林來臺北》、《美人圖》的兩章。

<sup>9</sup> 見呂正惠：《荒謬的滑稽戲——王禎和的人生圖像》，收於自著：《小說與社會》，頁 88。

<sup>10</sup> 見黎湘萍：《臺灣的憂鬱》自序，頁 20。

<sup>11</sup> 見王德威：《最後的馬克思——評陳映真《歸鄉》及其他》，收於自著之《眾聲喧嘩之後——點評當代中文小說》，頁 185。

上班族的一日、萬商帝君、雲等，白描戰爭及社會不義帶來的創傷，諷刺跨國資本主義強權的嘴臉，及速寫臺灣新興中產階級的物化與虛矯，都有獨到之處。國族主義的辯證不再能滿足他的視野，他毋寧更專注政治殖民主義後的文化、經濟殖民暗潮，還有全球化趨勢下的資本帝國主義競爭。他與彼時興起的臺灣自覺主義運動，顯得格格不入；另一方面，相較年代學界流行的後殖民論述，他反倒開風氣之先了<sup>12</sup>。

黎湘萍先生還提及：

陳映真、黃春明和王禎和都是受評率很高的當代「鄉土文學」作家，而且已經以他們作品的獨創性和思想性，審美性和批判性，為中國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深刻變化留下耐人尋味的豐富的藝術世界<sup>13</sup>。

鄭樹森教授曾說：

（在徵選過程中）最意外的是沒了王禎和與陳映真。難道《嫁妝一牛車》和《將軍族》就這麼輕易完成歷史任務？抑或這些作品反映的臺灣現實，在網路發達、消費掛帥的臺灣，已經過於灰暗<sup>14</sup>？

王禎和受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亨利 詹姆斯(Henry James)等英、美作家的影響，作品有濃厚的地域色彩，講究敘述觀點的運用及意識流的手法：他也受日本小津安二郎寫實派電影的影響，期望將藝術與社會大眾密切結合<sup>15</sup>。因此基於避免遺珠及補全臺灣文學失落的環節，將二位作家之作品置於同一視野來評論，確有其必要性。

（三）

詹明信藉由評論魯迅的《狂人日記》和塞內加爾作家烏茲曼 桑貝內(Uzman Zanbene)的小說《扎拉》*Zala* 指出：「私下個人命運的故事，總是關於公眾的第三世界文化和社會鬥爭形勢的寓言。」<sup>16</sup>。現代小說一向是被視為革命和啟蒙的載體，作為一種社會性的象徵活動，小說所要反映或改造的現實，所投射的有機、前進的時間向度，儼然與家國想像的「大敘事」若合符節。文本不能被孤立

<sup>12</sup> 見王德威：最後的馬克思 評陳映真《歸鄉》及其他，收於自著之《眾聲喧嘩之後 點評當代中文小說》，頁 187 頁 188。

<sup>13</sup> 見黎湘萍：《臺灣的憂鬱》自序，頁 4。

<sup>14</sup> 見鄭樹森：最意外的和最不意外的 「最愛 100 小說大選」揭曉隨想，《聯合報》E7 版，2004 年 3 月 2 日。

<sup>15</sup> 見張素貞：《續讀現代小說》，頁 256。

<sup>16</sup> 見王逢振：《文化研究》，頁 95 頁 96。

起來閱讀，必須放到變動的歷史洪流當中來理解，方能彰顯其意義。但小說真正的威脅，卻是一場「內爆」(implosion)：動機與結果，形式與內容，事件與人物，看似合情合理，內裡的有機關係卻早已四散崩裂，或是更可怕的，從頭起始就被掏空。在精神上失去家園的人，因而成為一個話語的觀望者，站在各種話語的交匯口而超越於獨斷的歷史譜系之外。由這一內爆所顯露的敘事歷史的空虛與空洞，以及因之而生的憂傷、無能為力之感<sup>17</sup>，將他們逼入萬劫不復之地。

在西方左翼理論中，有一個根本性的假設：社會公正、保護弱者是最重要的，可以透過國家或政府的行為實現這個目標。但歷史反覆證明，任何一種理論如果成為霸權，所帶來的結果必然是對不同聲音的扼殺以及整個社會批評意識的弱化。作為一個觀察與研究者，應當以開放的態度，在不完全喪失自己文化獨特性之情況下，承認一種文化可以是一個更大文化範疇之組成部分；超越自己文化的方言語境，成為一種更廣大的文化。

?? 乏 ?? ?

後殖民研究於 1970、80 年代在西方學院迅速勃興，及至 80 年代末，批評潮流席捲亞洲；臺灣於 1988 年解嚴後，原住民、本土主義等問題甚囂塵上，又經歷了不同形式的殖民，因此對於後殖民論述的接受程度不亞於香港及中國大陸<sup>18</sup>。

臺灣現代文學的研究，可以說是在近十幾年間才逐漸勃興昌盛起來；隨著臺灣民主化與本土勢力的日趨壯大、高消費生活型態的養成、社會價值體系的分化多元，以及文化論述的紛起爭奇等，許多先前發表的，或正蔚為創作風潮的文學作品，都被一一以不同的詮釋角度與思考面向加以觀照；而不再如昔日一般，對文學的閱讀往往落於單一而制式的模式，這是文學研究的一大變革。

由西方/歐美中心角度來看待在全球化的發展，很自然的認為在全球化這個大的時代架構制約下，民族或民族國家的角色會被消蝕，而被另一種跨國家、跨民族、跨區域的力量所替代；例如一些跨國公司、跨國組織或是非政府組織。這種經濟全球化的現象，是以歐美為中心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擴張，背後所帶來的便是一種歐美經濟力量的宰制，同時伴隨經濟宰制而來的是一種以西方/歐美為中心的文化宰制，企圖通過民族國家的消融瓦解來達到西方對非西方地區的霸權宰制，讓西方力量跨越非西方地區的民族/國家力量來達到殖民統治的目的；相對於西方的「文化帝國主義」，被宰制的非西方地區也表現出「文化民族主義」的形式以資抗衡。陳映真的一系列關於跨國公司的作品正反映了這個現象，而王禎

<sup>17</sup> 見王德威：《歷史的憂鬱、小說的內爆——李銳的《銀城故事》及其他》（《聯合報》E7 版，2003 年 12 月 13 日）

<sup>18</sup> 見朱耀偉：《誰的「中國性」？90 年代兩岸三地的後殖民研究》，收入自著：《本土神話：全球化年代的論述生產》，頁 253。

和的《玫瑰玫瑰我愛你》等作品則顯現出後殖民的「抵中心」傾向。運用混雜的語言、對家鄉花蓮的關切；我們也可以因之得出論點：臺灣鄉土文學的抬頭，是利用殖民體制的動搖從而恢復對自己土地的關懷。在此以西方文論家理論解讀二位作家作品中所凸顯之後殖民意識，是否會落入了「文化殖民」的窠臼，則不在本研究討論的範圍之內。

本論文的內容在試圖勾勒一個從後殖民論述的角度來分析臺灣當代小說此一類所隱含言外之意的一些構思。立基於前人研究的成果，並作出更具體可供參考之意見。本論文嘗試以另一種途徑顯現文本的潛在涵義，並試圖援引相關的研究成果，如後殖民批評、國族論述、族群研究與性別議題等。惟此類外部學說理論的選擇與援用，仍力求建諸於文本的適切性與否，而非妄加套用，因而導致詮釋的謬誤。在章節的安排上兼顧橫向切面與縱向脈絡，探討重心則置於小說中所呈顯或隱諱不明的意識；故採用精讀策略，對情節的來龍去脈不作述說，截取論述部分再加以統整匯合，保有讀者閱讀文本的想像空間。

#### ?? 乏 ??? 咖研究範圍

盧卡奇(Georg Lukacs)在《小說理論》中指出：「*小說是十分成熟的藝術形式，因此，小說世界自有其完整性。*」<sup>19</sup>小說的風貌可以反映人心，指向社會脈動。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則提到對抗霸權有兩種資源：殘餘(residual)的記憶與浮出的(emergent)文化，小說（尤其是政治小說）恰巧符合了後一點。文學研究者可以通過特殊的觀察角度、視野範疇、研究方法，以及運用研究者本身的人生體驗、審美觀點、個人思想觀念，甚至時代文化背景的不同，對小說客體作出富有創造性的闡釋與開拓。

倘若對陳映真及王禎和小說的評論文章做一番審視，不難發現其中大部分都是不太合學術規格、推介式或報刊式的簡評。此外，讀後感的文章以及純粹採取印象批評的文章也為數不少，在深度上都略嫌不足。本研究即試圖為二位作家小說中所隱含的意識思想建構某種程度的批評理論依據，以此作為臺灣現代文學研究的新的試探。

另外，本研究所欲採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獻分析法，即將各有關重要著作與單篇論文加以比較、歸納、分析及綜論，抽出其重要及有關的精華部分；再配合論述的需要加以整合、潤飾與建構，以達到全面的審視。在文學理論上援引後殖民論述（以霍米 K 巴巴(Homi K. Bhabha)、*弗朗茲 法農(Frantz Fanon)*、*愛德華 W 薩依德(Edward W. Said)*等為主），對原著進行「*內緣研究*」(Intrinsic study)的工作。同時再配合「*外緣研究*」(Extrinsic study)的部分，以作家身處的社會環境、面對的時代思潮等客觀因素為探討目標，追溯作家反映在小說文本內的痕跡；經由作家和作品的交叉探索，建構出深層的詮釋意義。

<sup>19</sup> 見 Georg Lukacs：《小說理論》，頁 44。

本論文未來將以臺灣地區作家所創作之華文現代小說為大範圍，目前處於嘗試階段，先就陳映真與王禎和二位作家之現代小說作品為主。陳映真作品以1959-2001年為範圍，王禎和作品則以所發表過之小說（1961-1985年，《兩地相思》因未完至第8章為止）為主要探討標的。所探討內容涵蓋後殖民論述之相關主題，但各章節並不一定論及全部文本，而以較明確之文本內容為對象，作深入淺出的論述。

?? 乏 ????

有關臺灣現代小說中後殖民論述的著作有以下幾本：邱貴芬教授著《仲介臺灣：女人 後殖民女性觀點的臺灣閱讀》、張京媛教授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周英雄、劉紀蕙教授編：《書寫臺灣 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及陳芳明教授著《後殖民臺灣 文學史論及其周邊》等。至於學位論文僅曾萍萍 陳映真小說與後殖民論述，其他如蘇慧雲 紅色的執著與白色的焦慮 陳映真及其小說研究、羅夏美 陳映真小說研究 以盧卡奇理論為主要探討途徑 及管永仲 陳映真小說主題研究，關於王禎和作品研究僅有李宜靜：王禎和小說研究及呂文翠：狎昵故鄉 王禎和小說研究、蔡碧華 從社會語言學觀點剖析王禎和的小說「玫瑰玫瑰我愛你」等。

羅夏美 陳映真小說研究 以盧卡奇理論為主要探討途徑 雖然如其所提陳映真自認為受到盧卡奇影響，並提出一些佐證，但卻因中短篇小說不符長篇理論而討論範圍縮減，前言及第一章第三節重覆，先敘述故事內容，再套用理論，詞句使用稍欠妥當，此為美中不足處。曾萍萍 陳映真小說與後殖民論述 一文為本論文主要參考範本，文中引用法農、薩依德、史碧娃克及巴巴的後殖民論述解釋臺灣當代情境，論述頗見獨到之處；唯有以下幾點尚待商榷：第一，討論範圍至 歸鄉，忠孝公園 因斯時尚未發表，故無論及；第二，認為 加略人猶大的故事 及 獵人之死 涉及信仰與教義，賀大哥 及 六月裡的玫瑰花 內容以越戰創傷為主，亦不予以討論；事實上，較早洞察了國際勢力影響下臺灣的分裂意識的 加略人猶大的故事，借助聖經故事，塑造了在國土分裂狀態下精神苦悶的人物猶大，他游離於狹隘的奮銳黨人和博愛的耶穌之間，錯誤估計了「民眾」的力量，最後在無限的痛悔中自殺<sup>20</sup>，透徹分析了獨立意識萌芽的國際條件和可能的悲劇性；彭瑞金教授認為「書寫越戰後遺症，也就是反美國帝國主義的小說」<sup>21</sup>，誠哉斯言；第三：以分期分篇探討，固有其統整性，但也易流入窠臼。其餘以王禎和小說為研究範圍者，多以傳統論述為分析依據，因此不在此討論。

<sup>20</sup> 見黎湘萍：《臺灣的憂鬱》自序，頁2。

<sup>21</sup> 見彭瑞金：《臺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頁174。

?? 乏 嶸???

本論文共分八章，除第一章前言及第八章結論外，其餘各章安排如下：

在第二章 跨世紀的風風雨雨 簡論理論基礎與背景層面 裡，主要先就「後殖民」及「論述」作名詞界定，及當代後殖民研究者與其研究理論作一概述；第二節則針對臺灣自 1950 年代迄今的政經歷史發展背景，尤以經濟層面為主要呈顯對象；第三節從外緣因素反觀臺灣鄉土文學的興起與影響，並與後殖民理論作一連結及反省。

第三章 且把他鄉作故鄉 論文本政治中的國家認同與族群自覺 中，第一節所要呈顯的是歷史敘述與記憶政治之間盤根錯結的關係：現今我們所認知的歷史其真實可信度有多少，個人的記憶與集體潛意識又是如何連結等問題。第二節則探討國族、省籍情節的發酵反應，故鄉（或原鄉）對不同對象（本省人、外省人）所象徵的意涵等。第三節著重於「本土化」與「認同」的觀念延伸，族群自覺與其他社群彼此間的衝突整合，各族群如何正視本身社會位置的改變，以及「離散」影響社會國家層面的深度等。

第四章 逐流而不相屬 經濟奇蹟的表相與實質，則是因為陳映真從七十年代末開始發表的一系列關於跨國公司題材的小說，就已經敏銳地觸及了全球化資本流動與資本體制下人性異化的實際問題，這不僅是臺灣的問題，而是跨越了疆域限制的全球性「大眾消費社會」的問題。王禎和則以《玫瑰玫瑰我愛你》 小林來臺北 等作品討論相關議題；故本章節即以跨國企業為討論中心，探討二位作者文本中隱含的經濟議題，包括都市化、全球化等。

第五章 魅惑的工具 論文本中的語言意義及性別表徵，主要是以王禎和作品為主，討論文本中「言語」與「語言」的隱含意義，「失語」症狀形成原因，性別角色的互擬與互補等。

第六章 我思故我在 論文本中之階級意識，社會階級意識的逐漸成形，「番易」、「置換」造成階級間的頻繁流動；中產階級的內心孤寂與道德淪喪；知識份子對自我的期許、遭受到的壓力與挫折，均在此章作分析探討。

第七章 強者為王 霸權的建立與東方主義的凝塑，知識份子抗拒強控制體系所加諸的霸權，最終多以失敗收場。「文化霸權」所造成的衝激海浪，正一波波地拍打著臺灣海岸；對於將東方形塑成陰性主體的西方，作家是如何裂解此一神話，還原真面目，此等皆為本章所欲呈顯之重心。

總此，本論文前半以陳映真作品呈顯之國族意識等為探討主體，語言部份著重於王禎和作品使用的策略，其他相關於後殖民論述的議題則二者並行討論。一部好的文學作品固然可反應出多層次面相，但作家寫作所置之重心則因人而異，

此亦為本論文擴大討論主體至二位作家，希如萬花筒般呈現多角度的視野。

?? ? ? 侏? 欵欵楷楷 ? 嶸? 嶸? ? 咖? ? ? 標

?? 乏 ? 峭? ? 咖? 嶸? ?

「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是指歐美資本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冷戰和後冷戰時期，對落後民族和國家在文化價值、意識形態、知識話語、主體構成等方面進行圍剿和滲透的一種帝國主義干涉政策和霸權(hegemony)意識<sup>1</sup>。

後殖民論述重心在於尋求瓦解「帝國主義者主體」(the imperialist subject)。引申義的後殖民論述常見於「移民社群」(settlercommunity)或「帝國移民」(creole)與本土中心(metropolitan center)之間的權力抗爭，且都是以利益分配不均為抗爭主軸（如澳洲與英國或中南美與西班牙之關係）<sup>2</sup>。「後殖民」一詞的「後」字，意謂論述空間上的伸展，而非時間分期上的迭代<sup>3</sup>；後殖民理論家多企圖把歐美中心主義文化的知性關注與方向，發展為全球性的多元文化論述。引進從前被壓抑於殖民主義的堂皇大話語下的邊緣聲音與主體，對於阿里夫 德力克(Arif Dirlik)來說，「後」殖民理論的理想，在於廢除所有把中心與邊緣二元對立的思想模式，讓全球社會還原至他們本來複雜地多元性及偶然性的一面<sup>4</sup>。

「後殖民」的「後」(post)不一定指「之後」，而是由於殖民影響，產生兩種社會文化的接觸，在此一發展中，許多衛生、法律和物質的「理念隱喻」(concept metaphor)，從西方殖民文化傳播到被殖民文化中，雙方在實際執行和接受上有所落差。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提出「殖民戲擬」(colonial mimicry)的論點，被殖民者透過擬仿和陽奉陰違的方式，利用殖民與被殖民者對於當地文化的機制產

<sup>1</sup> 見曹 莉：《史碧娃克》，頁 130。

<sup>2</sup> 見廖咸浩：《臺灣小說與後殖民論述》，收於陳義芝主編：《臺灣現代小說史綜論》，頁 500。

<sup>3</sup> 巴特 穆爾 吉伯特(Bart Morre-gilbert)則認為後殖民的「後」意指種族隔離(apartheid)、瓜分(partition)和佔領(occupation)的終結 已成事實的和即將到來的終結，它同時也隱含著撤退(withdrawal)、解放(liberation)和重新統一(reunification)。見宋國誠：《後殖民論述 從法農到薩依德》，頁 59。

<sup>4</sup> 見 Bill Ashcroft、Gareth Griffiths、Helen Tiffin 著，劉白荃譯：《逆寫帝國 後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譯者導論頁 3。

生某種轉變的過程中，誰都無法佔上風，提出創意的顛覆與可能性<sup>5</sup>。巴巴(Homi K. Bhabha)以解構批評結合班雅明的翻譯理論，分析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交互牽涉的敘事問題，以殖民經驗中雙方所無法控制的謠傳、耳語、無意義的聲音，去切入文化想像與外來文字之間的互動空隙，將論述重心置於刻板印象經驗不斷謔仿過程中所產生的斷裂、分歧、呈顯效果<sup>6</sup>。目前在世界各國中仍有許多新興的殖民勢力，透過跨國公司和環球經濟體制，在許多早期的殖民地裡，繼續利用普及、隱形且更無法抗拒的市場消費進行更進一步的殖民。因此他們認為抗拒是最為重要的，抗拒的機制以及抗拒如何和「以地方為基礎的想像」(place-based imagination)互為聯結，是強調的重心所在<sup>7</sup>。

在 16 世紀，「論述」(discourse)是用來指涉言談與交談的種種形式，後來慢慢轉化為一種形式化的言語行動和敘述，或是針對某些重要課題，作較專門與深入的討論。18 世紀時，「論述」逐漸演變為術語，至 19、20 世紀，語言學家用以指稱比一般句子長的語言單位；但在當代文化研究方面，傅柯(Michel Foucault)對「論述」的本質及意涵作出精闡闡述：「論述」是某種社會知識之特殊領域，一種陳述系統，藉由論述世人可了解、應用現實環境，並進而形成主客之間複雜的權力關係；「論述」中隱含諸多不同系統之規則，透過分類機制、權力關係與知識系統來具體操作，而且權力與知識之間的關係，常經由「論述」進一步深化與傳達。因此在「論述」背後，存在著一種意圖控制他人、建構制式知識且排他性極強的「真理意志」(the will to truth)，由此衍伸可知「論述」與「殖民」和「後殖民」之間有密切的關係<sup>8</sup>。今日的論述本身則成為一種社會活動，麥克唐納(Anthony Macdonell)認為「論述不是個人透過語言表達自我的行動，只有在對立衝突的關係中，文字的意義方能產生，論述方能完成」<sup>9</sup>。

主要的後殖民研究方法，源自政治理論家如弗朗茲 法農(1959,1961,1967)及艾爾拔 門彌(Albert Memmi)(1965)的作品。此方法把其主要特色放在帝國/殖民的辯證意念本身；在此一模式裡，於後殖民地地區內寫作任何類型文本的行動，皆

<sup>5</sup> 王德威將(mimicry)譯為「默仿」，意指殖民地臣民像扮演模擬啞劇一樣，抄襲殖民者的每一特徵，到頭來卻發現自己的模仿只是東施效顰，以局部扭曲的方式再現殖民者的嘴臉；在嘲弄瓦解殖民者的特徵同時，也暴露被殖民者自身之不足。見王德威：《想像臺灣的方法——平路的小說實驗》，收於平路：《禁書啟示錄》序論，頁 19。亦有譯為「謔仿」，認為其往往瓦解了殖民者在屬地複製本尊的能力；引用人類學家陶西格(Michael Taussig)對第三世界模仿第一世界文化事物，每多造成畫虎不成的謬誤，但經此謬誤反而暴露第一世界自我異化的潛在威脅，以及第三世界「借力使力」的動機。更重要的，在此一「模仿過度」(mimetic excess)的過程裡，被釋放出的不只是文明與權力的機制，更是一種始原的、有樣學樣的魔力。見王德威：《異象與異化——異性與異史》，收於施叔青：《微醺彩妝》序論，頁 38 頁 39。

<sup>6</sup> 見廖炳惠：《回顧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論文集》，頁 21 頁 22。

<sup>7</sup> 見 Bill Ashcroft、Gareth Griffiths、Helen Tiffin 著，劉自荃譯：《逆寫帝國——後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頁 198 頁 200。

<sup>8</sup> 見 Bill Ashcroft、Gareth Griffiths、Helen Tiffin 著，劉自荃譯：《逆寫帝國——後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頁 82 頁 85。

<sup>9</sup> 見邱貴芬：《發現臺灣——建構臺灣後殖民論述》，收入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頁 177。

從屬於牽涉著殖民與被殖民者的二元辯證關係下的政治、想像及社會的控制<sup>10</sup>。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有著一種「愛恨交加」(ambivalent)的關係：殖民者的統治會無可逆返的改變被殖民者的文化，同時被殖民者對殖民者的戲仿也對後者的控制進行著不知不覺的顛覆；從這種互涉的關係中，也產生了對於本質主義(essentialism)以及對文化分隔主義(cultural separatism)的質疑(或保留)<sup>11</sup>。門彌認為殖民所造成的最重要傷害，是使被殖民者從他的歷史和社群中被徹底根除，使被殖民者對自己的生活方式、記憶與語言，產生遺忘與憎恨的情緒，因此形成一種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間優/劣、上/下的二元對比。在法農的《黑皮膚 白面具》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 論述中，他認為被殖民者在殖民的屈辱支配關係中，勢必會採取一種自我憎恨與否定的方式，來面對自己；而在生活方式、語言、意識形態和文化表達上，被迫去除自己的膚色，在無意識中盡量採用「漂白化」的方式，因而形構出一種對自我文化與種族的摒棄情感<sup>12</sup>。被殖民者「無論在觀念、社會地位、文化認同甚至自我定位上，其實都是西方白種資產階級殖民者為了統治管理所捏造發明的」，唯有披露被殖民者在膚色、性別、心理各方面遭受迫害的事實，進而逆轉「殖民與被殖民」以及「自我與他者」之結構關係，才能尋求第三世界被殖民者的文化主體性<sup>13</sup>。法農並且認為，民族文化的形成可分為三階段：第一，盲目地模仿征服者的典範；第二，疏遠一切外國事物，出現本土主義(或排外主義)，崇尚本土性，懷念原生事物；第三，與革命相聯繫的「戰鬥階段」，出現一種新的植根於本土傳統而又與本土傳統不同之自我意識文化，在此種文化中，藝術創作者成為其「代言人」<sup>14</sup>。

阿拉伯裔文化理論家愛德華 薩依德在 1978 年推出了他的後殖民主義批評力作《東方主義》*Orientalism*，對歐洲中心主義建構東方他者的帝國主義心態進行了猛烈的批判；從而率先將後殖民主義批評話語推向美國文化政治批評的舞臺。在卷首引用了馬克思的話：「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他們必須被代表。」影射歐洲的東方主義打著所謂代表的招牌，以殖民主體自居，以各種藉口對東方進行本質主義的界定，彷彿只有透過帝國主義話語再現一個「他者」<sup>15</sup>或「異己」方

<sup>10</sup> 見宋國誠：《後殖民論述 從法農到薩依德》，頁 31。

<sup>11</sup> 見廖成浩：《臺灣小說與後殖民論述》，收於陳義芝主編：《臺灣現代小說史綜論》，頁 484。

<sup>12</sup> 見 Bill Ashcroft、Gareth Griffiths、Helen Tiffin 著，劉自荃譯：《逆寫帝國 後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頁 45。

<sup>13</sup> 見孟 樊：《後殖民論述的文學觀》，頁 163。

<sup>14</sup> 見王逢振：《文化研究》，頁 93 頁 94。

<sup>15</sup> 在拉康(Jacques Lacan)的理論中，「他者」(other)是孩童在鏡射階段(mirror stage)發現自我作為一個「他者」的認定，以一種再現和相像的方式，來發現自身投射出來的虛構，透過鏡映中的影像他者來設定主體的認同。他同時也建構了「grande autre」，是一個超越、絕對的「他者」，它可將主體定位成一個欲求的對象，透過語言、文法和凝視來形成自身的認同；所以「the gaze of the Other」是一種無所不在的督導和指揮力。在後殖民理論者的運用之下，認為被殖民者往往會透過帝國主義的論述，由權力中心所發展出來對「他者」的形象，將鏡射中的理想自我虛構他者予以內化，來認知掌握自己；同時殖民者背後的知識權力(傅柯語)，亦為一種「grande autre」。見 Bill Ashcroft、Gareth Griffiths、Helen Tiffin 著，劉自荃譯：《逆寫帝國 後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頁 186。

能自我界定<sup>16</sup>。書中分析了西方作家學者和官方話語如何系統地建構出一個符合西方意識形態的「東方」：這個「東方」乃是以西方為中心的、由東西方對立兩分思維投射出來的「非我」，不但被本質化、定型化，且被同質化。他認為東方主義對東方文化和東方人的暴力歪曲來自西方歷史悠久的所謂「正規」「純學術」的東方學研究機構，它借助「科學性」對東方文化和東方人進行了幾百年系統、「縝密」的研究，慣用的手法是從零星觀察(typocasting)上升到民族、文化的整體特徵(types)，然後不失時機地作出價值判斷，形成西/東方高/低、優/劣的思維定式(stereotype)<sup>17</sup>。東方主義提供一套構築西方「現代性」認同的反命題，內涵具體的時空架構，使差異的認知足以彰顯認同主題，鞏固「『我們的』西方/『他們的』東方」二元對立世界觀，從而支撐起整套以西方中心主義為基礎的「現代性」論述<sup>18</sup>。東方主義本身是建立在「異文化」間弱勢文化對強勢文化的殖民抵抗，薩依德在書中描述的「西方 中東」關係，所隱喻的是「基督教文化 伊斯蘭教文化」間文化殖民與對抗的關係。

薩依德於1993年出版的《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一書中，針對歐洲的霸權與帝國主義，對第三世界勞力及文化所造成的剝削加以抨擊，並指出西方與非西方的關係，永遠不可能是一個積極主動的西方入侵者，與一個消極被動的非西方本地人的關係；在非西方的本土，總是存在一些積極的對抗形式，且在絕大多數情形下這種對抗會贏得勝利。同時後殖民國家在堅持其文明的另類性(civilizational alternativity)時，不應將所有一切均輕易歸入對於帝國文化的挑戰式反抗，結果會產生一種反動的政治形式。他利用閱讀文本的方式（即其所提出的「對位閱讀」），從主流的文本中閱讀出有關奴隸與殖民他者的片段，並從文本中找到與第三世界對話的空間<sup>19</sup>。

史碧娃克認為「後殖民」指的是一種新的世界格局，它既包括「經過非殖民化的區域」(decolonized space)，也包括一些無法以「殖民」描述之地區，即未經過領土軍事侵略之地；「後殖民」亦指帝國主義的新式「危機控制」(crisis management of imperialism)，表現於兩種層次之上：一是透過「認知暴力」<sup>20</sup>(epistemic violence)向第三世界進行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滲透和征服，導致西方話語的統治地位，也剝奪被殖民者之主體身份意識和用本土語言再現自身的權利，將其置於「他者」之上。其結果必然導至被殖民者受到殖民話語的糾纏和失語症的折磨，在無法確定自己身份下，只能承受已設定之「非我角色」，同時成為帝

<sup>16</sup> 見曹 莉：《史碧娃克》，頁139。

<sup>17</sup> 見朱 剛：《二十世紀西方文藝文化批評理論》，頁231。

<sup>18</sup> 見蔡源林：薩依德的後殖民論述與伊斯蘭，收入黃瑞祺主編：《後學新論 後現代/後結構/後殖民》，頁300。

<sup>19</sup> 見 Bill Ashcroft、Gareth Griffiths、Helen Tiffin 著，劉自荃譯：《逆寫帝國 後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頁21。

<sup>20</sup> 此一名詞源於傅柯之「知解」(episteme)觀念，指稱潛藏在理論與實際之社會行為中，為大家所心照不宣的一種架構。他在其論述體系中，區分三種不同之知解體系；知識能再現真理，本身即形成一種自我指涉的「知解」，在這樣的體系下，形成語言學、生命科學及經濟學，也形成一種新的身體觀 秩序和語言。見廖炳惠編：《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頁99。

國主義霸權建構之共謀(complicity)<sup>21</sup>。二是利用不平等的國際勞動分工，對第三世界進行遙控(remote control)式經濟剝削，從而保證資本主義在全球的獨佔地位。第一世界不但僱傭第三世界的廉價勞動力，並向其大量傾銷產品，是以第三世界勞工生產品又回到自己手上；用以對第三世界勞動力所創造之剩餘價值盤剝榨取，提供第一世界之文化知識界物質保障，而第一世界之文化知識界則提供意識形態支持此一作為。帝國主義的新式「危機控制」還以下列方式呈現：儘量將殖民屬國的勞動法規和環境法規控制在原始狀態，以保證絕對剩餘價值之生產多於剩餘價值之生產；向殖民屬國傾銷過時之生產機器；剝削殖民屬國剩餘勞動力大軍 婦女<sup>22</sup>。

在後殖民的狀況下，被殖民的不僅是那些在歷史上遭受過西方殖民主義者壓迫統治的民族與人民，這已經成為描述被壓迫經驗的普遍範疇：任何文化政治之帝國主義霸權的對象即是被殖民者。與殖民時代的被殖民者相同的是，處於後殖民狀態下之被殖民者亦在一個「他者」與「客體」的地位上<sup>23</sup>。

史碧娃克透過對第三世界文本的「症狀閱讀」(symptom reading)揭示出西方洪大話語(grendretics)的不足，認為用不同話語理論去研讀文學文本，將會讀出文本中甚至批評話語自身存在卻無法想像的症狀。所謂「症狀閱讀」，是二十世紀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之代表人物路易 阿圖塞(Louis Althusser)和皮埃爾 馬庫雷(Pierre Macherey)的論點：文本中存在許多空隙、省略及沉默，乃是由於意識形態的侷限，並非出自於作品修辭需要。因此文評家的任務不是對文本已經呈現的部份作出解釋，而是讓那些沉默的部份發言，即從不完全的與充滿省略的文本中讀出症狀來，並因此獲得關於意識形態的知識<sup>24</sup>。另一方面，她試圖從現代化/現代主義的夾縫中，去找尋未被此一洪大話語納入之本土文化主題及其位置，從而指出現代主義的不足；同時她更堅決反對任何建構典律(canon)的欲望與企圖，認為在對建構典律批判之餘不能忽視政治和歷史的因素，因為任一典律的生成均隱藏著深刻的認知暴力行為，是強權政治在學術機構中的反映，故應予以後殖民式的關注和追問<sup>25</sup>。

後殖民理論家認為，後殖民論述脫胎於被殖民經驗，強調和殖民勢力之間的張力，並抵制殖民者本位論述。換言之，後殖民論述有兩個特點：第一，對被殖民經驗的反省，第二，拒絕殖民勢力的主宰，並抵制以殖民者為中心的論述觀點<sup>26</sup>。不過在史碧娃克、巴巴、緬貝(Achille Mbembe)等人的論述中，「後殖民情境」是一種知識社會史的論述情境，殖民雙方均以其「概念隱喻」(concept metaphors)去翻譯、替換、彌補彼此之間的文化、時空落差，因此權力關係與言語演塑

<sup>21</sup> 見曹 莉：《史碧娃克》，頁 167。

<sup>22</sup> 見曹 莉：《史碧娃克》，頁 168 頁 169。

<sup>23</sup> 見曹 莉：《史碧娃克》，頁 161。

<sup>24</sup> 見曹 莉：《史碧娃克》，頁 156。

<sup>25</sup> 見曹 莉：《史碧娃克》，頁 159。

<sup>26</sup> 見 Bill Ashcroft、Gareth Griffiths、Helen Tiffin 著，劉自荃譯：《逆寫帝國 後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頁 174。

(performance)密不可分，而且沒有單一的支配與主宰者<sup>27</sup>。

?? 乏 ??? ?? 嶸

1950年6月韓戰爆發，中共軍隊越過鴨綠江和美軍交戰。美國在西太平洋建立包圍蘇聯和中共所謂共產主義陣營的防線：阿留申群島、日本、南韓、臺灣和菲律賓，美國以第七艦隊封鎖臺灣海峽。美國為了鞏固和發展一個親美反共的臺灣基地，以美援提供金錢和技術協助解決臺灣的經濟問題，為臺灣戰後的資本主義發展奠定深厚的基礎，而臺灣也更深沉緊密的整編入以美國為主軸的美日經濟圈；從舊殖民地淪為新殖民地，臺灣歷史背景的特殊性「雙重殖民」於焉形成。

中國政府（此處應為指臺灣當局）作為反共的尖兵，獲得美、日的支援，對內實施一連串的土地改革，圖謀社會的安定，及以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為其目標，1949年實施「三七五減租」減輕佃租，1951年放領公地給一部份佃農，1953年公布基於三民主義的「耕者有其田條例」，迫使地主把土地移轉給佃農，這使得農民的生產意願提高，使社會安定，足以支持龐大的軍事費用。而在另一方面，耕者有其田條例的實施也摧毀了地主這一個穩定而具有前瞻性的階層，帶來了臺灣社會結構的激變，使得臺灣社會內部的傾軋加深，直到70、80年代新生的穩固的中產階級出現為止<sup>28</sup>。

另一面，以1954年的中美相互防衛條約以來正式化的美援<sup>29</sup>為槓桿，推動工業建設，為補償土地改革而變為民間企業的公營企業為中心，土著資本也進行蓄積，從1950年代到60年代獲得相當的經濟安定。到了60年代，在這基礎上更進一步地積極引進以華僑資本為首的外資投資，商業進入國際市場。1960年安保條約的修訂後替代美國的來自日本的借款，越南戰爭軍事方面的需求，都加速了經濟發展，在1960年代後半臺灣到達引起國際注目的經濟成長。然而站在這經濟發展上的權威機構，卻跟資本主義發展所需的合理性構成衝突，同時跟著美援流入的西歐自由主義思想，在在均提供了批判權力體質良好的依憑<sup>30</sup>。

從1945年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定以後，事實上政府不得不修改一部份政策，以遷就瞬息萬變的國際狀況。因此，為確保臺灣，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成為急切的課題，而建設臺灣為其首要。為了養育急速膨脹的人口，如何促進經濟發展成為最重要的課題：臺灣必須迅速地工業化，從農業體制的國家走向工業化的國家。善用美援，使得臺灣在1965年前後已具備了初期工業國家的規模；由於

<sup>27</sup> 見廖炳惠：《後殖民研究的問題及前景：幾個亞太地區的啟示》，頁61。

<sup>28</sup> 見葉石濤：《一個臺灣老朽作家的50年代》，頁105。

<sup>29</sup> 1948年美國國會通過援外法案，同年7月中美兩國簽定「中美經濟援助協定」；從1950年開始，隨著韓戰的爆發和冷戰時期的開始，美國從1952年到1968年間，提供對臺灣的援助超過17億美元，實際運用援款14億8千2百萬美元，尚不包括軍事協助計畫當中的援助。見丁庭宇、馬康莊主編：《臺灣社會變遷的經驗——一個新興工業社會》，頁101。

<sup>30</sup> 見松永正義：《臺灣文學的歷史與個性》，收於葉石濤：《沒有土地，哪有文學》，頁282—頁283。

時代的需要，從嚴密的統治經濟走向較自由的、以民間經濟為主的經濟<sup>31</sup>。

60年代開始的臺灣，從官方到民間，都開始逐漸擺脫戰亂、饑餓、流亡的心態，開始認真生產和建設。官方在60年代時，已開始進行第三期的四年經濟計劃，由於受教育人口增加，人口往都市集中，在60年代中期，臺灣已完成以勞力密集、工資低廉、由農業社會轉型為初期工業社會的準備。美國在1965年7月1日，終止對臺經濟援助，1966年12月3日，高雄加工出口區落成啟用，對外貿易入超逐漸減少，60年代結束前，臺灣成為出超國家的想望，已經肯定可以實現，這使得臺灣無論對內、對外都形成一獨立運作的政體。不過，這一表面上漸趨穩定的政體，實際上並未能從外在局勢的遞變中，學習到掌握多少自主的實力和權利，「漢賊不兩立」的僵硬政策，使得自己喪失國際間一些薄弱的支持，法國、日本、菲律賓、加拿大，甚至美國，也都在這個年代的政策中，走出臺灣社會，70年代是臺灣經歷驚濤駭浪重回孤立處境的歷程<sup>32</sup>。與中國大陸的內鬥，延長了海峽兩岸的分裂敵對狀態，也使得在臺灣的資本主義呈現畸形發展：因為政治上的不安使得原具有官僚特質的資本主義更加顯現其買辦依賴性格；另一方面，表面奇蹟式的成長，實質上卻在社會上產生了瀟灑享樂的都市肥大症，其結果便是市儈主義和流氓幫派的成形壯大。台灣的城鄉距離消磨於無形，傳播事業方興未艾，暴發奢靡的消費生活於焉在上層階級流布。

60年代的工業經濟起飛的背後，不僅造成了農業連年衰退，勞動力嚴重外流的負面結果，也隱伏著殖民經濟對外高度依賴的弊病。1973年所發生的世界石油危機<sup>33</sup>，使臺灣經濟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創。僅以1973年與1974年相比，工業年平均增長率由32%下降至1.12%；失業率由1.26%上升為1.53%；物價的上漲幅度，遠遠超出了1960-1972年這12年的漲幅總和，臺灣經濟由此急轉直下，進入停滯性膨脹的狀態<sup>34</sup>。

也就在1965年，美國介入越戰，美軍大批湧入臺灣，此時臺灣不但為美軍提供後勤補給、飛機修護，也成為美軍的渡假休閒中心。同年成立「R&R」(Rest and Relaxation)，由中美聯合小組接待來臺渡假的美軍。根據統計1965-1966年間共接待美軍20079人，1967-1970年，共170311人，約略花費為十億美金；這筆外匯對於臺灣日後的經濟奇蹟發展，也佔有重要的份量。這樣大量的來臺美軍，除了色情，也衍生許多毒品、性病和混血兒的社會問題，而以美式文化為主的西方文化，隨著政治和經濟的入侵，廣泛的籠罩臺灣，也在日後引發強烈的中

<sup>31</sup> 見葉石濤：《沒有土地，哪有文學》，頁39。

<sup>32</sup> 見彭瑞金：《臺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頁104 頁105。

<sup>33</sup> 1973年10月15日，沙烏地阿拉伯參加第四次中東戰爭（埃及和敘利亞主動向以色列發動攻勢），10月17日世界石油價格上漲70%；12月23日波斯灣沿岸6個石油國公開對外宣佈，自1974年1月1日起原油價格提高兩倍，12月25日石油輸出組織石油部長會議宣佈視日本與歐洲為友好國家，決提供其一切所需原油，但美國與荷蘭除外。見鄭文聰主編：《啟動歷史的巨輪——20世紀臺灣(1973)》，大事編年部分。

<sup>34</sup> 見趙遐秋、呂正惠主編：《臺灣新文學思潮史綱》第七章 復歸左翼文學傳統的鄉土文學思潮，頁299。

西文化衝突、社會倫理敗壞和民族自尊喪失等問題<sup>35</sup>。

〔70年代〕在經濟繁榮的表象下，農村的經濟危機以及勞動工人淒慘不幸的生活現實，已成為臺灣內部最嚴重的問題；建築在勞力密集及人力勤儉耐勞上的高經濟成長，也出現了財富集中、貧富懸殊、物價上漲、公開及潛在的失業人口增加的社會問題，而佔人口結構多數的農民、勞工生活反而陷入更貧苦的境地。經濟成長的果實落在少數的資本家及官辦、半官辦事業手裡，真正流血流汗的農民、勞工工作報酬與工時、工作條件、工作環境不成比例。農業經營已毫無收益可言，號稱有六百萬的農村人口，急遽萎縮、老化，留守農村的盡是一些無法改行轉業的老弱婦孺，年輕、健壯的農村第二代紛紛離開農村，大量湧入都市、工廠，過去由於一再被宣揚的耕者有其田政策，農民得來不易的農田，多半處於怠耕、廢耕的狀態，農村與農業面臨全面性的潰散。

農村人力的大量外流，導致以加工出口區為主的工業化人口激增，據統計，1973年臺灣產業工人激增至140萬人，佔總就業人口的26.8%，然而這些沒有做過先期準備，大量湧入都市的工人，在勞動法令不全、官商聯手製造的低工資高投資報酬的情況下，立刻淪為都市的貧民階級。資方大量採用工資待遇不及男工半額的女工、童工，形成勞動力過剩，工人階級只好任憑宰割。戒嚴法剝奪了工人的罷工權，也助長了資本家剝削的野心和氣燄，以1971年為例，臺灣產業工人每小時的工資約為紐西蘭、英國、西德的10分之1，美國的18分之1，如折合白米，連日據時代的工資標準都不如；一般產業工人家庭平均所得半工、半農或連女工、童工算上，或必須拼命超工時加班、兼差，才能過活<sup>36</sup>。

這幾十年來的臺灣社會文化進展最重要的一環，在於教育。臺灣戰後40多年的教育向來被控制在一黨獨大的執政者手裡。在臺灣長達400年的歷史中，除滿清統治的212年之外，臺灣時常和中國大陸處於隔絕的狀態。事實上從滿清中期以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逐漸在臺灣土著化，所有文化模式和生活現實也逐漸變成異乎中國大陸的獨特狀態。雖然在血緣、地緣、史緣的關係，臺灣常受到來自中國大陸的刺激和影響，但適合臺灣大自然的生存方式既已固定下來，自然產生了自主性的文化狀態，來自中國大陸的各種影響，其衝擊的力量逐漸微弱乏力。特別在日本殖民的50年期間，臺灣民眾在固有的文化形態裡接納了日本，甚至透過日本而傳撥開來的近代歐美的文化價值系統<sup>37</sup>，因而形成了不同於以往的文化狀態。在意識形態的天空下，統獨論戰的火花，在異議性的雜誌上時而引發「臺灣結」或「中國結」的論爭。關於臺灣意識並不外中國，或者臺灣人意識切斷與中國歷史、文化、政體關係的討論，時而劍拔弩張，時而橫眉冷對。至於在現實的大地上，則有不斷釋放出來的民間社會力量，持續衝撞著日露窘狀的國族霸權。老舊的政治勢力，受到人民意願改革的挑戰。

80年代總結戰後臺灣社會的階段性發展。從社經結構面來觀察，經濟發展

<sup>35</sup> 見東年：《美國美國我愛你 鬧劇《玫瑰玫瑰我愛你》的荒謬寓意》，頁26。

<sup>36</sup> 見彭瑞金：《臺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頁152。

<sup>37</sup> 見葉石濤：《臺灣文學的困境》，頁29 頁30。

所演化形成的「經濟掛帥」，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民主進程中威權政治的解體及社會控制力的解禁。換言之，從 70 年代以降，經由「加工出口工業」體系所造就的經濟成長，使臺灣立即面臨到「國際化」、「自由化」的衝擊。資本的力量逼迫著整個社會從「封建」、「保守」的狀態中走出來，以一種更具商品性格的面貌加入國際分工體系中。臺灣社會在朝著資本主義的方向掛鉤，卻也同時經常爆發出對資本跨國性流動所衍生的問題的反思與批判。資本自由化所帶動起來的報禁解除，在文化的天空上撥開了陣陣的陰霾。帝國挾帶著資本的盛燄，在全球範圍內引發的戰爭侵略與文化滲透，尚未從這個資訊科技凌駕一切的世界中消失。但是，80 年代以降盤旋於臺灣島內上空的統、獨論戰，卻已變得越來越圖騰化。只要統、獨神話一日不被拆解，臺灣社會內部階級、族群、性別差異的問題，便永遠被視作無關緊要的次要命題。這時，我們便只有毫無選擇地淪為死命拼經濟的帝國附庸<sup>38</sup>。

?? 乏

?? 乏 掘????? 咖? 檣

從社會行動學(social activism)的角度看，對一個停滯的「強控制」體系，真正最大、最原始的威脅，就是一股沒有既定形式、不馴的「發言欲望」<sup>39</sup>。在斯時內外困境交迫的刺激下，頗具敏感性及前瞻性的社論雜誌應時而生，對臺灣社會進行多項調查研究；這些考察與反省引起了知識界廣泛迴響，一個新興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崛起。而本土意識的自我覺醒隨後內爆了一連串影響臺灣社會的重大事件 鄉土文學運動、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等。

1970 年代初，黃春明、陳映真、王拓、楊青矗等作家，創作了許多具有濃厚現實主義色彩的小說作品，反映了臺灣工業發展中的農村、漁民、工廠和礦場的生活。與政府所描繪的經濟榮景不同的是，這些作家看到的是貧窮的農村、被老闆剝削的工作以及遭到國際資本主義侵襲扭曲的社會生活。這種眼光背後隱含著第三世界人民的自覺意識，在臺灣的現實環境中，它帶著兩種意涵：一、它是臺灣土地情懷和經驗的產物；二、它是反殖民主義的民族意識，而且帶著階級立場<sup>40</sup>。臺灣經濟在世界石油危險中的嚴重衰退，使愛國知識份子開始認清臺灣殖民經濟的弊病和帝國主義「經援」的侵略本質，並在反觀臺灣西化之風的覺醒中，對崇洋媚外心態進行批判<sup>41</sup>。

70 年代的鄉土文學，就其致力建構本土文化，追尋臺灣文學歷史的性質而言，與後殖民理論在強調本土特性與分辨殖民影響上，本質上有相近之處。鄉土文學運動的勃興，是針對臺灣官方意識形態的親近美國與保護資本家所形成的反

<sup>38</sup> 見鍾喬：《天地正風塵》（《聯合報》E7 版，2003 年 10 月 9 日）。

<sup>39</sup> 見楊照：《夢與灰燼 戰後文學史散論二集》，頁 102 頁 103。

<sup>40</sup> 見徐宗懋：《鄉土文學論戰：主張文學回歸本土，引發意識形態爭論》，收於鄭文聰主編：《啟動歷史的巨輪 20 世紀臺灣(1977)》，頁 15。

<sup>41</sup> 見葉石濤：《沒有土地，哪有文學》，頁 300。

動。因此，此一時期小說的後殖民性質在於，對於依賴西方新殖民主義的官方權力體系進行抵抗。由於鄉土文學意識形態上屬於左翼民族主義，因此對西方的抵抗直接指向帝國主義以資本主義之強大經濟力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的剝削；而其關懷對象也以最常被宰制剝削的勞動階級為主<sup>42</sup>。

鄉土文學運動無疑是有助於使臺灣邁向現代化的途徑之一。它的根本精神是紮根於民族的朝氣蓬勃的、力求上進的靈性，跟日治時代的反帝、反封建的臺灣新文學運動一樣，也跟第三世界的被壓迫民族站在同一個立場，對外反對新的殖民主義和經濟侵略，對內反對腐化無效率的官僚主義機構，革新政治，批判以家族為核心的封建性、財閥和買辦的貪婪豪奪<sup>43</sup>。

鄉土文學的發展所激起的焦慮，是對於臺灣本土語言及其代表性產生了一種危機感；彷彿使用鄉土的素材與臺灣邊緣地帶的語言，便會產生分化團結及種種政治上的威脅<sup>44</sup>。鄉土文學在現代化的困境中，展現出鄉下人在都市裡的卑微、困頓處境，但是以更深一層的意義來看，也呈顯出整個鄉土文學在國家體制之中的卑微地位，因為它無法凸顯自我，而只能依附在都會文化及其體制之下<sup>45</sup>。鄉土文學所挾帶的寫實主義精神，是針對戒嚴體制在臺灣刻意塑造歷史失憶症的偏頗政策予以積極的糾正，利用民主體制的動搖而恢復對本土的關懷，找回自己的原鄉，其背後的意涵即是找回失落的記憶，重建歷史記憶，重建人民與土地的情感。

70年代的「鄉土」概念，對於社會內部的壓迫關係有所意識、有所抗議，便是一次有價值的文化反省，帶來了社會進步的可能；相形之下，今天的「本土」概念，將壓迫關係一律指為外來勢力作祟，掩飾本土內部的剝削現實，便窒息了文化的超越功能<sup>46</sup>。臺灣歷史背景的特殊性為，臺灣文學與第三世界文學的歧異處甚夥，更產生複雜的「雙重殖民」性格，因此無法以單一論述涵蓋，必須以多視角複合觀之；而臺灣鄉土文學的產生是一個臺灣歷史的必然性，也是有別於其他第三世界文學的地方。

---

<sup>42</sup> 見廖咸浩：《臺灣小說與後殖民論述》，收於陳義芝主編：《臺灣現代小說史綜論》，頁490。

<sup>43</sup> 見彭瑞金：《臺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頁46。

<sup>44</sup> 見廖炳惠：《母語運動與國家文藝體制》，收入自著：《回顧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論文集》，頁257。

<sup>45</sup> 見廖咸浩：《臺灣小說與後殖民論述》，收於陳義芝主編：《臺灣現代小說史綜論》，頁263。

<sup>46</sup> 見錢永祥：《文化認同還是文化批判？》（《聯合報》B5版，2004年2月8日）。

??? ?? 掘??掘 嶸???????????? 咖? 剝??

? Yeah? that`s true? ? 壤掌???????? 掘? 掌?????????

??? 孰???? 哇? <sup>1</sup>

?? 乏 ?? 攢? 峇??? (representation)

(一)

80年代的賤民研究小組(subaltern studies group)對於後殖民歷史學提出論點，認為在官方機構中，歷史的複雜性與曖昧性往往被剝奪，代之以人為建構的明晰性與結構性。在第三世界國家中，官方檔案中記載的歷史經常無法解釋賦予人民政治複雜性及其矛盾的形成過程；在生產正規歷史的機構化領域裡，複雜矛盾的歷史之所以不被記載或被竄改，最主要原因為它們在某些方面悖離官方正統理念或新政府的意識形態<sup>2</sup>。「無史」是所有被殖民社會的歷史悲劇，而重建、重新發現被消跡的歷史，則是所有被殖民社會步入後殖民時代，從事「抵殖民」文化建設工作的首要工作<sup>3</sup>。

在殖民主義的權力結構裡，被殖民者本身的文化特性，民族意識受到壓制，導致「文化原質失真」；當地居民和菁英知識份子認同於殖民者的文化，當他們看待自己本土的各種文化現象時，往往不自覺地套用殖民者審視和評定事物的標

<sup>1</sup> 見陳映真：《六月裡的玫瑰花》，收入《陳映真小說集3 上班族的一日(1967-1979)》，頁11。

<sup>2</sup> 見陶東風：《後殖民主義》，頁193 頁194。

<sup>3</sup> 見邱貴芬：《發現臺灣 建構臺灣後殖民論述》，收入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頁171。

準與理論<sup>4</sup>。殖民者用滲透的方式削弱或改變被殖民者殘存的文化認同，淡化原住民的歷史、社團、文化與民族的意識，導致民族文化記憶的喪失。

後殖民文學的一個重要特色，便是作家們已經自覺到必須要避開權力中心的操控。後現代主義者並不在意歷史記憶的重建，而後殖民主義者則非常重視歷史記憶的再建構<sup>5</sup>。後殖民是一個對殖民統治關係及其歷史的反思，是一種具備了集體記憶上反抗自身記憶的自覺運動；他們要回到過去，發掘那些被統治者的論述及語言系統摒諸門外的歷史碎片，以及那些被民主意識形態囚禁的文化呼聲，並加以重組，為個體及民族在新的歷史組合裡找到一個自我表達的據點。另一個重要特色即在於強調被殖民者的自我或主體意識之外，對於身後的國家民族群體也存有相同的關注和認同<sup>6</sup>。但是集體記憶也往往與集體遺忘並肩共存，臺灣集體記憶的形成，是具體化與受壓制的記憶版本的融合；多重沉默導致了多重敘述，而此二者均無法單獨創造一致的過往記憶<sup>7</sup>。

殖民主義之後，反殖民的與獨立的民族國家的出現，常常伴隨著忘記殖民過去的欲望。後殖民的健忘(amnesia)是歷史的自我創造或重新開始的欲望表徵，其目的為驅散自身所遭受殖民統治的痛苦記憶；但事實上歷史並不能透過一種簡單的意志行為而得以自由選擇，僅僅是對殖民記憶的壓抑本身絕不等同於可從殖民統治的令人不快的現實中真正解放出來<sup>8</sup>。後殖民論述是對於健忘的一種理論抵抗，其任務在於提醒人們警惕遺忘的可怕後果；巴巴認為「記憶絕不是靜態的內省行為，它是一個痛苦的組合或再次成為成員的過程，是把被支解的過去(dismembered past)組合起來以便理解今天的創傷」，意即後殖民的主體要抵制遺忘，必須重新組合過去的經驗，回到過去，再次成為過去那個被統治的、蒙受屈辱的成員<sup>9</sup>。因此後殖民論述對後殖民狀況的重組/重新記憶有兩個功能：一是要認識到舊殖民主義結束以後，殖民勢力仍舊是無所不在的；二是要透過記憶的被重新喚起而使殖民的過去更為清晰<sup>10</sup>。

當代後殖民理論中，記憶政治(politics of memory)一詞被用來指稱「記憶」是被殖民者用來對抗殖民者的污名化、無視化，藉以恢復我族歷史的工具，具有抵殖民(de-colonize)的政治意涵。歷史是建構後殖民主體性的重要知識方法與形式，透過此種方法形式所找回(reclaim)、重述或重建的過去 不論是後殖民主體的個人或集體記憶 往往是構成後殖民性的主要成份，故過去或記憶一再成為後

<sup>4</sup> 見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前言，頁 17。

<sup>5</sup> 見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 第一章：臺灣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刊於《聯合文學》15 卷 10 期，頁 165。

<sup>6</sup> 見李佩然：後殖民地主體意識的泯滅與重現 《魔鬼詩篇》的啟示，收入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頁 104 頁 105。

<sup>7</sup> 見柏右銘(Yomi Braester)：臺灣認同與記憶的危機 蔣後的迷態敘述，收於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臺灣 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頁 235。

<sup>8</sup> 見陶東風：《後殖民主義》，頁 5 頁 6。

<sup>9</sup> 見邱貴芬：發現臺灣 建構臺灣後殖民論述，收入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頁 10 頁 11。

<sup>10</sup> 見邱貴芬：發現臺灣 建構臺灣後殖民論述，收入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頁 12。

殖民情境之靈感泉源，歷史也因此被用來質疑殖民者對知識與權力的霸權部署的方法與形式<sup>11</sup>。作家們在書寫中如何選擇記憶，必須倚賴長期的閱讀和思考所培養出的審美敏感與文學標準；作為一個文化人，在變動的時代裡除了充實自我，也應該盡量提醒群眾去找回那個失卻的精神核心。

（二）

余秋雨先生在一次訪談中提到：

回憶錄往往寫太多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那是社會的集體記憶，變成意識形態的說明，個人卻淹沒了。回憶應該是更貼近血肉的。這是一種人文悲劇。記憶是個人的權利，記憶寫作的特點應該是著力於個人，帶出整個時代，而非著力於時代以帶出個人<sup>12</sup>。

記憶最關鍵的是在重建過去情景的過程中，將有限的資訊和片斷的理解重新排列、組合；由於回憶時的經驗會強化記憶中某些細節，每次回憶時又可能重溫不同的細節，使得這個不斷排列組合的過程更為複雜。在此種不斷重整的過程中，回憶者對自己整體的過去做出新的詮釋之時，他對於自己生命也同時達到新的理解<sup>13</sup>。歷史記憶通過「過去」與「現在」的隨機性交錯，藉此在當下中進行對話、再現、理解、重組、釋放。回憶之旅既是一場自我確認(self-confirm)的歷程，也是一場自我啟示(self-revelation)的轉化。

陳映真曾經說過：

對臺灣的理解不止是冰冷的實證的研究，還應該是對臺灣的形成史，他的發展史，用我的話來說，就是臺灣的精神史，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為特色的臺灣地區的精神的歷史，心靈構造的歷史的研究。

鄉村的教師 著作於 60 年代，涉及的便是戰後初期的歷史記憶。二二八事件與國共內戰喚起了人們對二次大戰年輕人被徵召入伍的不堪回首，吳錦翔被壓抑的記憶（吃人心）轉為一種自殘行為，他用鮮血與死亡作為向時代抗議的手段。

在後期被呂正惠教授歸為「政治小說」的三篇作品（山路、鈴鐺花及趙南棟），陳映真對於海峽兩岸的紛爭擾攘，白色恐怖的歷史反省，作出了直接的書寫：

80 年代開始，他從反省和批判臺灣在政治經濟與心靈的對外從屬

<sup>11</sup> 見陳建忠：《末日啟示錄：論陳映真小說中的記憶政治》，頁 117。

<sup>12</sup> 見楊佳嫻：《眾聲喧嘩，生命因閱讀而寧靜——記余秋雨臺北國際書展演講》（《聯合報》E7 版，2005 年 2 月 27 日）。

<sup>13</sup> 見彭小妍：《迷園》與台灣民族論述——記憶、述說與歷史，收入江自得主編：《殖民地經驗與台灣文學——第一屆台杏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86。

化的「華盛頓大樓」系列，轉軌到以 50 年代臺灣地下黨人的生活、愛與死為主題的「鈴鐺花」系列，是他把當代臺灣人民克服民族內戰，克服民族分裂的歷史——臺灣地下黨的歷史加以文化的營為<sup>14</sup>。

來自過去的受難者聲音以歷史記憶的形式出現，這已經不是單純的記憶，而是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謂的「追想」(eingedenken)，亦即對進出式記憶(memoire involontaire)的主動追索<sup>15</sup>：

追想不只是過去的重複或轉述而已；它的重點是要揭示過去所包含的，應然而未然的可能性。透過這樣的追憶，埋藏在過去時街間底層的改變動力才能重見天日（也許很快又會消失）。追憶的過程不斷瓦解（大歷史）條貫的緊箍咒，為歷史受難者的言辭與記憶建立有反省能力的寫作、發表空間。追憶受難者並不會延續傷痛，也不會陷入悲情，只會打斷歷史的延續，讓各種苦痛得經驗從面目模糊的群眾樣板中浮現出來。

「鈴鐺花」中的高東茂老師在文本中左派知識份子的理想正面形象，與斯時因政府操控媒體所給予人們記憶中的反叛負面形象形成強烈對比，可以看到陳映真藉記憶回溯而以此反抗強控制體系的企圖。

「山路」中的蔡千惠同時背負白色記憶的傳承者與遺忘者的雙重身份<sup>16</sup>：她的「覺醒」言明了舊創帶給人的影響，時間的裂縫從過去延展到現在；她剛建構完成的歷史意識，卻更加深其時間錯置感，於是只能以死亡來解決困境。她的死是填充歷史罅隙的必要手段，只有藉著自我毀滅，千惠才能重申過往事件的意義；她對過去做出證詞的方法，乃是透過沉默無語與記憶擦拭<sup>17</sup>。

臺灣人民在二次大戰後即患有政治冷感與歷史失憶的雙重症狀，陳映真的歷史觀凌駕於現實生活的各種可能性之上，從而改寫了記憶與政治間若即若離的關係：記憶被政治化而失真。記憶的危機起源於作家發現創造個人記憶的需要，而所謂的個人記憶，是要能對抗控制個人思想之書寫方式；避開支配者的「大我」集體記憶，並將自身從中抽離，重述個人記憶中的層層沉默。這才是後殖民論述所強調的重點所在。

<sup>14</sup> 見許南村：後街——陳映真的創作歷程，收於《陳映真小說集 1——我的弟弟康雄(1959-1964)》，頁 27；亦收於《從四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論文集》，頁 167。

<sup>15</sup> 見廖朝陽：歷史、交換、對向聲——閱讀李昂的《迷園》與《北港香爐人人插》，收於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臺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頁 310。

<sup>16</sup> 見陳建忠：末日啟示錄：論陳映真小說中的記憶政治，頁 125。

<sup>17</sup> 見柏右銘(Yomi Braester)：臺灣認同與記憶的危機——蔣後的迷態敘述，收於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臺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頁 237—238。

?? 乏 ??? 券?? 掘咖? 仟? 俟

(一)

社會學家史密斯(Anthony Smith)認為，國家文化是人工打造出來的想像社群：「國家是由其中的菁英、知識份子或資本家所建構、鑄造出來的，是由無數被發明的傳統所組合而成的」；國家文化的建立，必須謹守「特定、受時間限制、有所表達的」原則。亦即國家整體意識的建立，必須仰賴定居於特定地點的一群人，共同產生的深層集體意識，以及一種「永續、分享共同回憶與共同命運體的感受與價值觀」的共識。這種「社群的種族歷史」，已成為前現代種族意識的標誌，也是現代國家意識得以延伸建構的中心主題。他並指出國家意識的認同對其他型態的認同有獨特的相對權力，因為國家意識「提供了今日獨一無二的視野及政治凝聚理論，支配著多數的共識，並引導著群眾的熱誠。沒有任何一種視野或理論，能不相形見绌，因為它們都無法提供選舉、獨特的歷史、或是特別的命運」<sup>18</sup>。

所謂的「族群」，比較正確的說法是一種社會地位，常常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文化背景，其中一部分，形成於個人的「初級化社會」經驗之中；等到進入了學校與社會，受到複雜的社會制度的作用，又影響到日後的社會資本與地位取得，形成對人群區隔的認知與價值觀。這個過程其實相當複雜<sup>19</sup>。而擺脫外來統治者的負軛 或者說它是自行脫落的 充其量只是滿足了殖民地人民重獲自尊自信的強烈需求，反抗殖民主義的民族自決(self-determination)聖杯，到了後殖民時代，變成了族群衝突、分裂、叛變與壓迫的毒藥<sup>20</sup>。人民透過爭奪發聲權的行為（言論天空的眾聲喧嘩）來抒解不斷自我內爆的疏離與焦慮感，此一行動象徵臺灣作為一個沒有他國承認的政治體系(state without nationhood)，有著只有政體而無國體的錯亂，以及傳統與現代化彼此對立的不協調與衝突。

(二)

「族裔散居」(diaspora)（或稱「離散」）是指某個種族出於外界力量或自我選擇而分散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情況（即自願或非自願移民）。散居的族裔身在海外，生活在所居處的社會文化結構中，但他們對母體時空依然殘存著集體的記憶，在想像中創造出自己隸屬的地方和精神的歸宿，創造出「想像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y)。「從哪裡來」和「身處何處」二者之間的矛盾實際上是後殖民的主流文化勢力影響的結果<sup>21</sup>。

殖民主義強烈質疑「家的」空間(homely space)形式，同時喚起一種抵抗形

<sup>18</sup> 見 John Tomlinson 著，鄭元、陳慧慈譯：《全球化與文化》，頁 113 頁 116。

<sup>19</sup> 見張茂桂、黃洛斐：族群問題勿陷雙惡相生（《聯合報》A15 版，2004 年 10 月 17 日）

<sup>20</sup> 見 Harold R. Isaacs 著，鄧伯宸譯：《族群》，頁 17 頁 18。

<sup>21</sup> 見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前言，頁 16 頁 17。

式，促生了「無家可歸狀態」(unhomeliness)，這種狀態是領土外的(extra-territorial)與跨文化創始行為的條件。族裔散居的思想在矛盾的、文化上被傳染的以及渾沌不明的流浪者形象上表現最為明顯，他們處於家庭（國）與世界之間，如同薩依德所說的「處於諸多領域之間、諸多形式之間、諸多家庭之間，與諸多語言之間的政治形象。」<sup>22</sup>

伊麗莎白·貝克·耿斯海姆(Elisabeth Beck-Gernsheim)在跨文化婚姻和家庭的例子中闡述：「僅僅是因為社會和人口的發展，族群的歸屬將日益複雜。因為在流動性、大眾交通和經濟網路化的時代，超越出身團體，和其他團體的人一起生活和工作的人；出於各種不同的理由（貧窮、饑荒、迫害、或者教育和職業、旅遊和好奇），短時間或長期，也許是永遠離開家鄉的人，這樣的人數量增加了。這種『跨文化』人口牽涉到社會的歸屬問題，關係到多樣化的、多變的、非常錯綜複雜的生命史，是無法歸於固定的範疇的。這也導致了複雜的行政程序、判斷問題，由於情形的複雜明顯地亦產生了挫折和錯誤。」<sup>23</sup>

法農論述中提及作為對殖民主義反抗的民族主義，是有助於加強各個社會階層與社會力量之間的團結，而且這種反抗還可用來作為徹底改革被殖民社會內部的各個消極層面。民族主義意味著重新獲得民族整體性的努力，成為一種再領土化的過程，透過挑戰殖民文化的種族優越性與「雙重公民標準」而獲得平等的意識<sup>24</sup>。但在國家的暴力壟斷地位不穩定的情形下，多種民族的關係很難找到一個中間調節主體或者控制主體，因此民族之間的矛盾很容易激化，走向極端。這是這些社會政權頻繁變動，國家權力癱瘓，無法有效的動員社會經濟資源，維持社會經濟發展秩序；民族之間矛盾惡化，並且經常發生暴力衝突的根本原因<sup>25</sup>。

躍進全球化新紀元，冷戰藩籬瓦解，經貿自由化善門大開，零時差地球村，聚落間的族群對立反卻日形尖銳。蕞爾小島，就可依照血緣區隔本省/外省、閩/客、原住民/新移民陣營，「敵我」界線清晰浮出。族群之間，只要在關聯與血緣上有足夠的區隔性，猜疑、恐懼、敵意與暴力便無法避免；而暴力的程度則視彼此的政治關係與利益互動而定，從漠不關心到剝削、輕視、壓榨甚至屠殺，不一而足。從人類當前的情況看來，看不出有哪個民族不會重蹈覆轍，尤其是他們從被宰制的一群翻身，輪到自己掌權當家之時<sup>26</sup>。

### （三）

因被殖民受制於異國統治，失去文化政治自主的權力，對一個講求安土重遷，傳承歷史的文明而言，不論移民、殖民，都意味著一種身心的大剝離，大捨棄。臺灣由於當下國族政治情勢使然，移民與殖民的悲情常被大量渲染，「後」不僅可暗示一個世代的完了，也可暗示一個世代的完而不了。如果殖民已經指向

<sup>22</sup> 見陶東風：《後殖民主義》，頁 158 頁 159。

<sup>23</sup> 見 Ulrich Beck 著，孫治本譯：《全球化危機 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頁 65 頁 66。

<sup>24</sup> 見陶東風：《後殖民主義》，頁 130 頁 131。

<sup>25</sup> 見楊雪冬：《全球化》，頁 67。

<sup>26</sup> 見 Harold R. Isaacs 著，鄧伯宸譯：《族群》，頁 301。

一種時空錯置的徵兆，「後」殖民是此一錯置的再錯置，但同時也成為對任何新興的「想像的本邦」最激烈的嘲弄<sup>27</sup>。「鄉」或「原鄉」的觀念，在臺灣文學中的確佔有重要的位置，這不僅與臺灣的移民社會有關，也與它的殖民性質有關。因此，「懷鄉」、「鄉愁」，不只在具體可感的層面上去理解，亦可在隱喻或象徵的意義上解讀，把「鄉」看成生養自己的生命，寄托自己夢想的文化或理想；對於陳映真這樣思想型的作家而言，「鄉」似乎更帶著精神家園的意涵<sup>28</sup>。故鄉意義的產生肇因於故鄉的失落或改變，尤其暗示原鄉敘述行為的癥結：敘述本身即是一連串「鄉」的神話的移轉、置換與再生<sup>29</sup>。

故鄉以其似近實遠的時間位置，去而難返的記憶渴望，恰可為寫實及現實文學的場域，提供最佳布景。地理學上的尋根懷鄉與義理上的探本溯源相輔相成，形成文學史上一次又一次的鄉土熱潮。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焦點，從國族地位的再思到地方意識的塑立，從民情采風到風土特寫，正是臺灣追求後殖民現代性的重要表現。

以文本而論，陳映真的《將軍族》裡小瘦丫頭與三角臉的死前結合可算是離散族群與次等公民（賤民）結盟的紀實；《夜霧》中李清皓與邱月桃表象為救難英雄與落難美人惺惺相惜，實質上則呈顯不同省籍結合的另一種面相；《夏日》可擴張其隱喻為原住民/漢族的交媾模式以及政治神話。《忠孝公園》的副線林標與其子欣木、孫女月枝之間的關係，是臺灣的現代化及社會轉型所造成的家族離散典型，林標尋找兒子的過程呈顯出戰後第一代臺籍人士放棄土地到城市尋夢的苦澀歷程；月枝離家出走到都市尋找父親，則是戰後第二代的另一種苦澀經驗。王禎和的《美人圖》裡的正面形象代表了以臺灣為吾鄉吾土的認定；小廝是一個在臺灣居留工作的華僑，滿口廣東國語，英文也好，對移民家庭的問題也有深入的了解，他的形象顯示出王禎和對於臺灣的族群共存，有包容接納的肯定；而在《兩地相思》中，藉由門人常安叔和臺灣人玉蘭的結合，再次作出了肯定。

目前臺灣的身份危機顯現在兩個面向：一方面傳統「中國人」身份觀打平一切的傾向受到挑戰，使得原先被忽略或受壓抑的各個次文化團體間之差異凸顯出來；而另一方面，久居臺灣卻無法融入民間生活的某些族群（如原住民等），成為臺灣的邊緣人<sup>30</sup>。以外省人而言，他們在生活中越來越認同臺灣，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但這種趨勢常常因為社會的泛政治化，及選舉時特定的政治操作，而被簡化或掩蓋了。高格孚(Stephame Corcuff)認為，國家認同多元化的現象在外省人之間很普遍，這種現象卻因「一人一票」的投票行為而被簡化或暫時消失。他分析，「第一二代的外省人對目前臺灣的走向懷著不安，對將來沒有信心；他們認為本土化的趨勢就是去中國化，意味著他們在臺灣會沒有位置。」這種不安，

<sup>27</sup> 見王德威：《後殖民寫作》（《聯合報》E7版，2004年1月3日）

<sup>28</sup> 見黎湘萍：《重返心靈的故鄉——重讀陳映真近年作品並論其新作《歸鄉》》，頁15。

<sup>29</sup> 見王德威：《國族論述與鄉土修辭》，收入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臺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頁73。

<sup>30</sup> 見廖成浩：《在解構與解體之間徘徊——臺灣現代小說中「中國身份」的轉變》，收入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頁194。

在選舉時就形成多數外省人投給外省籍候選人的結果<sup>31</sup>。

詹宏志先生曾說：

在陳映真的觀點下，同一民族中如果發生加害者和被害者的分野，都是不幸的歷史產物。他寧可把四十年來的本省、外省的衝突，視為短暫的現實。也就是說：即使兄弟反目、分家，也不能否認血緣的存在。這就是為什麼陳映真在臺灣結、中國結的問題上，並不採取臺灣或中國的立場，而是退到整個第三世界受扭曲的歷史的共同經驗，以尋求諒解的、積極的解釋<sup>32</sup>。

早期的陳映真一直存有國族認同的情意結，大至中國人對外國人的民族意識，小至本省人對外省人的地域觀念，但後者已有緩和的跡象。在《夜行貨車》裡，詹宏志批評電視台塑造臺灣人在電視劇裡的形象，因而造成外省人對本省人的偏差觀念：

「你看這些臺灣人，」他盯著螢光幕說，「你看這些臺灣人，一個個，不是癩，就是憨。」

「如果，一個外省人，從小到大，從這種電視劇中去認識臺灣人，那麼，在他的一生中，在他的心目中，臺灣人，是什麼樣的人？」

「我當然知道，」他說：「編寫這種劇本的，也正是臺灣人。」<sup>33</sup>

媒體的背後矗立著龐大的國家機器，為便於作思想統治（當然也存有自古以來邊疆蠻夷的落後觀），有此手段不足為奇，而屬同一族群者卻為虎作倀？醜化同胞，更是不知伊於胡底。

在《鈴鐺花》裡，他也同樣道出省籍間的歧異現象：

「不是說，外省人租房子，一住就佔著不放麼？」

「外省男人怎麼跟我們的男人全不同款哩！」<sup>34</sup>

二大族群彼此之間有著刻板印象，當然扞格不入，無法水乳交融。日久後地域觀念逐漸消蝕隱晦，產生出不同省籍的結合（詹宏志、劉小玲）與相互欣賞（劉福金與陳家齊），也反映出陳映真最終期望族群融合的企圖。

《夜霧》則一反前作，不再以族群和諧的角度出發，著重於主角對身為「外省人」的危機感，針對族群問題採取批判的立場，暗指本省人是新的壓迫者，又

<sup>31</sup> 見李令儀專訪：法國學者：外省人國家認同多元化（《聯合報》A11版，2004年1月3日）

<sup>32</sup> 見詹宏志：理想論者的思想與歷史觀——札記陳映真的文學評論，收於自著：《閱讀的反叛——大致與小說有關的札記》，頁100。

<sup>33</sup> 見陳映真：《夜行貨車》，收入《陳映真小說集3——上班族的一日（1967-1979）》，頁163。

<sup>34</sup> 見陳映真：《鈴鐺花》，收入《陳映真小說集5——鈴鐺花（1983-1994）》，頁38—39。

有新的對立現象；或者應該說對立從未消弭，只是主客易位。

那時候，我第一次感覺到外省人的自己，已經在臺灣成為被憎恨、拒絕、孤立而無從自保的人<sup>35</sup>。

現在外省人過日子，表面上從從容容，骨子裡駭怕呀<sup>36</sup>。

李清皓作為一個情治工作者，參與不少案件，一方面對那些冤屈枉死者心有愧疚，另一方面也同其餘外省籍人們一般，對於新政黨所領導的政府一起始就不具信心，認為將被趕盡殺絕、死無容身之地。

而外省第二代的惶惑更深：

「現在臺灣人都把我們當外人了，你怎麼裝孫子，你還是個外人。」  
「祝景」說如果外省人也把自己當成大陸的外人，路的兩頭就叫堵著了。「我爹在臺灣過了半輩子，一死百了。但我們這一代還有多少長日子要過」<sup>37</sup>

他們的處境較其父執輩更為艱困：「故鄉」只存在於身份證上的籍貫記載（新式的還取消這一欄），或是老一輩口耳相傳之中。到了中國大陸卻發現人不親土亦不親，被當地人稱為「臺胞」；在臺灣則是外省第二代，真正產生認同上的錯亂，將在下節補充討論此一問題。

廖咸浩先生對此提出一個解釋：

大概多數所謂的外省人都重新發現了他（她）是外省人所具的意義。而這個發現的過程又往往伴隨著一種新蘊釀出的「原罪」感。「外省人」意味著「非臺灣人」，而且相當程度而言，也意味著「對不起臺灣的人」<sup>38</sup>。省籍乍看似乎有某種程度的命定或先驗意味；外省人往往是無根的，而本省人則象徵著沛然的生命力<sup>39</sup>。

例如在《霧》中，外省的魯排長看到澡間赤裸的臺籍年輕士兵時，欣羨於他們旺盛的生命力，相較於自己的老朽，也只能無言地歎息。

《夜霧》中的李清皓在接受情治訓練時，教官告誡他們「抓臺灣人，要考慮政治社會效應」：

<sup>35</sup> 見陳映真：《夜霧》，收入《陳映真小說集 6 忠孝公園(1995-2001)》，頁 110。

<sup>36</sup> 見陳映真：《忠孝公園》，收入《陳映真小說集 6 忠孝公園(1995-2001)》，頁 218。

<sup>37</sup> 見陳映真：《忠孝公園》，收入《陳映真小說集 6 忠孝公園(1995-2001)》，頁 204。

<sup>38</sup> 見廖咸浩：《愛與解構 當代臺灣文學評論與文化觀察》，頁 25。

<sup>39</sup> 見廖咸浩：《愛與解構 當代臺灣文學評論與文化觀察》，頁 175。

他們本地人，我們隨便抓了一個人，起碼就得罪了他們的父母妻子兒女、再起碼堂表親、同學朋友 都會對政府不滿。外省人呢，全是孤家寡人，少數朋友全是軍公教，不怕不服管，外省人搞陰謀，尤不可赦，抓一個就消滅了一個<sup>40</sup>。

雖然斯時由國民黨掌控政權，又有軍公教及眷村鐵票支持，但在人口比率上相對於本省族群依舊居於少數；因此戒慎恐懼，深怕又如二二八、美麗島一般，埋下不定時的隱憂；同時文中也說明了外省族群的婚姻情形及交際行為，更進一步暴露出上層統治階級看待外省族群的歧視心態：給你們飯吃就要聽話，像被豢養的寵物或是圈養的家禽家畜。

根據統計結果，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向受難者家屬基金會提出申請賠償的件數有 7000 多件，其中獲賠償 5856 件，外省族群占據賠件數的 41.5%，其他族群占 58.5%。換算人口比率，白色恐怖受難者，外省族群是本省族群的四倍<sup>41</sup>。事實證明迫害者與被迫害者的地位是混淆的。

本節最後以 唐倩的喜劇 裡，喬治 H D 周的話作結：

一個人應該為自己選擇一個安適的位置。到一個最使你安逸的地方，找一個最能滿足你的生活方式。這是作一個人的基本權力。國籍或民族，其實並不是重要，我們該學會做一個世界的公民<sup>42</sup>。

?? 乏 ??? v.s.??

(一)

二次戰後第三世界反殖民、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浪潮，是二十世紀人類歷史的重大趨勢。一般而言，這些新興民族國家在獨立之後所採取的官方文化政策或意識形態綱領不外乎是西化路線或本土化路線，亦可能在一些層面上採取前者，另一些採取後者；特別是為了強調民族主義與國族認同，都會採用本土傳統為素材，來建構一種官方價值體系，甚至一套國族神話，從而建立一種本族中心主義的世界觀與歷史觀。

在強調本土性和本土經驗優位的同時，卻很容易建構另一種模式的本質主義和以此為基礎的族群認同；而這本質主義或族群認同是以某種民族或種族主義為基礎的。透過這種本土化的本質主義的再造，整個分析架構仍然是國際（西方）

<sup>40</sup> 見陳映真：夜霧，收入《陳映真小說集6 忠孝公園(1995-2001)》，頁95。

<sup>41</sup> 見林新輝：段宜康：民進黨迴避白色恐怖真相（《聯合報》A4版，2004年10月23日）

<sup>42</sup> 見陳映真：唐倩的喜劇，收入《陳映真小說集2 唐倩的喜劇(1964-1967)》，頁149。

/本土二元劃分的話語模式<sup>43</sup>。本土主義或返祖現象構成了傲慢的現代性話語的不可分離之「他者」，這種在積極的現代的與消極的前現代的民族主義之間所作的劃分，會將所有地方性的、複數的民族主義變體歸入負面的本土主義之中<sup>44</sup>。

根據里柯(Paul Ricoeur)所言，「認同」基本上有兩種類型，其一是「固定認同」(idemidentity)，亦即自我在某一既定的傳統與地理環境下，被賦予(given)認定之身份，進而藉由鏡映式的心理投射賦予自我定位；此種「認同」是一固定不變的身份和屬性。另一種「認同」則是透過文化建構、敘事體和時間的累積，產生時空脈絡中對應關係下的「敘述認同」(ipseidentity)。「敘述認同」經常必須透過主體的敘述以再現自我，並在不斷流動的建構與斡旋(mediation)過程中方能形成。「敘述認同」是隨時而移的，它不但具備多元且獨特的節奏和韻律，也經常會在文化的規範與預期形塑下，產生種種不同的形變。在多元文化與多元社會的情境中，社會運動所必須面對的，不只是社會公義或分配政治的現實客題而已，也同時必須兼顧如何在日益個人化的現代社會中，經由意識形態的宣傳和理念的傳播，宣導弱勢族群認同的正當性與其所應擁有的權力<sup>45</sup>。

艾瑞克森(Ben Erickson)認為「認同一詞指的是某個個體與某種獨特價值之間的聯繫，這種價值是由某種獨特的歷史所孕育出來的，是屬於他自己那個民族的。認同的是那個族群一以貫之的內在精神」，他並認為佛洛伊德所說的認同「是一種最核心的族群意識」，指的是一種深沉的擁有感，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感應得到，也只能用比較神秘而非理性的字眼才能表達出來；而他以為的認同，「既是在個人核心裡的一個安頓過程，也是在他的民族文化核心裡的一個安頓過程」<sup>46</sup>。

屬於後殖民主義式的民族認同想像，首先視「認同」為「我們在遭到各種歷史敘事(narratives)的定位及反過來自我定位之後，對這些位置的命名」：「認同」(identity)只是標籤，其「實質」來自歷史及「我們」為定位而形成的論述鬥爭。民族認同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一群人（通常由這群人的知識份子代表）想像如何以一政治上的集體範疇「國家」稱呼我們所用到的各種文本，或者論述。認同問題一定是在正反雙方，亦即「我者」與「他者」之間的拉扯與共謀共生的結構關係中發展出來的；一方面固然需要本質主義的訴求，但另一方面卻不能固著在對本質主義的建構與想像中，將其形塑為絕對客觀的存在，否則可能會陷入另一種內在殖民的束縛之中。而人類對於土地感情的來源是歷史感的存在：一旦歷史的痕跡從土地上消失，土地的認同也無從著力，淪為空談。

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說：

何謂身份認同？許多有關單一文化、多元文化、國家、公民身份，簡言之，許多有關歸屬的辯論常是武斷地假設認同與自身之間一個

<sup>43</sup> 見李英明：《全球化時代下的臺灣和兩岸關係》，頁 136。

<sup>44</sup> 見陶東風：《後殖民主義》，頁 129。

<sup>45</sup> 見廖炳惠編：《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頁 135 頁 136。

<sup>46</sup> 見 Harold R. Isaacs 著，鄧伯宸譯：《族群》，頁 48。

透明關係。在主體的認同之前，自我性又是什麼？自我性並不能簡化為一個說我的抽象能力，一個永遠前置性的能力。也許它在第一步是指謂一個我能的力量。這個我能的力量是比我更基本，而且它是存在一條環節之中；在這環節中，自身與我將無法和權力，也無法和本位的自主權與主動權分割<sup>47</sup>。

身份是由「文化情感」與「現實策略」所交織而成，文化情感中帶有與生俱來的執著，而現實策略則降低本質因素，強調以福祉或利害為依歸；身份的形成，即建立於此二種態度之辯證發展上<sup>48</sup>。對所謂本土(the native)的回歸，是一種文化認同和身份認定的表現。而不論文化發展或身份認同，都必須設定「他者」作為參考；更有甚者，處於任何階段的社會或國家或地區，在其發展過程中，亦均必須設定「他者」的存在。而身份認同絕不是透過本質主義式的途徑能達成的，它是一個不斷流動複合的過程，取決於「自我」和「他者」不斷變化的關係而定：身份認同絕對不是與生俱來的、先天被決定的，而是後天甚至是被創造和製造出來的，如果將身份認同本質化和絕對化，是不符合現實層面的<sup>49</sup>。

華格納(Wagner)暗示認同是指「人們被提供自我認定的社會面拒絕的過程，譬如戰後的強迫移民」，而紀登斯認為現代性「本土」的轉變，基本上是淵源於前現代社會自我封閉的本土所在。在全球現代世界中，日常生活體驗的重要和頻繁，使得我們所處的本地生活圈已被遠方事件、關係和過程所主宰<sup>50</sup>。認同是一種政治建構，可經由宣示而獲得表述；並非「發現的」(discovered)，而是通過「自我再現」(self-representation)而「建立的」(established)，故其必然是政治的。文化身份的「無常性」與「邊緣性」造成身份認同不僅因時、地而異，而且涉及種種論述。

在陳映真的《趙南棟》中，作者藉由趙爾平的思路提出自己的論述：

當父親說著「中國」，大陸和臺灣總是不分家的。他先是感到詫異。可繼而一想，在理論上，大陸和臺灣，是不分家的。他這才感覺到，很多的場合，當人們說「中國」，不知不覺之中，其實指的就是臺灣。中國大陸，從什麼時間起，竟而消失了呢<sup>51</sup>？

這其實是一種自我膨脹，卻也說明了潛意識之下的認同改變。「中國」的名詞界定意義不限於地理疆域，還包含了歷史與文化；而臺灣的範圍在各方面遠較其為狹小。外省第一代將二者合一，代表已將目前居住所在與故鄉畫上等號，認同了

<sup>47</sup> 見 Jacques Derrida 著，張正平譯：《他者的單語主義——起源的異肢》，頁 15。

<sup>48</sup> 見廖咸浩：《在解構與解體之間徘徊——臺灣現代小說中「中國身份」的轉變》，收入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頁 194。

<sup>49</sup> 見李英明：《全球化時代下的臺灣和兩岸關係》，頁 139。亦見於邱貴芬：《發現臺灣——建構臺灣後殖民論述》，收入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頁 181。

<sup>50</sup> 見 John Tomlinson 著，鄭元、陳慧慈譯：《全球化與文化》，頁 65。

<sup>51</sup> 見陳映真：《趙南棟》，收於《陳映真小說集 5——鈴鐺花(1983-1994)》，頁 163。

這塊土地；下一代卻是逐漸在意識中作一反轉，顯現出過度強調本土意識的結果導致中國（相對臺灣的他者）極小化，而臺灣極大化；顛覆其他民族國家的既定觀念，由邊緣向中心回流改寫，以達到敘述認同的目的。

（二）

本土論述在臺灣的發展，可追溯至鄉土文學論戰時期。本土意識之興起，基本上與日貨大量扣關，以及美國於冷戰時期對臺灣所行使的新殖民策略和文化侵略有關。針對跨國公司的經濟侵略，以及城鄉差距的擴大，70年代的鄉土文學以勞工階級為主體，對於城鄉差距、跨國剝削、資源不均所造成的社會不對等權力分配，以及跨國公司對臺灣的變相壓抑，乃至於臺灣退出聯合國之後國號的代表性，從這些面相來進一步反對殖民和外在體制的自由市場對臺灣的入侵，而使臺灣淪為加工出口區和色情文化的旅遊地<sup>52</sup>。極為明顯的文本論述即是王禎和的《玫瑰玫瑰我愛你》和陳映真的《雲》。而造成本土化深刻的現象，至少包含八點：一、政治人物、軍人與行政人員的族群交替；二、政治象徵的變化；三、政治機構；四、有關臺灣認同與兩岸關係的官方言論；五、政治社會化，包括教科書；六、語言政策與社會語言自然的變化；七、在社會中，臺灣各地本土文化的復甦；八、若干臺灣電影與電視節目的本土色彩<sup>53</sup>。

萬商帝君 中，林德旺的姐姐素香臨別前說了一句話：「花草若離了土就要枯黃」，此處擬仿鄭思肖「失根的蘭花」；在此同時陳映真把家（鄉土）和世界（跨國公司）形成一個對立的局面：代表家的姐姐（女性）職業是乩童，象徵的是精神的純淨和自我，代表世界的跨國公司（男性）則象徵物質的無厭追求<sup>54</sup>；失去了精神層面，再多的物質也無法彌補虛空，也強調出鄉土的崇高無價，是凌駕於所有事物之上。

「離散」是一種離鄉客居的處境，最早來自希伯來語，意指猶太人在「巴比倫囚禁」之後散落異邦，不得返鄉的狀態；中世紀以來，離散被用來指稱大規模的民族遷徙，往往與戰爭或災難相連結。離散並非個人式的浪跡天涯，而是一種從整體走向零亂、文化碎片化、種族稀落化的狀態；家園與離散，是一種破碎之苦、離土之痛，也是一種扞格不入，一種居家的無家感<sup>55</sup>。弔詭的是，離散的結果導致在經歷了「邊緣向中心」（from margin to center）的流動之後，又重新在中心國家迴流集結成一種「中心裡的邊緣」（margin within center）<sup>56</sup>。現代社會造就了一群更為無根的人，他們是現代世界裡面被人調包的嬰兒，他們是社會、經濟與科技變遷的產物，是移民與文化的混血兒；他們的信仰、觀念和要求完全與先人脫鉤。其中或許有人還帶著祖宗牌位的殘片，有人則帶著起源的標誌，但絕大

<sup>52</sup> 見廖炳惠編：《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頁 174。

<sup>53</sup> 見高格孚：《風和日暖——臺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頁 76。

<sup>54</sup> 見彭小妍：《陳映真作品中的跨國性企業——第三世界的後殖民論述》，收入龔鵬程編：《臺灣的社會與文學》，頁 248。

<sup>55</sup> 見宋國誠：《後殖民文學：從邊緣到中心》，頁 16—頁 17。

<sup>56</sup> 見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第一章：臺灣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聯合文學》15 卷 10 期），頁 18。

部份都已經沒有「原鄉」可歸。同時，他們卻和那些有原鄉可歸的一樣，需要有所歸屬，需要安全感；因此，他們被迫以新的方式來滿足原始的需求，如果遍尋卻不可得，他們就會去搭建或創造一個新的原鄉<sup>57</sup>。

在「永恆的大地」裡，「兒子」是一個「沒有故鄉，卻同時又是個沒有懷鄉病的遊子」：

自小我便在咒罵中相信我是個可恥的敗家子。我不得不希望著回家去，回到了我鄉愁的故鄉去<sup>58</sup>！

他對腳下踩踏的土地缺乏認同，而且這塊土地也非父親念茲在茲的家鄉，因此鄉關何處對他而言無關緊要。

趙南棟 的葉春美，出獄後自覺有如蒲島太郎一般：

她怎麼也無法不感覺到，在她長期的監禁中，時間、歷史、社會的變化，已經使回到故里的她，在她的故鄉中，成了異鄉之人<sup>59</sup>

與年輕人不同的是，老人的「故鄉」就這麼收納在秘密的記憶盒中數十年，一經開啟，不見盒裡經時間積澱而成可裝飾青春的寶珠；卻只在瀰漫滿眼如海市蜃樓的煙障內，驚覺盒外的歲月飛逝，故鄉卻不似自己一般的齒危髮禿、搖搖欲墜，而是進步神速，返老還童。

將軍族 裡的兩位主角藉由身份模糊和認同碎片化的悲劇過程，來表達從國族主義和身份自我（認同主體）的逃離，達到一種超越自我、跨進他者、異質互享的新人性模式。萬商帝君 的劉福金以本土自居，但卻又不得不承認「他們中國人，真厲害」；陳家齊言外之意地告訴他，對襟唐裝的臺灣老人，以及如陳父的固守傳統的中國人，實際上僅是個別、少數的；在跨國性企業的管理下，傳統的個性必須被泯滅，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的名言方為神主，在經濟至上的旗幟之下，產出了全新的本土化與認同。

在此試提出看法：如果說拋棄外國人的名字（如日治時期所取的日名，終戰後又更為漢名）就如同改變國家的名字，成為前殖民地人民自我認同與文化認同最簡便、最常見的方式<sup>60</sup>；那麼再選擇外國人的名字作為自己的第二身份（如萬商帝君 的劉福金 H.K.），是否即是後殖民時期人民自我認同與文化認同最簡便、最常見的方式？

（三）

<sup>57</sup> 見 Harold R. Isaacs 著，鄧伯宸譯：《族群》，頁 300。原文為「姆庇之家」(the House of Muumbi)，試以「原鄉」(primordial)代替。

<sup>58</sup> 見陳映真：「永恆的大地」，收於《陳映真小說集3 上班族的一日(1967-1979)》，頁 47。

<sup>59</sup> 見陳映真：「趙南棟」，收於《陳映真小說集5 鈴鐺花(1983-1994)》，頁 112。

<sup>60</sup> 見 Harold R. Isaacs 著，鄧伯宸譯：《族群》，頁 109。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無論是實踐革命救國懷抱，或戰亂拉伕就地安身，那些金戈鐵馬、安內攘外做先鋒的丘八漢子終究老了，老在硝煙味淡了的承平盛世，在「沒有親人死去的土地，是無法被稱為家鄉」的浮島。眾聲喧嘩的鬪鬧世道，他們熱血熱情的奉獻與冷清冷漠的失落，要說與誰聽？在沒有英雄的年頭，那些血肉之軀的勇氣和無懼；竹籬笆裡的悲歡人情，以及二度漂流的鄉愁和悵惘，都已成天寶遺事。

歸鄉 的題材，早在《人間》雜誌 38 期（1988 年 12 月），有一篇陳映真所撰文之「望斷鄉關盼征人」系列之一「解放被朝野歧視的臺灣人」，第一次提到「家族離散」非僅是在臺灣之外省老兵的切膚之痛：1950 年臺灣海峽封鎖後，曾被國軍第 70 師派遣至內地打內戰的 50000 名臺籍士兵，也因此與家鄉隔絕；斯時朝野各黨派均坐視不顧；當其中一些臺籍老兵歷經萬難終於返回後，卻又受到懷疑而成為列管戶。

陳映真 60 年代中期的大量作品是反映在臺灣的外省人的生活，或描寫外省人在戰亂中逃亡的苦難經歷和到臺灣後的絕望情緒，或描寫在臺的外省人對親人、故土的深切思念；或描寫外省人與本省人在危難中相濡以沫的骨肉之情，或抒發在臺外省人期望葉落歸根、回歸故鄉的熱切願望。而在《歸鄉》中，我們看到他的視野已經超越了 80 年代圍繞「政府當局單向的探親政策所引發的與國共內戰相關的社會問題，而更加深入地探討了 80 年代以降日漸意識形態化的省籍問題，社會走向富裕化後人性的異化問題等<sup>61</sup>。他在訪談中說：

我的確是用這個故事來對於臺灣區分外省、本省、中國人、臺灣人的主流意識提出質問。有一種意識形態認為臺灣人比較善良、樸實、勤勞；外省人比較奸巧、會欺負人、會拐彎抹角，這都是偏見和歧視。好像臺灣人都是犧牲者、被迫害的人、善良的人，他們落在奸詐的中國人裡受苦。那些老兵是臺灣人，可是這些善良的臺灣人恰恰是被「善良的臺灣人」欺負，欺負到這種地步：吞人家財產、不承認過去一切的恩情，而且是對自己的骨肉，這是可怕的<sup>62</sup>。

主人翁楊斌自嘲「我在大陸做了幾十年中國人，這回回到臺灣老家了，沒有人認我這個臺灣人，還當我外省人」<sup>63</sup>，滿心憤懣於「連自己的親弟弟，自己的親姪子，想吞占我的財產也就罷了，還硬生生編派我是共產黨，是冒牌來搶財產的外省豬」<sup>64</sup>。但不論是臺籍老兵或外省榮民，現今在身份認同上已對現實妥協，即開始願意承認自己是「大陸人」也是「臺灣人」：

<sup>61</sup> 見黎湘萍：《重返心靈的故鄉——重讀陳映真近年作品並論其新作《歸鄉》》，頁 14。

<sup>62</sup> 見宇文正：《訪陳映真談近作《歸鄉》：第二問》。

<sup>63</sup> 見陳映真：《歸鄉》，收於《陳映真小說集 6 忠孝公園（1995-2001）》，頁 65。

<sup>64</sup> 見陳映真：《歸鄉》，收於《陳映真小說集 6 忠孝公園（1995-2001）》，頁 66。

畢竟，臺灣和大陸兩邊，都是我的老家<sup>65</sup>。

取材自 2000 年的總統大選，藉此剖析臺灣複雜的歷史面向和認同情節的《忠孝公園》，在文本標題裡乃借「孝」以諷「忠」，子女不孝則老兵亦不須忠；「忠」在臺灣歷史上離散的定義值得深切探討。主角之一的馬正濤，典型的牆頭草性格，對於年輕時在滿州的耀武揚威頗為自滿，為求生存出賣陷害同胞不眨眼，但卻被「那些黑色的、總是帶著屍臭和血腥的記憶」所縈繞。他的代表性不及陳映真之前書寫的外省族群，但他性格中的矛盾與衝突卻是前所未有的。他背負的原罪較《夜霧》的李清皓更為沉重，但卻不見其有所反省；反倒是他的子姪對身份認同觸角敏銳；他也無所謂懷鄉意識，與其他臺籍中產階級一般，冷眼淡漠看待周遭事物，包括「林老頭」林標，只將之視為丑角，卻無意識到林標內心的純淨與他的污穢形成截然不同的對比。

陳映真在一篇訪談中提到：

《忠孝公園》結尾（林標）「我是誰？」的疑惑和孤獨，則是出自於一段沒有清理的歷史，就像我看到外省人的孤獨和恐懼一樣。因為只有進行過自我和全體歷史的反省之後，才能理直氣壯的說我是中國人，因為我已經想過、凝視過這個問題了。而對本省人來說，用比較流行的話語就是後殖民。殖民者一方面歧視你，但諷刺的是，在形成鴻溝的同時，卻又使你更加渴望成為和殖民者一樣的人。因此在《忠孝公園》中我想討論的便是這樣複雜的殖民與被殖民情結<sup>66</sup>。

《忠孝公園》的另一主角林標，即為陳映真的話語代言人。當他回憶起早年徵召入伍成為所謂的「臺籍志願兵」，在南洋地區遭受的待遇：「當臺灣兵走在大街上，開店的華僑表面上堆著諂笑，但眼中深處卻透露著把臺灣人日本兵當作真日本人的恐懼、憎恨和嫌惡」<sup>67</sup>，而且連當地「土人把臺灣兵也當成了日本人」<sup>68</sup>；「然而在實際上，即使需要臺灣兵在南洋的戰場上為日本拼命的時候，日本也會不時地提醒臺灣人其實並不是真正的日本人」<sup>69</sup>。林標確實在申請補償金方面十分痛恨日本，弔詭的是，一起始在日本戰敗之後，「被以『戰勝國國民』之名和日本人分開，（林標）覺得一失去了與日本一起為戰敗同聲慟哭的立場，而無緣無故、憑空而來的戰勝國國民的身份，也有一點不能帶來『勝利』的歡欣和驕傲」<sup>70</sup>；也因此到後來「說不出甚麼原因，林標自己也常常納悶，一看見日

<sup>65</sup> 見陳映真：《歸鄉》，收於《陳映真小說集 6 忠孝公園（1995-2001）》，頁 67。

<sup>66</sup> 見郝譽翔：《感傷的凝視——陳映真最新中篇力作《忠孝公園》》，頁 6。

<sup>67</sup> 見陳映真：《忠孝公園》，收入《陳映真小說集 6 忠孝公園（1995-2001）》，頁 148。

<sup>68</sup> 見陳映真：《忠孝公園》，收入《陳映真小說集 6 忠孝公園（1995-2001）》，頁 148。

<sup>69</sup> 見陳映真：《忠孝公園》，收入《陳映真小說集 6 忠孝公園（1995-2001）》，頁 149。

<sup>70</sup> 見陳映真：《忠孝公園》，收入《陳映真小說集 6 忠孝公園（1995-2001）》，頁 153。

本人，不管怎樣，就油然地感到親愛，心情暢快，一聽見日本話，就自然地調轉舌頭，即使結結巴巴，也充滿熱情地講起日本話」<sup>71</sup>。一方面或可說是日本皇民化教育對國語教育的再次獲勝，另一方面卻也證實了這些臺籍老兵對殖民宗主國的愛恨糾葛心理。

對林標和馬正濤而言，二人曾同時處於相同的空間，也曾共同使用一種語言（日語），但在他們心目中，忠的對象——國家虛無縹緲、似有若無；不是不能為他（林標）謀求福利，就是可能剝奪他（馬正濤）苟活的僅存意義。「忠」對大多數的臺灣人而言，已成為懸掛在校園中的標語，沒有對象如何盡忠？求溫飽甚於一切。

從前臺灣人去日本索賠，國民黨的政府不出面。 咱們幫過日本人打中國人，能指望這個政府為你出面做主嗎<sup>72</sup>？

林標寄希望於民進黨主政之政府：「如今就會有機會『換一個臺灣人自己的政府』，換成了臺灣人向日本政府索賠，就有人做主」<sup>73</sup>，結果卻是徹底地失望。同樣地，馬正濤也惶恐於新政府刨根追底的可能性：

自今而後，那密密地封存在各個機關裡的，附有他親筆簽註的無數殺人的檔案，難保沒有曝光公開的一日。他成了墜落在無盡的空無中的人。他沒有了前去的路途，也沒有了安居的處所。他彷彿忽然被一個巨大的騙局所拋棄，向著沒有底的、永久的虛空與黑暗下墜<sup>74</sup>。

在馬正濤甚麼都不在乎的表象下，隱藏著背叛教條與社會規範的內愧不安，導致最終的毀滅結局。遭逢政局的巨大變遷時，不只是馬、林二人，所有居住在臺灣的人們都必須重新思考、重新為自己找尋出路。

<sup>71</sup> 見陳映真：忠孝公園，收入《陳映真小說集 6 忠孝公園(1995-2001)》，頁 226。

<sup>72</sup> 見陳映真：忠孝公園，收入《陳映真小說集 6 忠孝公園(1995-2001)》，頁 160。

<sup>73</sup> 見陳映真：忠孝公園，收入《陳映真小說集 6 忠孝公園(1995-2001)》，頁 160。

<sup>74</sup> 見陳映真：忠孝公園，收入《陳映真小說集 6 忠孝公園(1995-2001)》，頁 220。

??? 力??? 捷???? 嬌? 咖? 役

?? 乏 ??????? ?

(一)

唐寧(Dunning)將跨國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界定為「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進行國外直接投資，並組織貨品生產或服務的企業」，其範圍和集中度受到下列因素的影響：子公司的數目、國家的數量、國外活動佔總活動的比例、所有權和管理的國際化程度、集中管理和研究活動的國際化程度、以及駐在國的優劣勢等<sup>1</sup>。美籍日裔學者三好將夫作過這樣的解釋：「真正的跨國公司可能不再與它的原在國有密切的聯繫，而是可以脫離原在國，靈活機動，可以在任何地方設立企業，剝削任何一個國家，包括它自己的國家，只要這對它自己的企業有利就行。」<sup>2</sup>

跨國資本主義在世界各地傳播其文化商品的唯一動力，是單一的資本主義文化。所有國家的文化，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統合下，出現一個籠罩在資本主義下的文化；而跨國公司支配著世界經濟，其運作獨立於政治安排且能對其遂行經濟支配。這些公司設定了全球連結和交換體系，逐漸將全球構築成商品、勞工和資本的單一市場。美國馬克思主義媒體理論家舒勒(Herbert Schiller)認為，資本主義以跨國企業為其主要媒介，相當無情地將所有社會吸納進它的範圍內。在資本主義的世界系統運作中，與跨國企業合作的跨國媒體擔任了擴張功能的任務，徹底地整合全世界：「他們提供影像和訊息，根植於人們的信念，創造並加

<sup>1</sup> 見 Malcolm Waters 著，徐偉傑譯：《全球化》，頁 118。

<sup>2</sup> 見王逢振：《文化研究》，頁 174。

強他們自身群眾的訊息聽聞，強化對整體系統中事物的固定想法」，在商業包裝的媒體產品下，隱含了資本主義與消費主義提倡的人種理念與價值觀。換言之，這是生活方式的文化改頭換面，更是開發中國家唯一能跟隨的發展途徑<sup>3</sup>。

跨國企業的新權力及戰略潛力來自於對現代社會物質生存命脈的干預，而且這種干預是在正常事務的持續之中展開的。跨國企業是從一種風險社會的博奕中獲得它們的權力；並非從已實踐的經濟全球化的「真實的損害情形」取得，例如完全將工作位置轉移至低工資國家，而主要是以可能發生的威脅、關於此的公眾談論，挑起了恐懼，使人膽怯，最後可能迫使政府和工會利用自己的力量實現投資者所要求的，以避免更糟的事情發生<sup>4</sup>。

跨國企業獲得了將工作位置和應納的稅收在世界社會的棋盤上布局的先機，將利潤最大化，但也因此剝奪了已開發社會福利國家的權力和組織機會。決定性的新變化在於：跨國企業擁有在民族國家之間挑撥離間的能力，而非其在數量和多樣性上的增加<sup>5</sup>。它們作為非政治力量，不僅成為全球社會和經濟領域中的重要角色，而且影響著主權國家的行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國家的束縛來追求自己的目標<sup>6</sup>。

早期帝國主義國家對貧窮落後國家採用船堅砲利進行武裝侵略以打開其商品市場門戶的戰爭手段，受到世界各種族人民的反抗；後期的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卻憑藉其先進的科學技術和龐大的資本優勢，發展多國籍的跨國企業，採取多種非武力方式，包括干涉及影響對象國家的政府政策和主權內政，從而達到開拓世界市場、大量推銷商品以謀取高報酬率的目的；這種看似和平的手段其實具有相當的迷惑性和欺騙性<sup>7</sup>。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在商品輸出的同時，還並時輸出他們的意識形態，包含政治主張、社會理想、生活方式、道德觀念等，這就向大眾揭示了經濟、文化領域裏的一場和平戰爭的實質，表明了第三世界人民面臨著一場寧靜的挑戰：對於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強大的資本優勢和文化形態的衝擊，要如何在開放吸收中自立自強，在交流互利中與之競賽，從而尋求民族振興之道、迎頭趕上之途徑<sup>8</sup>。

跨國公司借助技術進步和市場擴展開始遍及全球，成為全球經濟的主角、對外直接投資增長的重要動力。從二十世紀 60 年代以來，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量和流量的增長速度超過了世界收入增長速度。為數甚夥的跨國公司的經濟規模超過了許多中小國家，其營業額的增長超過了世界產出；其出口占世界出口的大部分，國外分支機構的銷售額超過了全球總出口額。跨國公司實力的增強不僅使其成為制約民族國家主權的重要力量，也將一些與市場有關的價值理念和文化形式

---

<sup>3</sup> 見 John Tomlinson 著，鄭元、陳慧慈譯：《全球化與文化》，頁 81 頁 82。

<sup>4</sup> 見 Ulrich Beck 著，孫治本譯：《全球化危機 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頁 159。

<sup>5</sup> 見 Ulrich Beck 著，孫治本譯：《全球化危機 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頁 91。

<sup>6</sup> 見楊雪冬：《全球化》，頁 163。

<sup>7</sup> 見武治純：「華盛頓大樓」初探，收入詹宏志等：《文學的思考者 論陳映真卷》，頁 76。

<sup>8</sup> 見武治純：「華盛頓大樓」初探，收入詹宏志等：《文學的思考者 論陳映真卷》，頁 74。

傳播到更廣大的地區<sup>9</sup>。在這種情境之下，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絕對空間的區分逐漸消失，剝削者無處不在，被剝削者也無處不在。

現代社會典型的「去領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包括了為跨國企業海外子公司工作的人，可能會有的「跨國」依賴感：現代性中的錯置(displacement)經驗並非是異化，而是矛盾的組合。人們僅是短暫的擁有現象世界中的當地生活，而在某種程度上，認同建構這種所有權的遙遠力量<sup>10</sup>。漢納茲(Hannerz)提出人們對於全球化的過程存在兩種心態：「有世界主義者，也有本土主義者」，世界主義者是「無拘無束，在世界各地移動，希望能融入其它不同文化，最重要的是必須願意和其他文化接觸，必須在道德和智識層面採取開放的立場，願意接受歧異的文化經驗，承認其差異性而不尋求一致性」，跨國公司雇員派駐國外時，仍惦記著家鄉文化，因而「仍過著家鄉大都會生活，而非成為世界主義者」；多數的西方跨國文化並不能視為是世界文化，僅僅是全球化的「西方文化孤島」(occidental cultural enclaves)。維達(Vidal)則以之為本土主義的相對面，是提供所有財富、令人陶醉而極具魅力的路線：「在跨國企業和政治、經濟菁英穩健的雙手中，世界主義提供最好的科學、最先進的生物遺傳學、電腦、解決社會弊端的萬靈丹 和關於互賴、互動、無限的溝通和解決方案等新全球語言。」<sup>11</sup>

## (二)

陳映真、王禎和後期的「殖民經濟小說」(或稱「跨國企業小說」)雖然以臺北都會為中心，卻更注視著美國、日本經濟侵略對臺灣人民性格的戕害。因其批判態度鮮明，題材選擇集中，初看起來，難免會有一些狹窄化的傾向<sup>12</sup>，但就目前的視角而言，倒也不脫離現實層面太遠。

在陳映真的 最後的夏日 裡，因為生意不佳而結束營業的謝醫生，將倒閉原因歸咎於美日產品的競爭力太強：

謝醫生說，陸伯伯，媽咪和他自己合資的公司倒閉了。「美國和日本的進口貨做得比我們好，我們競爭不過。」陸伯伯說<sup>13</sup>。

這種諛過心理自古至今並未因時代變遷而有所消滅，只是找到一個合理性較強、容易說服自己與他人的理由來掩飾自身的無能，同時也反映出「外國的月亮較圓」的普遍崇洋心態。

華盛頓大樓 系列作品深刻地反映了當代臺灣人民在發達國家資本輸出的經濟體制下的生活狀況、文化衝突和人性異化問題。萬商帝君 圍繞臺灣莫飛

<sup>9</sup> 見楊雪冬：《全球化》，頁 37。

<sup>10</sup> 見 John Tomlinson 著，鄭元、陳慧慈譯：《全球化與文化》，頁 123。

<sup>11</sup> 見 John Tomlinson 著，鄭元、陳慧慈譯：《全球化與文化》，頁 207 頁 213。

<sup>12</sup> 見趙遐秋、呂正惠主編：《臺灣新文學思潮史綱》第八章 世紀末期臺灣後現代思潮種種面相，頁 342 頁 343。

<sup>13</sup> 見陳映真：最後的夏日，收於《陳映真小說集 2 唐倩的喜劇(1964-1967)》，頁 119。

穆公司的跨國行銷會議，十分深入地探討了跨國企業下的文化、民族認同、人性異化等問題，從而更加凸顯了跨國公司國際資本的經濟擴張和文化滲透帶給人們的文化、人性戕害。陳映真要言語的重心是：不論是臺灣籍的劉福金，還是外省籍的陳家齊，都已在跨國公司的「教育」下成為世界公民，從而喪失了民族意識<sup>14</sup>。

趙南棟 中理想主義者趙慶雲和宋蓉萱的「兒子」趙爾平，由於父母雙雙繫獄故從小寄人籬下。因之生成的強烈「孤兒意識」促使他努力不輟，想要及早重建他們的「家」。「家」是建立起來了，然而自我毀滅的種子也已埋下。是在跨國公司中，他爭得了他所想望的社會地位，但也正是跨國公司所代表的經濟形態，最後腐蝕了他「進德修業」的上進心，使他終於走向「墮落」的最終點<sup>15</sup>。

雲 從兩條主線突出主題意識，一條主線是描寫工人階級與帝國主義跨國公司的矛盾，另一條主線則是表現新舊工會之間的矛盾；既揭露了帝國主義掠奪手段的多樣性，又表現了帝國主義「企業的安全和利益重於人權」的掠奪的根本原則：

企業，只懂得成長，只懂得擴張 企業唯一缺少的東西，就是心肝<sup>16</sup>。

隨著跨國資本的發展，文化也進入跨國化的過程，形成所謂的全球文化；亦即因跨國資本主義使得各種文化更加貼近，透過傳播媒體互相交流、滲透，乃至於融合，而改寫各種文化原有的特徵。跨國公司的經營者們（包括發展中國家的某些人）會互相勾結，形成跨國資本家階級，他們不與任何一個特定的外國認同，也不一定與第一世界或白人世界或西方世界認同。他們認同於全球的資本主義制度，利用資本滲透到偏遠的地區，傳播每一種影響個人主體構成的消費意識形態，將每個個人都納入其大千世界；目的為了逐步打破人們原有的主體性，在世界範圍內將人們改造成消費的主體。一旦人們成為消費主體，就會無意識地進入跨國公司的意識形態範疇，接受「全球資本主義制度」的觀念和影響，失去原有的文化同一性或文化身份。

在陳映真的小說裡，華盛頓大樓做為一個地理上的隱喻，作者的企圖在於重新召喚一種民族自尊：以「華盛頓」為西方的代碼，以「大樓」作為現代都市文明的濃縮體；此一設定不僅僅是為了批判臺灣在冷戰後期繼續附庸美國而形成的島嶼經濟形態與殖民地性格的社會情境，同時更以被「符碼化」為經濟帝國主義爪牙的華盛頓大樓的意象，來激盪臺灣人在現代化過程中被磨蝕的國族思想<sup>17</sup>。

<sup>14</sup> 見呂正惠：《從山村小鎮到華盛頓大樓——陳映真的歷程及其矛盾》，收於自著：《小說與社會》，頁 68。

<sup>15</sup> 見呂正惠：《歷史的夢魘——試論陳映真的政治小說》，收於自著：《小說與社會》，頁 201—202。

<sup>16</sup> 見陳映真：《雲》，收於《陳映真小說集 4——萬商帝君(1980-1982)》，頁 78。

<sup>17</sup> 見林耀德：《當代臺灣小說中的上班族/企業文化》，收於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五十年來

《華盛頓大樓》系列中被視為他者的是名符其實的異邦人征服工具 跨國企業附庸於其麾下而欠缺民族意識的臺灣人；相對地，如詹奕宏等人處身於華盛頓大樓的建築物時，則又轉變成為跨國企業中的他者<sup>18</sup>。受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所支配的邊緣國家和地區（第三世界）在市場上、經濟上、政治上，以及觀念、精神上、語言上，甚至人格上被「殖民地化」，把追逐利潤的資本擴張的欲求當成了人類的普遍原則；萬商帝君 透過來自美國首府華盛頓的跨國公司的代表人物關於現代行銷(marketing)的雄辯，以及懷著發財和升遷的夢幻，不斷地背誦這些雄辯的催眠術而或升遷，或墮落，或者終於瘋掉的本土(native)大小人物們，陳映真塑造了一個充滿嘲諷意味卻又引人深思的世界<sup>19</sup>。

王禎和亦不遑多讓。《小林來臺北》及《美人圖》的場景設定為一跨國航空公司之臺灣子公司，「公司編制早由美國總公司定好」，上從經理下至訂位人員一進公司馬上面目全非（當然私底下亦醜態百出）；有文評家解讀為都市生活腐化人心，唯主角小林及少數無權勢者保有純真之心，其實另可解讀為跨國企業的「科技改變了人性」。

?? 乏 ? 偲掘? 咖?? 掌?????

（一）

薩依德以「歸航」(voyage in)這一概念來概括從邊緣向中心的回寫(writes back)運動，這是一種文化回流和反吸納的過程，它以「都會遭遇」(metropolitan)為其運動場域。都會，尤其是西方國家移民人口集居的大都市，為邊緣文化的潛伏滲入、蘊育和集結文化反抗力量，提供了地理的優勢。它很容易形成一種「文化併生結構」(-formations)，並且以前衛姿態和主流結構形成「挑戰 融合」的競述空間，進而達到消解西方正典論述的效應<sup>20</sup>。

巴巴說：

城市是流動人口、少數民族、異鄉人的聚集點，也是改寫民族歷史的地方。 城市為人民提供了適當的舞台，讓新興的身分認同與社會運動蓬勃發展；西方如此，其他地方也越來越有這個現象。在我們這個時代，城市是生存者對受困經驗感受最深刻的地

---

臺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一） 臺灣文學中的社會》，頁 186。

<sup>18</sup> 見趙遐秋、呂正惠主編：《臺灣新文學思潮史綱》第八章 世紀末期臺灣後現代思潮種種面相，頁 193。

<sup>19</sup> 見黎湘萍：《重返心靈的故鄉 重讀陳映真近年作品並論其新作《歸鄉》》，頁 12。

<sup>20</sup> 見宋國誠：《混雜 換語，回寫帝國中心 魯西迪和他的魔幻後殖民小說》，收於 Salman Rushdie 著，劉泗翰譯：《憤怒》，頁 7。

方<sup>21</sup>。

新馬克思主義論者認為第三世界國家的內部空間結構往往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生產及消費活動的一部分，而第三世界的生產結果通常透過跨國企業，集中在國外或國內都會地區的資本家手中。基於累積資本的恆定法則，統治階級會將資本累積在中心都市互相交換而不會下瀆到邊陲地帶，因而造成城鄉差距增大的結果。城鄉差距也可能隨著都市化程度的職業更動、教育程度提升而產生，也可能由於傳統農業被破壞，農民無以為生而產生人口流動現象。

戰後臺灣社會與臺灣文化二元化的剖分，表現在經濟上的官業私業二元化，也表現在社會階層的本省外省二元化，文化交流的城鄉二元化。從 60 年代實施以農業發展工業的模式，以低糧價政策排擠農民，提供工業發展所需的勞動力，同時納入世界市場的出口導向也導致了原有的農業生產陷入波動、不穩定的劣勢。而後 70 年代以外銷為主的簡單加工產業，使這些中小型工廠進駐農村，再次轉化農村結構，鞏固人口外流的固定移民模式；而農村也因而喪失了自給自足的維生系統，迫使農村子弟出外打拼、謀生，淪為異鄉遊子<sup>22</sup>。

## （二）

尉天驄教授提到：

王禎和生活的世界有兩個，一個是以他的故鄉花蓮為基點的那個樸實的農業社會，一個是他為了舉家溫飽不得不在那裡打拼的大都市，特別像臺北這樣一個高度消費社會的地方。這兩個世界不是分離的，而是相互有著種種影響的關係。這兩個世界，就時間而言，是農業社會往工商業的高度消費社會演變；就空間而言，是中心地帶往邊緣地帶擴張。這樣以來，於是王禎和筆下的人物，一面是那些被玩弄、被扭曲的、憨厚的一群；一面是玩弄別人、狡猾而奸詐的一群<sup>23</sup>。

書寫人物處身於都市與西方邊緣的本土情感，面臨強大的壓迫和挫折；王禎和的這種不斷凸顯臺灣本身不在自身文化中心的邊緣認知，楊照先生剖析其形成原因：

<sup>21</sup> 見廖朝陽：異文典與小文學：從後殖民理論與民族敘事的觀點看《紅樓夢》，頁 12。

<sup>22</sup> 見方婉禎：從城鄉到都市 80 年代臺灣小說與都市論述，頁 79。

<sup>23</sup> 見尉天驄：消費文明下的屈辱與憤怒 談王禎和的 小林來臺北，頁 38。

王禎和的邊緣性之一，是他強烈感受到花蓮在臺灣的後山地位。花蓮之於臺北，是明確的邊緣，正如在模仿西方，對西方產生愛憎交集的複雜情緒一樣，花蓮也在模仿臺北、欣羨臺北、拉攏臺北，同時又拒斥臺北。王禎和的邊緣性之二，是小市鎮的出身經歷。現代化進行中的小市鎮，有一種曖昧尷尬的浮游特性。小市鎮已經脫離了傳統農業經濟網路，舊的組織不再有力量約束、舊的集體經濟系統也不再能夠發揮功能，但是都會所能帶來的明確新奇方便，卻還無從確立其權威。而且和不斷貧窮下降的農村，及日益擴大的主要都市都不一樣的；小市鎮的命運朝夕皆不同。初萌芽而尚未穩定的商業結構，沒有完整規畫隨興開發的交通基礎建設，都使小市鎮可以一夜爆發，更可能一夜沒落。王禎和最熟悉的年代花蓮市，正就是這樣一塊具有雙重邊緣性的浮游空間。

他一再強調要寫「自己熟悉的地方」，每強調一次，幾乎毫無例外，就回歸花蓮一次。即使是 小林來臺北、《美人圖》，他都是執持著「外地人」的眼光來記錄臺北、寫作臺北。他除了是現代主義的邊緣人外，還是臺北現代經驗的邊緣人<sup>24</sup>。

1970 年代的空間背景，是中心區的大都市式的生活徹底征服邊緣地區的時代。在王禎和的 小林來臺北 中，臺北是個「相對於小林出身的養鴨之鄉」在疾速現代化、國際化發展航線上充滿階級歧視和崇洋虛榮的罪惡淵藪。小林所處身的臺北和臺灣的鄉土「廣大而經濟落後的農村」失去了聯繫，成為象徵性過客飛往舊金山的起跑點<sup>25</sup>。他把臺北描寫成一個並不僅僅是來自不同階級、文化與宗教背景的各色人等、橫跨非常不同的歷史偶合所組成的複雜群居社會；而是一個「轉運的港口」，人們來來去去的中途站，一個金錢為尚的城市。居於其上的居民視自己不過是過客，即使定居於此，人人也都抱持相同的價值觀，追求物質、享受物質，人人適應環的能力特強，都是善於把握商機，老練世故的生存戰士<sup>26</sup>。

<sup>24</sup> 見楊照：「現代化」的多重邊緣經驗——論王禎和的小說，收於自著：《夢與灰燼——戰後文學史散論二集》，頁 122—123。

<sup>25</sup> 見張大春：《當代臺灣都市文學的興起》，收於張寶琴、邵玉銘、？ 弦主編：《四十年來中國文學》，頁 163—164。

<sup>26</sup> 見陳麗芬：《文學批評與文化身份——周蕾「後殖民」香港》，收於自著：《現代文學與文化想像——從臺灣到香港》，頁 28。

唯獨遭受欺壓的小林可說是帝國霸權（美式文化）與都會文明（冷漠無情）的雙重受害者，明顯呈現出王禎和城鄉對立的二元思維。

陳映真的「華盛頓大樓」系列相對於 小林來臺北，也突顯了城鄉對立的二元模式：因為城鄉發展的差距，導致農村人口外流至都市掙扎謀生，其原因不外乎都市扼殺鄉土發展，甚至是帝國主義透過首善之區控制、操弄第三世界國家。萬商帝君 的林德旺（名字何其反諷！）離土失根，一味崇信帝國主義文化的價值理念，拋卻自身固有的傳統根源，到最後迷失自我主體，陷入心智狂亂、精神失常的萬劫不復之地。都市為跨國資本主義的重要象徵及其在臺灣發展的根據地；城市為罪惡之集散地，鄉村才是純樸和善之烏托邦。

從大中國到臺灣各地的眷村，是土地實存的位移；從臺灣本土到由本土都會所發展出的世界性，是實存（所蘊含之某一特殊質性）外向無限擴散後的虛化。而當它幻化成文字之城塚的鋪排衍生後，則又轉變為純美學式的慾望投影，由此可知家國之浮動不居，是與時與人俱變的<sup>27</sup>。

### （三）

由神權至上的城市過渡到君權的城市再遞嬗為晚近的商業都市，原本以家族為軸幹的傳統居住形態逐漸地趨向現代的獨立個體單位演進。個人私領域的擴張意味著：人與人之間的連結關係將因此變得薄弱。

萬商帝君 的陳家齊評論劉福金的廣告影片(C.F.)說：

整個臺灣農村早已改變了「田園的」舊容，現代成衣老早取代了對襟唐裝；牛仔褲更是年輕農夫的日常穿著。家具變了，大量的廉價家具取代了曾經沿用幾代的桌椅。電視機、電冰箱、機車、鐵牛車甚至小發財貨車、小轎車逐漸流入農村。傳統的老房子拆下來，新蓋的農家雖然沒有樣子，卻越來越接近鄉鎮和城市。農村中的語言變了，價值也變了<sup>28</sup>。

因此「在茂密的竹林蔭下，一座古井旁邊，一對穿著對襟唐裝的老夫婦坐在安樂藤椅上納涼，手搖著蒲扇」<sup>29</sup>只是劉福金個人「想像的鄉愁」(imaginary nostalgia)。

中央與地方，都市與鄉村，在中國/都會文化與臺灣/邊緣鄉村的政治邏輯之下，推衍出臺灣奇特的都市與鄉村文化，使鄉村不但沒有受到都市發展的好處，

<sup>27</sup> 見梅家玲：8、90年代眷村小說家的家國想像與書寫政治，收於自著：《性別，還是家國？50與8、90年代臺灣小說論》，頁169。

<sup>28</sup> 見陳映真：萬商帝君，收入《陳映真小說集4 萬商帝君(1980-1982)》，頁164。

<sup>29</sup> 見陳映真：萬商帝君，收入《陳映真小說集4 萬商帝君(1980-1982)》，頁158。

反而成了都會文化的垃圾場。而在這種中國與臺灣城鄉關係的邏輯上，還存有美國與臺灣之間的城鄉關係：早期臺灣依賴美援且迄今仍然不改其作為貿易與資訊邊陲的地位。美國都會文化所不願消費的農產品或過期的工業產品，便傾銷到臺灣這個「鄉下」，成為都會的舶來品，鄉下人身邊的工業垃圾<sup>30</sup>。

陳映真之所以對繁華都會深惡痛絕的根本原因，可說是出自他第三世界文學觀的思考，認為強勢的西方帝國主義，透過首善之區控制、操弄第三世界國家；對陳映真而言，都市是跨國資本主義的象徵。而王禎和則以人性為出發點，批判了冷漠現實、虛偽空浮的都市競爭法則，對於人性的壓迫與扭曲。套用德希達的言語，對林德旺、小林等人而言「大都會對我代表了他鄉，一個堅強的堡壘，又是一個異域」<sup>31</sup>。

?? 乏 ? ? ? ? ? ? ?

(一)

麥爾康 華特斯(Malcolm Waters)將全球化(globalization)界定為「一種社會過程，其中地理對社會和文化安排的束縛降低，而人們也逐漸意識到這種束縛正在降低」。全球化是歐洲文化經由移民、殖民與文化模仿而擴張到世界各地的直接結果，而它伸入文化和政治領域的支脈在本質上也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形態有關；但在另一層意義上，全球化也是高度的歐化，社會安排甚至是政治安排的去領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sup>32</sup>。

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歸納了全球化的主要現象，認為「全球化可界定為全世界社會關係的強烈化(intensification)，這些社會關係以這種方式連結遠方的在地性，亦即地方事件受到遠在天邊的事件所編派，且反之亦然。這是個辯證過程，因為地方事件也可能從拉非常遠的、編派它們的社會關係那裡迎面而來。地方轉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就如同它也是穿越時空的社會連結之側面延伸。」<sup>33</sup>

貝克(Ulrich Beck)認為全球化「是指在跨國行動者及其權力機會、取向、認同和網絡的運作下，民族國家及其主權受到打擊及穿透的過程」<sup>34</sup>，「也是指：非世界國家(Nicht-Weltstaat)。更正確的說：無世界國家且無政府的世界社會」。<sup>35</sup>他同時並指出：「全球化是可經歷的日常生活行為的疆界瓦解，這些行為發生於經濟、資訊、生態、技術、跨文化衝突和公民社會等面向；全球化同時是熟悉的和未被理解的事物，它很難被理解，卻藉著可經驗的力量在基本上改變了日常

<sup>30</sup> 見廖炳惠：《母語運動與國家文藝體制》，收入自著：《回顧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論文集》，頁 263。

<sup>31</sup> 見 Jacques Derrida 著，張正平譯：《他者的單語主義 起源的異肢》，頁 46。

<sup>32</sup> 見 Malcolm Waters 著，徐偉傑譯：《全球化》，頁 2 頁 3。

<sup>33</sup> 見裴元領：《全球化的欲望邏輯》，收於黃瑞祺主編：《現代性 後現代性 全球化》，頁 57。

<sup>34</sup> 見 Ulrich Beck 著，孫治本譯：《全球化危機 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頁 14。

<sup>35</sup> 見 Ulrich Beck 著，孫治本譯：《全球化危機 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頁 17。

生活，並迫使所有的人適應和回應。如此理解下的全球化是：距離的消失；被捲入經常是非人所願、未被理解的生活形式；或者可被定義為：不受距離（表面上分離的民族國家、宗教、區域、各大洲）限制的行為和（共同）生活。」<sup>36</sup>薩依德也提出「自我和『他者』的身份絕不是一件靜物，而是一個包括歷史、社會、知識和政治諸方面，在所有社會由個人和機構參與競爭的不斷往復的過程。」因此在全球化時代下，構成一個民族認同的基本要素，將與「他者」文化混合，從而呈顯出無可避免的雜交性(hybridity)<sup>37</sup>。

約翰·湯林森(John Tomlinson)將全球化定義為「一種隨時影響當代社會生活，快速發展且日趨緊密，各個層面相互依存且彼此相關連的現象」；麥克古魯(A.G. McGrew)則認為全球化是「全球相依程度的強化」，並強調此種多元關連性：「使得財貨、資本、人員、知識、影像、犯罪、污染、毒品、流行時尚及信仰，無一不跨過地域版圖之限制，從學術研究到兩性關係，都被跨國傳播網路、社會運動、人際和層級關係所影響」。<sup>38</sup>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批判全球化「是一小撮強國對全世界各國金融市場控制的延伸」，透露出世界結構的約束力；史凱勒(Sklair)認為跨國實踐(transnational practices)的全球體系主要由資本主義加以組織，並在三個層次上運作（經濟、政治與文化意識形態）；各層次都被一個主要制度所控制，使其朝向全球化方向前進：跨國經濟實踐的主要場所是跨國企業，政治實踐的主要場所是跨國資本家階級，文化意識形態實踐的主要場所是消費主義文化。民族國家是跨國實踐「空間上的參照點」，各種跨國實踐在民族國家領域中交錯；而另一個重要的參照點是「以全球資本家為基礎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它確實引導著經濟的跨國實踐，同時也是努力支配政治和文化意識形態的跨國實踐最重要的單一力量」。<sup>39</sup>羅伯森(Robertson)則以為「國家社會作為制度化社會的形式此一觀念的擴散是全球化在一百年前開始步入加速階段的核心」，民族國家是有邊界的社會體系，它們會彼此爭奪資源和市場，且不必然在物質上是自給自足的；它們因而跨越國界，投入兼具合作與衝突性質的經濟、軍事、政治（外交）和文化交換，不同的結果和跨國的模仿將隨後發生，國家將會試圖把國際關係系統化，以便確保其自身生存的條件<sup>40</sup>。

羅哲璠(James Rosenau)在他所架構的鉅型全球結構(macro-global structures)中提到：1980年代晚期，一分為二的現象在國家中心世界和「多元中心世界」(multi-centric world)之間變得明顯，前者是由美國、蘇聯、歐洲共同體/歐盟、日本和第三世界之間的關係所組成，後者則由次團體、國際組織、國家科層體制和跨國行動者（如跨國公司）之間的關係所組成。多元中心世界努力的向國家爭取

<sup>36</sup> 見 Ulrich Beck 著，孫治本譯：《全球化危機 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頁 30。

<sup>37</sup> 見陶東風：《後殖民主義》，頁 152。

<sup>38</sup> 見 John Tomlinson 著，鄭元、陳慧慈譯：《全球化與文化》，頁 2。

<sup>39</sup> 見 Malcolm Waters 著，徐偉傑譯：《全球化》，頁 41。

<sup>40</sup> 見 Malcolm Waters 著，徐偉傑譯：《全球化》，頁 71。

自主性，而國家中心世界則是努力的維護政治制度的安全<sup>41</sup>。

（二）

為了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力和控制範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用各種手段支持本國資本的輸出，目的國多為其前殖民地或在地緣政治具有重大意義的地區；以至於在二次大戰之後相當長的時間裡，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資源型產業均處於外國資本的控制之下。在國家支持資本擴張的同時，資本家也在一定情況下參與國家的政治行動，充當其在東道國的政治代表。因此國家與資本家的聯合是資本主義進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根本特徵<sup>42</sup>。

在資訊化、全球化時代，許多傳統的觀念都受到了嚴厲的挑戰，其中最明顯的是國家和主權觀念的轉變。在全球化的架構下，政治議題不再是主導國際關係的唯一焦點，經濟、社會、文化乃至環保議題，都成為全球體系的重要組成環節，某些場合對經濟議題的重視甚至已經凌駕在政治議題之上。此一現象意謂著傳統主權概念的被解構、經濟全球化的日益加深，隨之而來的便是國家疆界的模糊化與主權行使絕對化的喪失，國家內的團體或個人，可以在經濟向度上對全球體系發揮不可忽視的作用<sup>43</sup>。

日本商業策略家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指出，從資本市場的觀點來看，民族國家絲毫無地位可言，「傳統的民族國家已經成為世界經濟中一個奇怪的角色，在世界經濟中根本無足輕重」；他認為「真正具有生產機能，並有廣大市場」的區域經濟方為我們必須關注的：「決定此區域大小的要素，不是政治版圖，而是因為它的大小規模，正符合今日世界經濟所需。他們彼此間的界線和連繫，才是這個沒有區隔的世界所需關注的」。他指出由於全球市場「鼓動一致的喜好和消費習性」，「製造生產全球性品牌的可樂、牛仔褲、講究設計的運動鞋」，已經創造出所謂的「跨國界文明」<sup>44</sup>。但弔詭的是，當消費藉由全球性的品牌而變得普遍化時，依恃成本優勢的製造卻變成在地化；例如 Levis 牛仔褲是在工資成本低廉的菲律賓製造等。

全球化不只意味著解地方化，而是需要「再地方化」為先決條件。全球從字面上看是無人能製造出來的。而且恰恰是「在全球範圍」生產和行銷其產品的公司，必須發展地方的條件——一方面，它們的產品是形成、立基於地方的基礎上；另一方面，能在全世界範圍內行銷的文化象徵，必須「汲取」於地方文化的原材料，如此才能生動、具爆發力和多樣化的發展<sup>45</sup>。

全球資本主義用越來越少的人類勞動力，以開闢利潤生產的新領域；人類勞動力及代表其之大眾組織（勞工政黨和工會）在各地都失去了交涉能力和社會影響。同時，與勞動市場隔絕，而且不再有在勞動市場上分配與交涉的物質與社

<sup>41</sup> 見 Malcolm Waters 著，徐偉傑譯：《全球化》，頁 49。

<sup>42</sup> 見楊雪冬：《全球化》，頁 33。

<sup>43</sup> 見李英明：《全球化時代下的臺灣和兩岸關係》，頁 155-頁 156。

<sup>44</sup> 見 John Tomlinson 著，鄭元、陳慧慈譯：《全球化與文化》，頁 15 頁 16。

<sup>45</sup> 見 Ulrich Beck 著，孫治本譯：《全球化危機——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頁 63。

會安全及整合機會的人，也越來越多。所造成的後果是：不僅不平等程度增加，而且社會不平等的性質也急遽改變，越來越多的民眾成了「無經濟行為能力」的人。越來越多的人在社會整合問題上失敗，亦即那些目前在尖銳化的能力競爭的漩渦中，已屬「弱勢的」、「受損的」或「殘障的」人；沒有或只有低學歷的人、生病的人，或是其優勢在通行的能力體系中不具重要性的人。所有這樣的人都受著社會地位下滑的威脅，在各種進入主流社會的規則的共同效應下，成為被排除、停留在外的人<sup>46</sup>。

（三）

「後殖民性正是一條將我們帶入全球性國際資本主義的軌跡」<sup>47</sup>，它只不過是文化與歷史的全球化的別稱。

萬商帝君 裡莫飛穆國際公司總經理布契曼先生對 The World Shopping Center 這個專有名詞作了一個解釋：

生產技術因生產的多國籍化，使「增進人類福祉與世界和平」的現代科技及其結果，遍佈到全球每一個角落，完成了經過縝密經營管理的全球性勞力的分工<sup>48</sup>。

他指出了跨國公司居於「世界管理者」的地位，以全球各國作為生產基地及消費市場牟利的特徵。不僅是勞力分工的國際化，更挾其經濟優勢開疆擴土拓展消費市場，假借著「增進人類福祉與世界和平」的偽善面具，加之以現代科技、傳播媒體的助長、裨益，使得全球資本主義的觸角得以伸入世界的各個角落。陳家齊看到了這種現象：

外國廠牌的電視、冰箱、農藥和飲料，不只在臺灣的鄉間流行，也在泰國、菲律賓、巴基斯坦、墨西哥、巴西的鄉下氾濫<sup>49</sup>。  
可口可樂在所到之處 不管那市場是如何貧脊 都有人在喝。本田、松田牌日本貨車，在整個東南亞的鄉村道上馳騁；牛仔褲、長頭髮、太陽眼鏡、世界名牌農藥和西藥、化妝品、香皂和香水 在我所到的整個東南亞農村中，不斷的普遍化<sup>50</sup>。

因此他認為「商品的國際性，創造了文化、思想和價值的國際性，古老的亞洲世界，在跨國性企業的管理中，『和平而自然地』泯滅了傳統的個性，而呈現出現

<sup>46</sup> 見 Ulrich Beck 著，孫治本譯：《全球化危機 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頁 132 頁 133。

<sup>47</sup> 見曹 莉：《史碧娃克》，頁 168。

<sup>48</sup> 見陳映真：萬商帝君，收入《陳映真小說集 4 萬商帝君(1980-1982)》，頁 134。

<sup>49</sup> 見陳映真：萬商帝君，收入《陳映真小說集 4 萬商帝君(1980-1982)》，頁 165。

<sup>50</sup> 見陳映真：萬商帝君，收入《陳映真小說集 4 萬商帝君(1980-1982)》，頁 166 頁 167。

代市場的同—性」<sup>51</sup>，這正是一語道出了全球化的精髓。

最後的夏日 裡，崇洋不僅僅只是單純地稱贊：

鄧銘光說蘋果西打原來就是美國的飲料。「R.C.Cloa 也是。」

「人家的東西，就是好。」<sup>52</sup>

在《玫瑰玫瑰我愛你》裡，大鼻獅稱讚阿恨炒的菜好吃，也用了如此的形容：

好吃得就像美國汽水的牌名：可口可樂<sup>53</sup>！

只要有人在的地方，不論窮鄉僻壤，或是極地沙漠，都會有可口可樂的蹤跡；延至今日，更有自美國延燒到全世界的金色拱門傳奇。這些商品其後所帶來的文化意涵，常會不經意地消滅當地的傳統文化，或與之交雜形成次級文化，或如前所述成為開發中國家的替代經濟來源。但不可不知的是，全球化必須通過在地化/本土化的擴散效應才能獲得落實，在地化/本土化必須通過全球化作為載體，其效應也才能擴散，本土化與全球化是相互建構/相互保證的辯證下結合的。

---

<sup>51</sup> 見陳映真：萬商帝君，收入《陳映真小說集 4 萬商帝君(1980-1982)》同註 28，頁 167。

<sup>52</sup> 見陳映真：最後的夏日，收入《陳映真小說集 2 唐倩的喜劇(1964-1967)》，頁 107。

<sup>53</sup> 見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頁 164。

??? 道???? 嶸????? 岢km券???? 婿?

?? 乏 岢????? 岢??

?? 嶸???? 岢???? 抨? 岢????????????? 岢???? 力岢???????

????????? 岢????????????? 嶸????????? km嶸?? 岢???????

?? 岢<sup>1</sup>?

*Jacques Derrida*

(一)

後現代主義認為，語言在當代社會除了交際功能外，還是有力的意識形態工具。它由受統治勢力影響的媒體左右，作用是維持現狀的平衡穩定，強化對人的麻痺控制，使個人變成集體意識的被動接受者，使個人意志服從國家意志。使用所謂的「標準語言」(national language)，會令人不由自主地保持自己的國家身份

---

<sup>1</sup> 見 Jacques Derrida 著，張正平譯：《他者的單語主義 起源的異肢》，頁 27。

(national identity), 增強對他者的差異感<sup>2</sup>。

語言是物質性的實踐, 是被複雜的社會狀況及經驗的交織所決定的。經由葛蘭西的霸權理論, 史碧娃克和巴巴認為, 西方對非西方的殖民宰制, 是透過文化的「主導 從屬」架構, 西方的語言取代了非西方世界的本土語言, 主導了非西方世界的文化與上層建築; 而由於語言和概念範疇的被宰制, 使得被殖民者的主體性無法彰顯。文化霸權背後所代表的菁英主義, 使第三世界落入權力與知識的宰制霸權。後殖民主義者認為語言與文字的使用與流通方式, 對非西方族群要形成集體認同是攸關重大的: 因為在西方的制約下, 第三世界文化屬民在語言文字上的選擇起始便受到相當的壓迫, 如果堅持使用自身本土化的語言文字, 則無法取得發言的空間與權力; 所以仍然必須使用通行西方的語言文字作為「說話的基礎」, 藉此突破西方的文化霸權<sup>3</sup>。後殖民文學是帝國文化與本土實踐、帝國語言與本地經驗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 而他者的復甦與站立, 需要依靠的是自身的理性與語言。

紀登斯認為「語言使人類活動得以超越原始的時間、空間侷限, 而不同於動物經驗」, 語言的機制允許我們以人類特有之存在方式, 處理時間和空間。門彌在討論到殖民地原住民的一些情境時, 特別指出維護原住民文化認同意識的要素, 是如何被殖民者逐步淡化以至消滅。有四項要素: 語言、歷史意識、社團意識、宗教意識(或一般文化意識), 其中語言的宰制尤其是關鍵性的, 因為後三項往往需要語言來轉化為民族、文化的記憶<sup>4</sup>。

主流語言及其對語言多元性的潛在威脅, 牽涉到一個更大的議題: 文化帝國主義, 也就是全球文化被某一特定霸權文化所主導。後殖民論述意圖瓦解殖民壓迫從瓦解語言階級著手, 在策略上, 後殖民論述更替、並重新定位語言(re-placing language)。其主要步驟有二: 第一, 抵制殖民語言本位論調; 第二, 進行語言文化整合, 重構(reconstruction)足以表達本身被殖民經驗的語言階層迷思, 並以臺灣經驗出發, 定義最足以貼切表達臺灣經驗的臺灣語言<sup>5</sup>。

臺灣人長期以來是以閩、客或原住民語與「國語」(日、中文等), 在多層的私領域中發揮其區隔及表面上交混(hybrid)的作用。臺灣一直是多語言開放的移民社會, 在政治歷史不斷變遷中, 民間語言呈現多元化, 正反映了臺灣社會語言環境的事實, 說各種方言母語夾纏了外來語的人們共同組織了這個移民世界, 除了共同的北京話之外, 其他方言不但普遍存在, 也被提升參與文學語言並予以藝術化的事實, 對於此地習於定於一尊而有強烈排斥性的標準國語, 無疑是個新的挑戰<sup>6</sup>。

---

<sup>2</sup> 見朱 剛:《薩依德》, 頁 180。

<sup>3</sup> 見李英明:《全球化時代下的臺灣和兩岸關係》, 頁 74 頁 75。

<sup>4</sup> 見葉維廉:《殖民主義、文化工業與消費欲望》, 收入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 頁 124。

<sup>5</sup> 見邱貴芬:《發現臺灣 建構臺灣後殖民論述》, 收入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 頁 174。

<sup>6</sup> 見劉春城:《一幢房子開始的文學生涯 初論王禎和》, 收入自著:《臺灣文學的兩個世界》, 頁 182。

(二)

轉向，必須清楚呈現出絕烈的姿態來，要能一眼就能不可避免地辨識出來，因此，題材顯然重要於意涵，形式優先於內容，而其中最有力的斷裂武器便是語言與文字。從《聖經》巴別塔上帝變亂人的語言以來，語言便是人間孤立、斷絕、各行其是的第一標誌（我們常說語言是溝通的工具，便是這個斷裂的彌補）。語言的強調，通常便是再次確認這個斷裂，從而宣示自身完整不妥協的主權，因此，它總清楚夾帶著或暗中援引了地域性的、國族性的激情，悄悄地連結上政治<sup>7</sup>。語言既形塑所見也被所見形塑，在今日世界，各個角落的族群、部落、民族與文化，都在為自己尋找自我認同和相互關係之新模式；在此一過程中，語言變成最方便的政治、社會或族群標誌，掩蓋許多更深層之問題，儼然成為矛盾的癥結，高踞於其他問題之上，造成無數的對立與殺戮<sup>8</sup>。

陳映真的《萬商帝君》中，在一開始時有如此一段描述：

第一個為劉福金取「香港」這個外號的，是陳家齊。劉福金的英文名字是 King H. K. Lau。一切傳閱於經理間的文件上，H. K.就代表劉福金。陳經理說：

「劉福金，為什麼英文拼起來是 H. K. Lau 呢？」<sup>9</sup>

那時，在他的心中，只反反覆覆地嘀咕著一句類似這樣的話：「H. K.？H. K.不是香港嗎？」<sup>10</sup>

香港對於當時居住在臺灣的人而言，就等同於英美（斯時尚未回歸），在此埋下一個伏筆。劉福金的認同模式是背離他的原生地的。接下來在劉福金自我介紹（宣傳？）時，他的解釋是：

劉福金的名片印出來以後，在一次訓練會中發給了大家。

「King H. K. Lau，」有人唸著，覺得疑惑。

「用臺灣話唸，我的名字是：Lau Hokk Kim。」劉福金笑著說。

「啊！是臺灣話啦。」

「是啊。」H. K. 笑了起來。

「我想，為什麼劉變成 Lau，原是這樣。」

「我們是臺灣人嘛。」H. K. 笑著說：「用父母音讀自己的名字」<sup>11</sup>

<sup>7</sup> 見唐 諾：《小說沃土的開拓者》，收入 Dashiell Hammett 著，易萃雯譯：《螺絲起子》，頁 5。

<sup>8</sup> 見 Harold R. Isaacs 著，鄧伯宸譯：《族群》，頁 153。

<sup>9</sup> 見陳映真：《萬商帝君》，收入《陳映真小說集 4 萬商帝君(1980-1982)》，頁 127。

<sup>10</sup> 見陳映真：《萬商帝君》，收入《陳映真小說集 4 萬商帝君(1980-1982)》，頁 128 頁 129。

<sup>11</sup> 見陳映真：《萬商帝君》，收入《陳映真小說集 4 萬商帝君(1980-1982)》，頁 132 頁 133。

在此形成一個弔詭：以他人之語言試圖重建自己的初始身份，卻造成共同使用者的迷惑，且此一迷惑是不可解的，落入等而下之的玩弄語言文字。反諷性強烈之極。

而在另一方面：

做為年輕的、有無限光明前途的國際企業管理者，應該好好地弄弄英文了<sup>12</sup>

可是信上寫的是洋文！洋文我一撇也不認得，我還差點為了不懂洋文給他們炒魷魚<sup>13</sup>！

大家都說老張差只差在不懂洋文。連剛來的幾個年輕小伙子，不上幾個月光景，薪資就多老張上來。人家會講幾句洋文，受公司器重嗎<sup>14</sup>！

杏黃的門板上漆著中英對照的「副總經理室」英文是美術體，每個字母類似「夜夜磨刀的女人」，肥滿兇悍；而中文卻寫得小小，又猥瑣得緊，一個個都成了心餘力絀的漢子<sup>15</sup>。

陳映真與王禎和欲藉此表達一個概念，亦即在殖民世界中，講不同語言的人民被迫群聚雜處於一地，而殖民主的語言，則在上層社會成為教育、地位、聲望、權力、發展與現代化的關鍵利器。英語所代表的強勢，除了實際上給與使用者一種生存上的優勢之外，也造成了原住民對本源文化和語言的自卑；而知識份子在那種強勢的感染下無意中與殖民者的文化產生認同，亦即是在求生存中把殖民思想內在化，用康士坦丁奴(Renato Costantino)的話來說，便是「文化原質的失真」(Cultural inauthenticity)<sup>16</sup>。

德希達說：

外來人所強制執行的單語主義是靠著一個基礎，它是透過一個殖民本質的主權。這個主權以高壓方式不停地把語言壓縮成一，也就是說，壓縮成同形式的霸權。他人的單語主義有另外一個意義，他只能漸漸地被顯示：我們無論如何只說一種語言，而且我們不擁有這個語言。我們一向只說一種語言，但是正因為這語言回歸他人，它永遠不對稱地存在，永遠為別人而存在，它來自異鄉，被他人保存，回歸他者<sup>17</sup>。

<sup>12</sup> 見陳映真：《萬商帝君》，收入《陳映真小說集 4 萬商帝君(1980-1982)》，頁 170。

<sup>13</sup> 見王禎和：《美人圖》，頁 139。

<sup>14</sup> 見王禎和：《嫁妝一牛車》，頁 230。

<sup>15</sup> 見王禎和：《美人圖》，頁 75 頁 76。

<sup>16</sup> 見葉維廉：《殖民主義 文化工業與消費欲望》，收入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頁 129。

<sup>17</sup> 見 Jacques Derrida 著，張正平譯：《他者的單語主義 起源的異肢》，頁 43 頁 44。

在《六月裡的玫瑰花》中，醫生(Doc.)在病人眼中成為鴨子(duck)，運用英語的同音詞創造出語言的趣味性；同時也寓有反諷意味，賀大哥主角的真實姓是 Chalk，意為粉筆，象徵其所有記憶隨時隨地可被抹去，賀大哥其人亦同。

黎湘萍先生認為「陳映真小說中的語言是富有詩意的知識份子語言，而很少將臺灣本土的口語方言寫入作品」<sup>18</sup>，並且認為其所受到魯迅的影響甚深。但此一現象在其早期作品中較明顯呈現，至後期作品雖不脫其詩化語言，但已往異語融合的道路行進。早中期小說（如《趙南棟》）中日本對臺灣的影響一再被凸顯，日文語句不時出現在臺籍政治犯的談話中，被處決前，臺籍政治犯多以日文道別並高呼口號；意圖表現出臺灣人民民族主義情感之強烈，同時也可看出陳映真雖然強調中國身份，但並不視之為齊頭式的霸權意識<sup>19</sup>。但至後期的《忠孝公園》則有著出乎意料的描述：

酒過三巡，大家仗著酒精的興奮，開口講起遺忘的差不多了的日本話的膽子也大了，使一個小房間裡嘰嘰咕咕地漂流著破碎的，臺灣土腔的日本話。但聽在宮崎的耳朵，這些破碎的、不正確的日本語何等動聽，恰恰表現了殖民地臺灣對母國日本深情的孺慕和嚮往<sup>20</sup>。

日語成就了這群臺籍日本兵的鄉愁，民族主義情感蕩然無存，證明日本對臺灣的影響也像斬不斷的思念，對這群具有雙重身份的人而言。

而陳映真對於尊重差異與保存多元的理念，在描寫趙青雲（《趙南棟》）學習閩南語的企圖中可發現。趙青雲雖然已經會說福建的閩南語，但仍覺得必須學習臺灣的閩南語：

（趙爾平）取下一本他猶記得是往年父親托他買了，寄到那個小島上去給他的《臺灣福建話的語音結構及標音法》，他發現曾經在福建各地住過的他的父親，在書上仔細地劃過線，寫過眉批，在練習題上做過答<sup>21</sup>。

除了作為一個社會主義運動者深入民眾的信念外，較重要的是，陳映真試圖強調外省籍對臺灣的現實面的體認有其必要性<sup>22</sup>。可是後來他了解到，這種企圖是枉然無效的：

只要臺灣人在場，就絕不敢說出肚子裡的話，還結結巴巴地學閩南

<sup>18</sup> 見黎湘萍：《臺灣的憂鬱》，頁 56。

<sup>19</sup> 見廖咸浩：《在解構與解體之間徘徊——臺灣現代小說中「中國身份」的轉變》，收入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頁 203。

<sup>20</sup> 見陳映真：《忠孝公園》，收入《陳映真小說集 6 忠孝公園(1995-2001)》，頁 143。

<sup>21</sup> 見陳映真：《趙南棟》，收入《陳映真小說集 5 鈴鐺花(1983-1994)》，頁 147。

<sup>22</sup> 見陳映真：《忠孝公園》，收入《陳映真小說集 6 忠孝公園(1995-2001)》，頁 203。

語<sup>23</sup>。

語言成為保命工具，早已失卻原先所賦予的促進族群融合的重大意義。

反觀臺籍兵士所面臨的情境：

王金木來當兵的理由，只為一條：學好國語。入伍當兵，可以免費學國語，有薪水掙，三個月退伍，保證退伍後有工作<sup>24</sup>。他想起了當時在連隊上的一些臺灣青年。為了學國語鑽到軍伍裡來的，何止是王金木！穿著並不合身的軍裝，這些青年都在想，日本天年盡了，祖國天年來了。將來退了伍，分配了工作，就得會說國語、會寫國語。在貧窮、殘破的戰後，那是個多麼幸福的夢想<sup>25</sup>。

導致臺灣人在光復後入伍的原因，還在於日本皇民化教育的遺毒；它使人們為了因應新統治階級，並順利找到工作而虔心自願入營學國語<sup>26</sup>。

時代的變遷造成了語言優勢的消長，也象徵了霸權並不一定能透徹至最底層，而是由人們決定。

（三）

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認為語言就是「民族文化遺產中最特殊的因素」，語言喚醒了族群個別的存在意識，並使這種意識得以持續，同時「藉此把自己與其他的族群區隔開來」<sup>27</sup>。在1960、70年代，當時外省與本土年輕作家的後殖民寫作的文本策略，就是重新給語言定位(Re-placing language)。語言的最大功能就是作為權力的表現媒體，當時年輕作家刻意要把大陸新文學運動的國語文學的國語進行調整改裝，使到它能表達和承載新的文化經驗。其作品很明顯地是在拒絕和抵制的破除權威性(abrogation)與修改和調整的挪用(appropriation)的衝突之中產生<sup>28</sup>。

王禎和的小說語言運用模式有三：一是借用方言的特殊讀音，二是用高雅莊重的語言描寫卑俗事物和卑賤人物，三是使用流傳之歌謠或歌詞。透過語言運作，一方面突顯臺灣被殖民經驗所塑成的臺灣語言，一方面以種種「抵中心」的語言姿態批判、顛覆殖民者文化本位的思考模式<sup>29</sup>。他的小說不談高調，專意從語言的轉嫁雜交下手，一方面寫出臺灣（政經）半殖民的情況，一方面揶揄了國

<sup>23</sup> 見陳映真：趙南棟，收入《陳映真小說集5 鈴鐺花(1983-1994)》，頁204。

<sup>24</sup> 見陳映真：歸鄉，收入《陳映真小說集6 忠孝公園(1995-2001)》，頁24。

<sup>25</sup> 見陳映真：歸鄉，收入《陳映真小說集6 忠孝公園(1995-2001)》，頁24。

<sup>26</sup> 見曾萍萍：陳映真小說與後殖民論述，頁62。

<sup>27</sup> 見Harold R. Isaacs 著，鄧伯宸譯：《族群》，頁146。

<sup>28</sup> 見王潤華：《華文後殖民文學 本土多元文化的思考》，頁81。

<sup>29</sup> 見邱貴芬：發現臺灣 建構臺灣後殖民論述，收入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頁170。

體、身體與文體的紊亂關係<sup>30</sup>。

從後殖民論述的觀點來看，王禎和的小說語言事實上是臺灣幾百年來被殖民歷史的縮影，融和了臺灣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用不同語言的混合代表臺灣被殖民史所融合而成的跨文化特質，反映出臺灣歷史的演進，及多種文化交錯、衝突、混合、蛻變重生的文化模式<sup>31</sup>。在《美人圖》中，王禎和把國語、閩南語和廣東話結合得很成功，形成本土語言文化（5人）的共同立場，對抗外來語言文化（28人）的立場，懸殊的對比暗示當時語言的使用與政治的密切相關性。龍應台教授說「大雜燴的語言反映一個大雜燴的社會」<sup>32</sup>，彭瑞金教授的解釋亦可為王禎和的語言策略作一註解：

王禎和的作品注入了具有創造性的、較大量的俚俗語，「方言文學」或「文學方言」的問題才受到矚目，王禎和開始的文學語言變革，基礎上是「國語」文學為主幹的變調，不過，在那個「國語文」全盛的時代已經萬分難能可貴了，至少它重新打開了討論省思文學語言的話題<sup>33</sup>。

邱貴芬及廖炳惠教授對此的闡述為：

（他）同時藉著語言的雜燴突破國語本位政策規劃的單一官方論述方式，解放了被壓抑被歧視的臺灣多音言<sup>34</sup>。統治者或殖民者的語言被模仿、嘲弄，只能發揮它官方的功能；而在被殖民者身上，統治者的語言反而成了護身符，隨時可將之扭曲、運用，進行利益的協商或抗拒<sup>35</sup>。

事實上，不能翻譯的詞語、語言的聲音及肌理，皆可被認為有著他們所示意的文化的權力與現存。選擇性地忠於地方用語，在文本中留下沒有被翻譯的詞語的技巧，是傳達文化區別性的意念時，更為廣被使用的技法。文化差別並不內在於文本中，卻被此種策略所嵌入；藉著發展特定的方式，既構設文化距離，亦同時把文化距離聯結起來<sup>36</sup>。

<sup>30</sup> 見王德威：《國族論述與鄉土修辭》，收入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臺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頁77。

<sup>31</sup> 見邱貴芬：《發現臺灣——建構臺灣後殖民論述》，收入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頁182。

<sup>32</sup> 見龍應台：《王禎和走錯了路——評〈玫瑰玫瑰我愛你〉》，收入自著之《龍應台評小說》，頁78。

<sup>33</sup> 見彭瑞金：《臺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頁220。

<sup>34</sup> 見邱貴芬：《發現臺灣——建構臺灣後殖民論述》，收入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頁183。

<sup>35</sup> 見廖炳惠：《新歷史主義與後殖民論述》，收於自著：《回顧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論文集》，頁47。

<sup>36</sup> 見Bill Ashcroft、Gareth Griffiths、Helen Tiffin 著，劉自荃譯：《逆寫帝國——後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頁71。

夏日 是王禎和作品中唯一以原住民為主體描述的短篇，「西高瓦賽」、「巴巴黑」、「白歐拉卡個蝶斯妄」、「米卡拉波卡個」、「阿馬」、「恩那」等原住民用語的直用，原汁原味的呈現，寧可在文後附注，顯示出突顯原民文化與漢族文化的差異用心。他強迫讀者積極參與使這些措詞獲得意義的文化水平之中，也要求讀者自身對於文本之外的文化處境有所體認與擴展。

王德威及呂正惠教授對於王禎和小說中所使用的語言策略提出的論述為：

王禎和用來說故事的語言是臺灣俚語、國語陳腔濫調，洋涇濱英文和雜碎日文的混合，尤其是愛國口號和宗教經典都被隨意引述，甚且不懷好意地被曲解成粗鄙、色情的意思；所有這些修辭上的混亂造成一個百音嘈雜的(cacophony)陳述，不但嘲弄了臺灣文化複雜的本質，也加強了小說本身反抗「正統」小說所依恃之「單音」(mono-phonetic)系統的力量<sup>37</sup>；王禎和的語言也「阻礙」我們去同情小說中的人物。他那種雜揉著歐化句法與閩南語辭彙的文字，細讀之下雖然可以讓人看出王禎和的苦心經營，但唸起來卻非常的艱澀而不順暢。更重要的是，那好像一層膜，阻隔了讀者與小說人物直接交通。他的語言好像一層透明玻璃，我們只能透過玻璃來看那一幕人間底戲劇，而且是被王禎和「丑化」了的木偶戲與滑稽戲<sup>38</sup>。

實際上從語法的融合而言，這是後殖民文本內新語主義(neologisms)的發展傾向，鄙俗的新語主義更是所有後殖民文學旁喻作用份外重要的例子；陳長房教授名之以「外語旅行落地生根的別出新義」，「輔以古舊方言與日、英文夾雜交融，語彙意象的重組，重賦語言的新生命直追後殖民世(試)說新(醒)語(Relexification)之奇趣(Zabus)」<sup>39</sup>。運用此種「多音語」，無形中解構了大寫的正統國語，進而消解「大寫語言」對「小寫語言」的支配地位。

《美人圖》所呈現的文化對立和民族意識，與同時期陳映真的「華盛頓大樓」系列在精神上是相當一致的，只是王禎和以更直接尖銳的嘲弄來處理，不同於陳映真的說理與分析。中美斷交激化了臺灣社會對外來文化戒懼、嚮往又排斥的矛盾心理，從英語在小說中被人物視為社會菁英份子的表徵，就足以見出西方文化架構於本國文化之上的優勢地位<sup>40</sup>。英語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所追求的標幟，是無庸置疑的；如果學習英語是一種自然發展的需要，也證明了美國強權滲透力之普及。至於西裝本身成為西方的代表符號，穿著所顯現出的某種認同，早已被內化為自身之一部份<sup>41</sup>。

<sup>37</sup> 見王德威：《從劉鶚到王禎和 中國現代寫實小說散論》，頁 164。

<sup>38</sup> 見呂正惠：《荒謬的滑稽戲 王禎和的人生圖像》，收於自著：《小說與社會》，頁 81。

<sup>39</sup> 見陳長房：《寓悲憫於笑紋 論王禎和〈嫁妝一牛車〉》，收於陳義芝主編：《臺灣文學經典研討會論文集》，頁 102 頁 103。

<sup>40</sup> 見許瑋禎：《多語言的文化衝突 王禎和小說研究》，頁 560。

<sup>41</sup> 見葉維廉：《殖民主義、文化工業與消費欲望》，收入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

在《美人圖》中，王禎和把茱麗葉洪就要在美國剖腹生產的嬰兒(baby)，由英語譯成「卑鄙」；卑鄙的不是小嬰孩，卑鄙的是母親移民美國的心態和行為；主任室的牛皮沙發價位高檔，是金屁股才坐得起的「膨」〔風〕椅。小林來台北 中小林把「道格拉斯」聽成「倒過來拉屎」，就是在譯名裡以「拉屎」來貶抑華人用洋名；其他如「PP.曾」變成「屁屁真」，「南施」變成「爛屍」，「多拉西」變成「倒垃圾」，「TP.顧」變成「踢屁股」，「K.C.任」變成「氣死人」，「Geroge曹」變成「交際草」，不一而足。而將福佬話被翻譯成英語，如 bobble 音讀似「保庇」，非求神明保佑，而在求外商公司、跨國企業保佑。

《玫瑰玫瑰我愛你》的語言除了配合人物身份之外，也暗示作者對人物事件的評價觀點。以直接音譯的方式呈現方言或外語，如以「塞奶」取代撒嬌，人民(people)譯為「屁股」；《美人圖》裡的「office」變音「嘔穢室」，「UPT 航空」快讀成「流鼻涕」，錢博士被小廝念成「淺薄兮」，文本人物對語言只有語音或語義上之所指(signified)的認知，卻沒有能指(signifier)上之體認<sup>42</sup>。

個別詞語的括引翻譯，是跨文化文本中，最為明顯及最為常見的作者入侵；母語詞語的保留，藉著容許詞語代表文化的隱浮現存，維繫了跨文化文本的旁喻作用<sup>43</sup>。在「伊會念咒」裡「章」議員諧音「髒」，影射民代權勢強大。阿緞的住屋是屬於違「章」建築，亦即違背民代利益的房子就有不合法的嫌疑<sup>44</sup>。「嫁妝一牛車」中「簡」的福佬話與「幹」同音，也明示其所作所為，這些則是較明顯的喻為使用。

?? 乏 ??? ? ??

薩依德指出，作為一個被剝奪了話語權的他者，東方是無法表達自己的，它必須由西方來為之表達。東方的失語與西方的獨語充分表明二者之間的傾斜權力關係，其關鍵在於東方不能且無權表達自己，只能由西方再現其話語<sup>45</sup>，故殖民話語是一種再現被征服者的他者的文化特權。

幾乎所有的殖民過程中都牽涉到語言的更替，大部分殖民者的語言異於被殖民者，殖民關係的建立中同時也就包括了語言位階的劃分。在這種情形下，被殖民者就集體進入失語狀態，因其語言經驗一分为二：使用母語將帶來屈辱的結果；而用殖民者的語言又無法貼近自己的生活經驗<sup>46</sup>。講出來的話不只是一要讓聽者聽懂、並領會其意，同時還要跟主流語言體系進行無窮互動，不斷接受主流語言體系檢查。因此作家最重要的課題是，要如何找到一種語言既可以被主流語系

---

頁 133。

<sup>42</sup> 見劉恆興：《臺灣現代文學(9) 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中的諷刺特徵兼論中國傳統文學的諷刺技巧》，頁 85。

<sup>43</sup> 見龍應台：《王禎和走錯了路 評《玫瑰玫瑰我愛你》》，收入自著之《龍應台評小說》，頁 67。

<sup>44</sup> 見高全之：《王禎和的小說世界》，頁 132 頁 133。

<sup>45</sup> 見陶東風：《後殖民主義》，頁 86 頁 87。

<sup>46</sup> 見楊 照：《夢與灰燼 戰後文學史散論二集》，頁 82。

所接受，又同時可以代表受辱者，替他們發言？

王禎和 *嫁妝一牛車* 前引用 Henry James *The Portrait of Lady* 的一段話：

There are moments in our life when even Schubert has  
nothing to say to us

意即「生命裡總也有甚至修伯特都會無聲以對底時候」，除了意喻主角萬發因生理聽障常無法答話外，有時也藉此逃避一些連正常人都無法解決的困境；深層意義則是人非神，面對生命的困境言語已無用，唯有沉默。

在王禎和的作品中，主角都有一個需要對抗的、受盡它威脅的勢力。*來春姨悲秋* 中的來春姨對抗媳婦罔市，*嫁妝一牛車* 中的萬發對抗姓簡底，*五月十三日* 中的羅老闆對抗姓郭的，*三春記* 中的區先生對抗阿嬌；他們唯一的武器就是言語 用粗話罵人、說是非等。戰敗時便不言不語：來春姨對罔市的種種忤逆「都能保持絕對的靜默，有如染著諱疾不敢聲張的樣子」，「嘴巴張開又闔上，像她已把各樣各式的講話的方法全遺忘乾淨」；萬發藉著耳聾的便當，與人說話一向都支吾其詞，爾後對於旁人嘲笑他讓妻之事更加「臉赭都不赭一會底，對這些人的狎笑，很受之無愧的模樣」；羅老闆經常回憶過去在議會大廳的演說，到後來連在飯桌上的演說孩子們也不愛聽，只剩下妻子一個聽眾，最後連妻子也不大感興趣了；區先生吃了補藥變啞，什麼話也說不出，後來回了聲，讓妻子攆下床時，卻反而希望能再次啞了，其後便一直「悶悶地不言語起來」<sup>47</sup>。他們都是弱勢，也因此喪失了發言權，更重要的是沒有任何一種語言或人群能替他們發聲。

陳映真早期小說 *某一個日午* 的房恭行，「一直是個安靜的孩子，不太開腔，也不愛人家沒事嘮叨他，簡直就是他母親的脾氣」，而房母對房先生而言，「她真是靜默得彷彿一座古剎，家鄉的荒山裡古剎」。*夜行貨車* 的詹奕宏在劉小玲的踐行宴會末尾，聽到上司摩根索先生說英語的不雅用辭，他先用英語抗議，憤而辭職後則以福佬話對林榮平說「在蕃仔面前我們不要吵架」；*趙南棟* 的趙慶雲，雖然有著「千萬冊書所不能盡載的、最激盪的歷史、最熾烈的夢想、最苛烈的青春，和狂飆般的生與死」，卻也選擇沉默，「什麼都不肯說」：

其實，不是我不說。整個世界，全變了。說那些過去的事，有幾個人聽得懂哩<sup>48</sup>？ 這個社會，早已沒有我們這種角色，沒有我們的台辭，叫我說些什麼哩<sup>49</sup>？

這些在大肅清行動中老一輩的倖存者，在時代的消長中被迫封口。

<sup>47</sup> 見也 斯：雜談王禎和近作，收於王禎和：《*嫁妝一牛車*》，頁 261 頁 262。

<sup>48</sup> 見陳映真：趙南棟，收入《陳映真小說集 5 鈴鐺花(1983-1994)》，頁 110。

<sup>49</sup> 見陳映真：趙南棟，收入《陳映真小說集 5 鈴鐺花(1983-1994)》，頁 118。

歸鄉 裡的楊斌臺灣話、日本話「也都忘了」，呈顯出一個時代的悲劇：使用非母語的語言較母語更為熟練，他無法顛覆語言所代表的族群與身份的刻板印象；失去原聲帶，也相對地失去自我。

在 淒慘的無言的嘴 中，陳映真引用 朱利 該撒 劇中安東尼的臺詞：

我讓你們看看親愛的該撒的刀傷，一個個都是淒慘、無言的嘴。我  
讓這些嘴為我說話 <sup>50</sup>

用刀傷的傷口來隱喻斯時臺灣人民所受到的傷害，期望能為不平的世道人心吐訴公理正義；末了「我」出院前夢見這些嘴說話了，說的是歌德的名言：

打開窗子，讓陽光進來罷！

這裡令人聯想到魯迅在《吶喊》自序中提及的「鐵屋子意象」，但魯迅的鐵屋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其中有些較為清醒的人們被吶喊者驚起，於是鐵屋就有了破毀的希望。陳映真借此意象，以吶喊者自居，但臺灣的鐵（皮）屋是有門有窗的，只是受阻於現實環境而封閉，該是開啟的時候了。失語是一時的，只要陽光（理想）劃破黑暗照耀大地，所有的惡就會消散，但懷抱理想者也會因功成身退隨之消逝。現今臺灣的歷史已經進入了一個更加複雜的內向的、近乎「失語」的時代，陳映真卻創作了相應的話語形式，來與各階級人們，尤其是較清醒的知識份子對話。

?? 乏 ??? 喏? 櫛炭? 激

（一）

後殖民文學中常出現一種政治隱喻：即殖民者是男，被殖民者或殖民地是女，往往通過性侵犯來暗喻殖民者污辱、剝削、侵佔民地及其人民與文化<sup>51</sup>。一般均將殖民遭遇或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衝突，解讀為兩種對立的男性中心主義之間的鬥爭。在此種鬥爭中，殖民宗主國的婦女與被殖民國家的婦女，實際上都成為對抗的男性之間的鬥爭犧牲品與象徵性仲介，也是他們共同利用的對象，婦女的形象成為把自我利益與道德優越轉化為自我犧牲與種族優越的殖民意義系統的工具<sup>52</sup>。

性，作為一種權力象徵，以一種「殖民受殖」的辯證形式，反射出一種殖民的帝國男性陰莖和受殖的女體之間支配與被支配的複雜關係。巴巴說過，陽具想

<sup>50</sup> 見陳映真：《淒慘的無言的嘴》，收於《陳映真小說集 1 我的弟弟康雄(1959-1964)》，頁 218。

<sup>51</sup> 見王潤華：《華文後殖民文學 本土多元文化的思考》，頁 85。

<sup>52</sup> 見陶東風：《後殖民主義》，頁 112 頁 113。

像毋寧是一種「凝注(arrested/fixated)的再現形式」，體現殖民者極度矛盾的情結；包含「投射〔出〕和投入(projection and interjection)雙重的潛意識作用，既是隱喻也是轉喻的策略，涵蓋置換、罪惡感、攻擊欲；是表顯及內抑知識的分裂和其掩飾。」<sup>53</sup>

在陳映真小說中男女對立的寫作模式有一個前提，即為：女性必須被男性欣賞，男性必須被女性崇拜；男性必須是啟蒙者，女性必須被男性啟蒙。在此一模式中建立了等級次序，女性以自由狀態與男性結合後，反而失去了自由，受動於男性話語的支配，變成了男性世界的邊緣人。

文本中「女性他者」相對於「男性權威」的情形，有以繁衍本能特徵呈現的，如劉小玲〔夜行貨車〕、艾密麗〔六月裡的玫瑰花〕、伊〔永恆的大地〕、彩蓮〔某一個日午〕等。女性成為大地的象徵，俗麗又豐潤，包容一切苦難，懷孕後〔自願或非自願〕而態度轉趨強硬地將孩子保留下來，與賽珍珠《大地》中女性角色成一對位。

伊親吻他，像一隻白色的、妖嬌的小母雞在一片黑泥土的大地上快樂的啄食<sup>54</sup>。

伊的臀很豐腴地煥發著。他卻一直貪婪地在伊的那麼質樸卻又肥沃的大地上，耕耘著他的病的慾情<sup>55</sup>。

她在所有的凡俗中，卻有強壯、有逼人卻又執著的跳躍著的生命，也便因此有彷彿不盡的天明和日出<sup>56</sup>。

亦有以乳房救贖男性意象呈現的女性，如周小姐〔雲〕、劉小玲〔夜行貨車〕、艾密麗〔六月裡的玫瑰花〕、珠美〔文書〕、被殺害女子〔淒慘的無言的嘴〕等。以弱者的姿勢出場的，有媽媽〔麵攤〕、唐倩〔唐倩的喜劇〕等；無表述能力，處於長久的沉默與等待之中，有房妻〔某一個日午〕、林碧珍〔第一件差事〕、劉小玲〔夜行貨車〕等。大多數都成為在文化中被建構起來的商品，身體政治(body politics)的代言人。

斷裂，原是後殖民女性文化的共同象徵。在男性大敘述裡所豔稱的民族解放或國家苦難，在女性的感覺體驗下，都變得浮華虛偽<sup>57</sup>。等待和守候的女性成為被啟蒙者，她留下所有空間，等待男性為其書寫歷史。

## 〔二〕

史碧娃克在《賤民能夠說話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中指出，性別

<sup>53</sup> 見黃心雅：「翻譯」法農：權力、慾望與身體的中介書寫，收於 Frantz Fanon 著，陳瑞樺譯：《黑皮膚，白面具》，頁 20。

<sup>54</sup> 見陳映真：六月裡的玫瑰花，收入《陳映真小說集 3：上班族的一日(1967-1979)》，頁 9。

<sup>55</sup> 見陳映真：永恆的大地，收入《陳映真小說集 3：上班族的一日(1967-1979)》，頁 43

<sup>56</sup> 見陳映真：某一個日午，收入《陳映真作品集 3 上班族的一日(1967-1979)》，頁 62。

<sup>57</sup> 見陳芳明：挑戰大敘述——後戒嚴時期的女性文學與國家認同，收於自著：《後殖民臺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頁 138。

化的賤民(gendered subaltern)之所以消失，乃由於我們從不聽其自我言說，她們僅成為其他互相競爭話語的利用工具，成為書寫其他欲望與意義的文本<sup>58</sup>。

在陳映真的作品當中，「兒子他者」相對於「父性權威」所產生的情形：如趙爾平（趙南棟）以父親的精神力量為其成長支柱，房恭行（某一個日午）成為其崇拜對象之化身，詹奕宏（夜行貨車）、兒子（永恆的大地）、大哥、我（故鄉）被父親精神壓力所壓抑而沉默失語等。這些迷失自我的兒子們，將自我表述的權利讓與父親，逃離和放逐成為兒子反抗父性權威之方式。而「父/子」對立產生的壓抑感在「男/女」互補處找到某種程度的解脫，性話語再次與意識形態隱喻聯繫起來。

陳映真前期所塑造的女性是一個生殖化、軟弱、沉默、等待啟蒙的母親形象，兒子則是一個軟弱、憂鬱、迷惘甚至物欲化的小知識份子形象。此二種他者形象，都強調其對於父親的依附性<sup>59</sup>。他曾有意突出女性的依附，但中後期小說《夜行貨車》《趙南棟》裡卻有劉小玲的母親和莫葳的母親如此的女性權威存在於他的視野中。女性不再是沉默的他者，角色互換，母親（女性）成為家中的主要支柱；父親（男性）退居幕後，「成了一個破舊、多餘的人」。父親的缺席影響父權的失落，父權喪失，相對的是母權升起；永不鬆手的母親不僅具有與父親抗衡的實力，家族成員中的任何一份子甚至都有可能替代失落的父權。但有時父親缺席不在的缺憾，卻也轉折出另一種圓滿，而面對父親似存在卻又不在的困境，毋寧是另一種形式的被遺棄。

女性在帝國殖民與父系霸權緊密糾葛架構之下被雙重殖民、放逐、邊緣化，女性的主體性藉由其無聲、失聲、片斷的吶喊與被動的聽、看之客體化所拼湊成形。她們所面對的兩難局面正是佐證了女性在國家裡所處的劣勢地位：她們常被當成國家的象徵，但卻無權參與國家大事<sup>60</sup>。女性，是臺灣的隱喻，幾乎是文學史上一個重要主題；然而，女性並不等於臺灣<sup>61</sup>。

山路 的蔡千惠承擔了男性式暴虐政治所造成之罪愆，她不是烈士，她只是個幸或不幸，親眼目睹了烈士與理想之美，卻無力實踐烈士理想的旁觀者。她孤伶伶地站在烈士展現的犧牲情懷前而自覺渺小，為了克服渺小的感受，她選擇了用她的方式奉獻，將自己的青春獻祭於理想<sup>62</sup>；她為了一個理想從容赴死，卻透露著一種詭異的尊嚴。

從後殖民論述的觀點而言，王禎和的小說劇情以嘻笑怒罵的方式演出幾百年來臺灣被殖民史裡外銷主導的商品經濟模式，《玫瑰玫瑰我愛你》所敘述的妓女與美軍間的國際貿易正諧擬(parody)了臺灣被殖民歷史裡的基本經濟模式，妓女

<sup>58</sup> 見葉維廉：《殖民主義、文化工業與消費欲望》，收入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頁105。

<sup>59</sup> 見顏敏：《尷尬的力量——從陳映真小說中的父性權威看其敘事的尷尬》，頁65-頁67。

<sup>60</sup> 見黃素卿：《華裔離散族群意識及華裔移民認同：《桑青與桃紅》和《千金》》，《中外文學》34卷9期，2006年2月，頁246。

<sup>61</sup> 見王德威：《性醜聞與美學政治：李昂的情欲小說》，收入李昂：《北港香爐人人插》，頁29。

<sup>62</sup> 見楊照：《陳映真精神》（聯合報E7版，2004年9月13日）。

成為商品換取美金外資的經濟活動可視為臺灣淪為美國次殖民地的表徵<sup>63</sup>。文本描寫一宗玫瑰對玫瑰（女性對「西貢玫瑰」）的國際交易，間接諷刺臺灣長久被殖民歷史培育出的急功近利，眼光短淺的心態。

東方人的男性氣概和女性的陰柔面，常常是在跨文化、跨族群的文化環境中受到相當壓抑，將憤怒轉為對內部族群的虐待或迫害，因而對外的聲音變得極為微弱；或者以變形的方式為之，讓外人以陰柔或狡猾善變的文化刻板印象來表現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在種族政治的觀點上，往往被視為女性化，或是由現實商業文化所造就的特殊人種<sup>64</sup>。西方男性與東方男性在主宰女性命運時，並不是相互對立，而是有著共謀(complicity)的性格<sup>65</sup>，男性在權力角逐時，往往會以女性的身體作為競爭的場域，夜行貨車 的劉小玲即是最佳例證。

被殖民的一方，無論男女，皆被女性化(feminized other)；而且被殖民的男性是殖民男性的真正的他者，這是基於性別統治與殖民政治之間的同質同源性所作出的論述。東方男性（在經濟、生產力、社會的制度化體系等）雖然失敗，但東方女性（在文化、人性、內在超越性等）卻別具魅力，令西方男性為之傾倒。在沉默的東方女性的陪襯下，雄辯的西方男性才能夠思考問題，才能夠證明自己的存在，獲得新的元氣和權威感，他在財力和智力上都毫無疑問地比她優越，這一部份將在第七章作延伸討論。

??? ? 監??? 嶸????? km巧

?? 乏 ???? ? 涅

在馬克思(Karl Max)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歷史論述中，資本的擁有者與被奴役的人，必然產生統治階級(ruling class)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階級衝突(class conflict)；此衝突基本上建立於資本與資本所象徵的權力之上。支配的階級是中產階級(bourgeoisie)，他們擁有資本，而被支配的階級，就是隸屬下層階級的普羅階級(proletariat)；他們需要透過勞動，甚且出賣勞力方得生存。而統治階級剝削的方式，是藉由挪用、販賣普羅階級勞動所生產的剩餘價值(surplus value)與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當人類由早期的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的概念基本上是透過土地、資本與控制生產方式，來產生其階級的穩定性<sup>1</sup>；阿敏(Amin)認為在工業社會中工人階級被區分為兩個部門，一是整合的且有相對特權

<sup>63</sup> 見邱貴芬：《發現臺灣 建構臺灣後殖民論述》，收入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頁 181。

<sup>64</sup> 見廖炳惠：《游離族群與文化認同 試論黃哲倫的〈航行記〉》，收入自著：《回顧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論文集》，頁 177。

<sup>65</sup> 見陳芳明：《挑戰大敘述 後戒嚴時期的女性文學與國家認同》，收於自著：《後殖民臺灣 文學史論及其周邊》，頁 144。

<sup>1</sup> 見廖炳惠編：《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頁 43。

的部門，二是分散的，由沒有特權的少數民族、婦女和年輕人組成的部門<sup>2</sup>。在後殖民文本裡，階級不僅是經濟結構所形成的類別，更是被強力的種族及文化意符所橫越的話語。

60年代的二元時空架構，一方面反映的是歷史上的，光復與遷臺的政治變動，一方面顯示的是社會上的，傳統邁向現代的文化變遷。這種表現與形態，本身即是一種時代關切點的反映，其基本的感受是一種斷絕的、不連續的變遷的時代感受。另外，不論追溯或對照的是臺灣的過去，或大陸的過去，其實都是由立足臺灣的人的現在出發。這種二元結構就在明知其為斷裂，而仍然有其尋根，有其解釋當前，明白處境，甚至續接失連的生命歷史與意義的功能，不同的族群與階層，也因「同是天涯淪落人」而有互相瞭解的可能。這一類作品的產生，雖然未必是高度自覺，但總是有其潛在的認清臺灣社會的「風雨同舟」本質之欲望與時代需求存在<sup>3</sup>。臺灣內部的階層和階級，不只是順著內部社會歷史發展趨力在演變，更是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制約，作為一個世界性範疇而存在<sup>4</sup>。

陳映真的歷史觀，據廖咸浩先生的歸納為：中國的分裂以迄於現今的臺獨運動，均是西化的宰制階級為爭取自身之階級利益與西方合作，因而扭曲或犧牲民族利益的作為；所以終極而言，統與獨的立場不同，並非源自省籍的差異，而是階級的差異<sup>5</sup>。而王禎和小說早期以階級對立為出發點的社會批判及吶喊，到後期反西化風潮的國族意識，亦為對當代世風日下之抗拒。

在《玫瑰玫瑰我愛你》這部以「妓女受訓班」為主體的小說中，王禎和不但以語言區隔出社會階級的屬性，並且展示了在「一致媚外」的前提之下，因階級差異而形成的不同文化認知及取向；經由所謂的「買春」，揭示了臺灣文化所處的後殖民地地位<sup>6</sup>。小林來臺北 這個故事中明顯的城鄉對比同時象徵本土與西方的對立，以及不同階級的差異。小林在文中，一方面以自己的本土意識批判同事們的崇洋媚外，另一方面以其正義感，試圖幫助同屬被宰制階級的外省人老張<sup>7</sup>。其文本中大多數角色都是迫於生計而不得不與體制維持某種共生關係的小人物；基於此，「默仿」(mimicry)就往往變成無可奈何的選擇<sup>8</sup>。

陳映真對當代都市中上班族的渺小有如斯描述：

從腳踏車的轉動的輪子開始，再照後座上的便當盒，然後讓騎單車的最低等的「上班族」逐漸沒入私家轎車、計程車和公車的街道中。然後，鏡頭調上矗立的、積木似的大廈的森林<sup>9</sup>

<sup>2</sup> 見 Malcolm Waters 著，徐偉傑譯：《全球化》，頁 33。

<sup>3</sup> 見柯慶明：《六十年代現代主義文學？》，收於張寶琴、邵玉銘、？ 弦主編：《四十年來中國文學》，頁 135 頁 136。

<sup>4</sup> 見李英明：《全球化時代下的臺灣和兩岸關係》，頁 143。

<sup>5</sup> 見廖咸浩：《論陳映真》，收於自著：《愛與解構 當代臺灣文學評論與文化觀察》，頁 176。

<sup>6</sup> 見許琇禎：《多語言的文化衝突 王禎和小說研究》，頁 560。

<sup>7</sup> 見廖咸浩：《臺灣小說與後殖民論述》，收於陳義芝主編：《臺灣現代小說史綜論》，頁 491。

<sup>8</sup> 見許琇禎：《多語言的文化衝突 王禎和小說研究》，頁 492。

<sup>9</sup> 見陳映真：《上班族的一日》，收於《陳映真小說集3 上班族的一日(1967-1979)》，頁 197。

這一整個世界，似乎早已綿密地組織到一個他無從理解的巨大、強力的機械裡，從而隨著它分秒不停地、不假辭色地轉動。一大早，無數的人們騎摩托車、擠公共汽車、走路，趕著到這個大機器中去找到自己的一個小小的位置。八小時、十小時以後，又復筋疲力竭地回到那個叫做「家」的，像這時他身處其中的，荒唐、陌生而又安靜的地方，只為了以不同的方式餵飽自己，也為了把終於有一天也要長成為像自己同其惶惶然的「上班族」餵飽。養大<sup>10</sup>

社會階級的形成似有固定模式，但決非父子相承；異位(alterity)是抽象的空間概念，是隨主體的位置移動的，低位(subalternity)則是由社會實況與歷史交節所規定的客觀事實。

?? 乏 ??? 巧??

在殖民主義後期的國際關係上，第一世界（包括美國、西歐、日本）明白武力侵略將會受到世界的譴責，於是開始透過文化工業，製造中產階級經濟理論的神話，包括所謂「自由市場經濟」，由此第三世界一直受到經濟不公平的待遇<sup>11</sup>。

在 1966 年底之後的十年間，由於先後受到韓戰、越戰的影響，臺灣經濟形成一段時期的繁榮，美日的經濟力量在此時發生了主導作用；隨著所謂的「經濟合作」，在臺北等大都市中，中產階級數量便一天天地增多。在此種現實基礎之上，以中產階級為中心的文化界便顯現出忘我的企圖，以至於文化與教育在其影響下，逐漸失去其自主性而呈現出殖民地性格<sup>12</sup>。

新興的中產階級們對日漸明顯的商品化現象做了現代主義式的回應：一方面為支離的社會經驗，在極端個人化及社會化之間的矛盾，做種種掙扎；另一方面卻又對帝國主義及其侵略的他者——第三世界，產生不安與畏懼，對宗教、價值、權力等核心問題提出質疑，最後使得中產階級的主體性崩潰，隨著意義的喪失這個中空狀態飄浮，作出許多無謂的抵抗與自我殘害<sup>13</sup>。

兀自照耀著的太陽 中，小鎮醫生說出了內心的想法：

（魏醫生）無助地笑著說：

「對罷？ 我曾自以為是另一種人。我的資產，我的教養，我的

<sup>10</sup> 見陳映真：《上班族的一日》，收於《陳映真小說集 3 上班族的一日(1967-1979)》，頁 199 頁 200。

<sup>11</sup> 見葉維廉：《殖民主義 文化工業與消費欲望》，收入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頁 138。

<sup>12</sup> 見尉天驄：《王禎和小說的現實意義》，收入王禎和：《嫁妝一牛車》，頁 275。

<sup>13</sup> 見廖炳惠：《後現代的馬克思主義者 詹明信》，收入自著：《回顧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論文集》，頁 85。

專業者的訓練，是罷？」

「

「你們與我並不盡相同。這我是知道的，當然知道。但我把你們當做表親似的，終於也是『同族』的罷。是罷？」<sup>14</sup>

他有醫術卻缺乏仁心，忽略了瀕死者同時是在與命運搏鬥，以對人事的淡漠作為保護牆；與周遭其他人作自我區隔，卻又渴望融入，這是最為無奈同時也最為悲哀之處。

在這樣一個盡是拋荒的旱田的礦山區的小鎮上，戰前的和戰後的中產者聚在一起。

醫生說：「我們所鄙夷過的人們，他們才是活著的。」

「那些像肉餅般被埋葬的人們。」許炘衰竭地說。

「那些儘管一代一代死在坑裡的，儘管漫不經心地生育著的人們。」

<sup>15</sup>

「但是拋棄過往的那種生活，恐怕無論如何都是一種最基本的條件吧。」

「拋棄那些腐敗的、無希望的、有罪的生活」<sup>16</sup>

自我的迷失、認同的錯亂，將導致自我的毀滅，僅存行屍走肉的生活。理想最大的敵人，不是迫害不是磨難，而是現實庸俗的幸福。現實庸俗的幸福讓人們如兀自照耀著的太陽裡的小鎮醫生一樣，拉起窗簾放起留聲機，品賞好酒跳跳探戈，安心地不再感受到外面貧窮礦工們所體受的痛苦，同時也就讓自己與女兒小淳那少女真純的心靈徹底開脫了。生命最大的激動，來自於體受別人的痛苦，願意為別人的痛苦而獻身。中產階級的邪惡，不在他們做了什麼壞事，而在他們封閉了人原本的不忍之心，用種種虛偽的藉口，假裝看不見，或看見卻假裝無所謂<sup>17</sup>。因此當他們正無意識地享樂或甘心自囚於象牙塔的同時，對勞動者等其他階級而言即是間接進行宰制與壓迫。在王禎和的小說裡，民意代表（伊會念咒、香格里拉的章議員、錢銘雄）、中學老師及電視名嘴（《玫瑰玫瑰我愛你》的董斯文、《美人圖》的錢阿發），這些位屬中產階級的角色衣食無憂，在現實生活裡頗為得意，但其生命卑微程度與其他階級無異。

?? 乏 ? ? ? ? ?

<sup>14</sup> 見陳映真：兀自照耀著的太陽，收入《陳映真小說集 2 唐倩的喜劇(1964-1967)》，頁 64。

<sup>15</sup> 見陳映真：兀自照耀著的太陽，收入《陳映真小說集 2 唐倩的喜劇(1964-1967)》，頁 67。

<sup>16</sup> 見陳映真：兀自照耀著的太陽，收入《陳映真小說集 2 唐倩的喜劇(1964-1967)》，頁 72。

<sup>17</sup> 見楊照：陳映真精神（聯合報 E7 版，2004 年 9 月 13 日）

(一)

葛蘭西在霸權理論中提到，霸權主要是知識份子(intellectuals)所作所為的結果，但他所謂的知識份子範圍廣泛，指一切生產和傳播觀念以及知識的人等；所有的人都是知識份子，但並非所有的人都能在社會上發揮知識份子的功能：即在文化、觀念、知識和話語等的生產、傳播和闡釋的功能<sup>18</sup>。他的希望是放在所謂的「有機知識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s)身上，認為他們不但投入政治，十分關心社會，而且對底層文化及傳統的各種問題有著較系統、現代化的理解<sup>19</sup>。

班達(J.Benda)在 1920 年代提出的知識份子觀，他認為知識份子是一群「智力超群，有道德天賦的哲學國王」，他們人數極少，見解深刻，卻又不易為一般大眾所接受，言行多被視為「怪癖」，但代表的是人類真正的精華<sup>20</sup>。

知識份子的重任之一就是努力破除限制人類思想和溝通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和化約式的類別(reductive categories)<sup>21</sup>，所有知識份子都對他們的閱聽大眾代表了某事，而在這麼做的同時也向自己代表了自己<sup>22</sup>。知識份子的代表是在行動本身，依賴的是一種意識，一種懷疑、投注、不斷獻身於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斷的意識；而這使得個人紀錄在案並無所遁形。知道如何善用語言，知道何時以語言介入，是知識份子行動的兩個必要特色<sup>23</sup>。知識份子的重責大任在於明確地把危機普遍化，把特定的種族或國家所蒙受的苦難賦與更偉大的人類範疇，把那個經驗連接上其他人的苦難<sup>24</sup>。

薩依德描繪他理想中的知識份子（同時也描述自身）：

在我看來知識份子的主要責任就是從這些壓力中尋求相當的獨立，因而我把知識份子刻劃成流亡者和邊緣人(exile and marginal)、業餘者、對權勢說真話的人<sup>25</sup>。

社會權威漫天蓋地而來的強有力網絡（媒體、政府、集團等）擠壓、排除了形成任何改變的機會，使得知識份子在面對這種情況時經常感受到沉重的無力感。執意不隸屬於這些權威，在許多方面是無法促成直接改變的；而且可悲的是，他們甚至經常被貶抑到目擊者(witness)的角色，來見證這些恐怖，否則就無人記錄<sup>26</sup>。既沒有職位要守護，又沒有地盤要鞏固、防衛的知識份子，具有某種根本上更令人不安的特質；因此，自我嘲諷多過於自吹自擂，直言坦率多過於吞吞吐吐。然而，不容迴避的則是無可逃避的現實：知識份子的這種代表既不會使他們

<sup>18</sup> 見陸揚：《大眾文化理論》，頁 126 頁 127。

<sup>19</sup> 見廖炳惠：《後殖民研究的問題及前景：幾個亞太地區的啟示》，頁 59。

<sup>20</sup> 見朱剛：《薩依德》，頁 175。

<sup>21</sup> 見 Edward Said 著，單德興譯：《知識份子論》，頁 29。

<sup>22</sup> 見 Edward Said 著，單德興譯：《知識份子論》，頁 33。

<sup>23</sup> 見 Edward Said 著，單德興譯：《知識份子論》，頁 57。

<sup>24</sup> 見 Edward Said 著，單德興譯：《知識份子論》，頁 80。

<sup>25</sup> 見 Edward Said 著，單德興譯：《知識份子論》，頁 34。

<sup>26</sup> 見 Edward Said 著，單德興譯：《知識份子論》，頁 34 頁 35。

成為權貴的朋友，也不會為他們贏得官方的榮銜。這的確確是一種寂寞的處境，卻總是優於集體容忍事物的現況<sup>27</sup>。

加略人猶大的故事 中，猶大在聚會中說出了真話，因而被排擠：

我告訴你為什麼罷！我來告訴你為什麼。你們既然冒著萬險自羅馬人手中圖謀他們的權柄，那麼將來分享這權柄的，除了你們還有誰呢？你們將為以色列人立一個王，設立祭司、法利賽人和文士來統治。然而這一切對於大部分流落困頓的以色列民又有什麼改變呢<sup>28</sup>？

其後因緣際會追隨耶穌，認為耶穌不慕榮華，且最後自言必受死，如死於羅馬人之手，可激起群眾的反叛；於是出賣了他。至此均是以一個憂國憂民的知識份子形象（雖然有操弄權謀之嫌），直到耶穌被釘上十字架的那一刻，他忽然明白了：

沒有那愛的王國，任何人所企劃的正義，都會迅速腐敗。他了解到他自己的正義的無何有之國在這更廣大更和樂的王國之前是何等的愚蠢而渺小<sup>29</sup>。

他之出賣耶穌其實更出於他對神蹟熱切的渴望，與對現世恩典實踐的嚮往。陳映真筆下猶大的悲劇是個反英雄的悲劇，是個人子揣度神恩而不可得的悲劇；他的基督故事不妨視為馬克思式的寓言與預言，猶大的失敗來自他的急功近利；對陳映真而言，等待奇蹟是荒謬的堅持<sup>30</sup>，果陀不會不請自來。

不過在王禎和的《玫瑰玫瑰我愛你》裡，對知識份子的反諷達於頂點：

他竟猛然記起大學上「西洋文學概論」時教授講到聖經經那一段耶穌治療癲瘋病人的奇蹟——記起這段故事後，他就緊接著目睹到一個異象——四、五十位四大公司的小姐，迎面而來，遠遠站著，高聲說：老師，可憐我們罷！然後他真地開口說：啊啊！我非常十分可憐你們啊！所以我要盡我所能救贖你們啊！潔淨你們啊！傾囊相授要成功地把你們訓練成最具水準的吧女啊！每一位的你們都要用功努力，以期獲至最大的成就，職是之故，啊啊！你們的社會地位可以獲得昇高啊！你們的生活可以期許改善啊<sup>31</sup>！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救贖與墮落，只在一念之間；這熟悉的後殖民主

<sup>27</sup> 見 Edward Said 著，單德興譯：《知識份子論》，頁 36。

<sup>28</sup> 見陳映真：加略人猶大的故事，收於《陳映真小說集 1 我的弟弟康雄(1959-1964)》，頁 111。

<sup>29</sup> 見陳映真：加略人猶大的故事，收於《陳映真小說集 1 我的弟弟康雄(1959-1964)》，頁 130。

<sup>30</sup> 見陳映真：加略人猶大的故事，收於《陳映真小說集 1 我的弟弟康雄(1959-1964)》，頁 111。

<sup>31</sup> 見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頁 64-65。

義假設，無疑洩漏了知識份子在對待受壓迫者時的自大感：若知識份子在現實生活中不能「拯救」被壓迫者，至少他們可以在想像中、甚至可透過文學達成。換言之，是知識份子創造了被壓迫者的「沉默」，好讓自己能夠發言<sup>32</sup>。

唐倩的喜劇 裡，對偽善的知識份子也有著墨：

（唐倩）不久就發現到老莫也具備了一些男人 特別是這些知識份子 所不能短少的偽善。他在他的朋友之前，永遠是一付理智、深沉的樣子，而且不時表現著一種彷彿為這充塞人寰的諸般的苦難所熬練的困惱底風貌<sup>33</sup>。

而唐倩在與喬治 H D 周婚後的性生活中發現：

知識份子的性生活裡的那種令人恐怖和焦躁不安的非人化的性質無不是由於深在於他們的心靈中的某一種無能和去勢的懼怖感所產生的<sup>34</sup>。

賀大哥 的主角自越戰歸來，就陷入混亂：一方面回憶參戰前的滿懷理想與報負，「一個新的、美麗的美國」：

總有一天，更多、更多的人能夠不圖回報，而從一個人的生命的內層去愛別人、信賴他人，那美麗的、新的世界就伸手可及了<sup>35</sup>。

另一方面又無法拋棄戰爭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或是不被罪惡的記憶拋棄），雙重壓迫下，崩潰是必然的道路。

西方知識份子的苦悶，來自於所面對工業文明的龐大機器，而臺灣知識份子的疏離，則是來自殖民體制的壓力。陳映真筆下的知識份子大都懷抱著「烏托邦」思想，與現實環境扞格不入，在精神與現實二種極端的縫隙中不得喘息，漂泊在歷史與現實中失去行動力；因此不是如同屈原尋求了斷，就是躲藏在另一個內心世界中，無人能聞問。精神分裂者都是在「不可能」的壓力下崩潰的，正如同先知者總是最先犧牲一般，就如同 哦！蘇珊娜 的李和彼埃洛先生：

他們用夢支持著生活，追求著早已從這世界上失落或早已被人類謀殺、酷刑、囚禁和問吊的理想。也許他們都聰明過人，但他們都那

<sup>32</sup> 見陳麗芬：文學批評與文化身份 周蕾 後殖民 香港，收於自著：《現代文學與文化想像 從臺灣到香港》，頁 22。

<sup>33</sup> 見陳映真：唐倩的喜劇，收於《陳映真小說集 2 唐倩的喜劇(1964-1967)》，頁 128。

<sup>34</sup> 見陳映真：唐倩的喜劇，收於《陳映真小說集 2 唐倩的喜劇(1964-1967)》，頁 155。

<sup>35</sup> 見王德威：最後的馬克思 評陳映真 歸鄉 及其他，收於自著：《眾聲喧嘩以後 點評當代中文小說》，頁 191。

樣獨來獨往，像打掉玻璃杯一樣輕易地毀掉生命<sup>36</sup>。

（二）

知識份子必須四處走動，必須有立足的空間並反駁權威，因為在今天的世界裡，毫不質疑地屈從於權威是對主動的、道德的、知識的生活最大威脅之一<sup>37</sup>。身為知識份子最困難的一面就是代表經由你的工作和介入所宣告的事情，而不僵化為一種體制或機器人，奉一種系統或方法之令行事<sup>38</sup>。

麵攤 中的無名警官，顛覆日治時期「大人」的魚肉人民形象（如賴和「一杆秤仔」）及二二八事件中緝私煙的警察，以此對抗現實中之權威，展現「市鎮小知識份子」的情操與理想。當人物處於權威與犧牲者的夾縫之間，此種特殊的臣僕地位必然產生特殊的分裂意識；處在「冷戰 民族分裂」時代中的知識份子尤然：他們必須在現實中對冷戰時代分歧的意識形態有所選擇，對民族分裂的現實有所思考<sup>39</sup>。警官在身份上的階級性突顯他與攤販無可避免的衝突與對立；卸下職務後，則以同胞身份弭平了二者的貴賤區別。

鄉村的教師 的吳錦翔回鄉後從事教育工作，滿懷著熱情與理想：

這是我們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同胞。至少官憲的壓迫將永遠不可能了。改革是有希望的，一切都將好轉<sup>40</sup>。

他延續了戰前抗日的熱情以及對低階勞動者的同情，有著豐沛的情感和敏銳的思維，光復後回歸祖國的美夢逐漸成形。同時他也對所任教的學童抱以期望：

務要使這一代建立一種關乎自己、關乎社會的意識，務要使他們對自己負起改造的責任<sup>41</sup>。

「他努力地讀過國內的文學，第一次他開始用現存的弊端問題看他的祖國」<sup>42</sup>，在這樣的感情中，他固然不像同村人一般存有省籍的芥蒂，但除了血緣的親切感之外，他也感受到一股大而曖昧的悲哀：

感到一種中國的懶散，他忽然覺到改革這麼一個年老、懶惰卻又倨傲的中國的無比的困難來<sup>43</sup>。

<sup>36</sup> 見陳映真：《哦！蘇珊娜》，收於《陳映真小說集2 唐倩的喜劇(1964-1967)》，頁 84-85。

<sup>37</sup> 見 Edward Said 著，單德興譯：《知識份子論》同註 21，頁 158 頁 159。

<sup>38</sup> 見 Edward Said 著，單德興譯：《知識份子論》同註 21，頁 159。

<sup>39</sup> 見黎湘萍：《臺灣的憂鬱》自序，頁 118。

<sup>40</sup> 見陳映真：《鄉村的教師》，收於《陳映真小說集1 我的弟弟康雄(1959-1964)》，頁 36。

<sup>41</sup> 見黎湘萍：《臺灣的憂鬱》自序，頁 118。

<sup>42</sup> 見陳映真：《鄉村的教師》，收於《陳映真小說集1 我的弟弟康雄(1959-1964)》，頁 37。

<sup>43</sup> 見陳映真：《鄉村的教師》，收於《陳映真小說集1 我的弟弟康雄(1959-1964)》，頁 39。

改革徒有理想，又無法對戰事置身其外，他終究以自殘結束生命。如第三章所提及，這是一個小知識份子對無能改變的時勢作的無言抗議。鈴鐺花的高東茂的職務亦是小學教師，因教育體制而憤世嫉俗，最後成為叛亂者被捕處死，夜霧的李清皓亦屬同類。

薩依德心中的知識份子必然是一個站穩反對立場的人物，主要擔負的功能在於「提供各種另類選項：另類的資訊來源、另類的閱讀、提呈證據的另類方式」等等。在一篇 1988 年出版的文章 *From silence to sound and back again* 中，他給了後殖民知識份子兩個選擇：第一個選項他不認同，那就是選擇「緘默、流亡、欺瞞奸詐」等；第二個選擇是擔下表述的責任，嘗試為容易遭到欺壓的人民出頭，代替他們影響公共政策<sup>44</sup>。

五月十三節的羅東海，五十多歲，在家激烈批評市政時事的習性是由於二十多年前的市議員經驗所造成的；此種言行常招至親人的厭煩，但他卻能無愧無悔，有著一夫當關，舍我其誰的熱忱。家的主人翁也有位縣議員父親，熱心政治卻苦於家無恆產，「不然生意不做了，一心做個地方的有志者」，卻是有志難伸，到後來鬱鬱以終。

### （三）

對於受到調和適應、唯唯諾諾、安然定居的獎賞所誘惑甚至被圍困、壓制的知識份子而言，流亡是一種模式。即使不是真正的移民或放逐，仍可能具有移民或放逐者的思維方式，面對阻礙卻依然去想像、探索，總是能離開中央集權的權威，走向邊緣。在邊緣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這些是足跡從未越過傳統與舒適範圍的心靈通常所失去的<sup>45</sup>。流亡者存在於一種中間狀態，既非完全與新環境合一，也未完全與舊環境分離，而是處於若即若離的困境，一方面懷鄉而感傷，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sup>46</sup>。

薩依德對知識份子的論述，很大程度上來自於他對於「流亡」的刻骨體驗：「流亡就是無休無止，東奔西走，一直不能安定下來，而且也使其他人不能安定。無法回到更早、更穩定的安適自在的狀態，而且更可悲的是，永遠也無法完全抵達、無法與新的家園或境遇融為一體。」<sup>47</sup> 薩依德所說的流亡，在抽象意義上，意味著永遠失去對「權威」和「理念」的信仰：流亡者不再能安然自信地親近任何有形或無形的精神慰藉。憑此，「流亡」中的知識份子形成能夠抗拒任何「歸屬」的批判力量，不斷瓦解外部世界和知識生活中所謂的「恆常」與「本質」。在流亡視野裡，組成自我和世界的元素從話語的符咒中解放。彷彿古代先知在遷轉流徙於荒漠途中看出神示的奇蹟，當代的思想流亡者在剝落的「本質」歷史中探索事物的真相。「流亡」，無論怎樣的政治意識和理論思維由此產生，首先是一種面向個體存在方式的真誠體驗。在薩依德的論述中，「流亡」從個別的民族經

<sup>44</sup> 見 Valerie Kennedy 著，邱彥彬譯：《認識薩依德——一個批判的導論》，頁 259。

<sup>45</sup> 見 Edward Said 著，單德興譯：《知識份子論》，頁 101。

<sup>46</sup> 見 Edward Said 著，單德興譯：《知識份子論》，頁 87。

<sup>47</sup> 見 Edward Said 著，單德興譯：《知識份子論》，頁 90 頁 91。

驗變為個體經驗，它因此也就走出了狹窄的領域，面對我們每一個人<sup>48</sup>。

年輕的知識份子的漂泊與流浪，在淒慘的無言的嘴中，意味著無言的抗議，是用腳投票 立意告別黑房中，封閉、慘白、悶濕的日子。一綠色之候鳥 中年輕的敘述者「我」，雖然也決心要出去漂泊，但卻缺乏知性深刻的反思；候鳥的宿命特性即象徵一種失根的漂泊、蒼白的流浪。

被放逐的知識份子、無家可歸的流亡人士，以及在街頭示威的弱勢族群，他們以及他們身體上和地理上的不安定是民族國家之內和之間變化的動力；流亡的輾轉遷徙過程象徵個人生命對既有形式的捨棄與永不休止的自我超越，因而形成某種無固定形式的解放動力。遭遇「內在放逐」，與過去一拍兩散，忍受著各種加諸而來的迫害和侮辱，形成了新視野來看待自身的境遇，這使得他們有一種空間性的潛力將娛樂/重新創造(re-creation)及取代/移置(dis-placement)隱喻化<sup>49</sup>。對他們而言，流亡跨越邊界，打破思想與經驗的障礙。

雖然後殖民的真正主體（即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弱勢族群）尚在為求生存而奮鬥，後殖民的知識份子卻可以自由地從事狂歡化的解構與認同遊戲<sup>50</sup>：

知識份子也者，就是有其特定的知識上的偏執的那種人罷。知識人按著他們既有的教養、知識和癖好，去解釋世界，去評斷一切的事物。而這些教養、知識和癖好，又無不有其強烈的階級和黨派性<sup>51</sup>。

市鎮小知識份子的唯一救贖之道，必須在介入的實踐行程中艱苦地作自我的革新，同他們無限依戀的舊世界作毅然的訣別，從而投入一個更新的時代<sup>52</sup>。

知識份子應該意識到自己所處的場所和知識生產的情況，意識到自己也是夾在意識形態的生產運作之中。一個知識份子的自我意識在於對日常生活現實採取超然的態度，但卻無法逃脫或無視環境及文化對其所產生的影響，且這種影響直接流露到自己的著作之中。陳映真具有中國知識份子的情懷，時而樂觀於文學最終會取得勝利，會還歷史一個公道；有時，他又似乎十分悲觀，悲觀於文學之無用。這樣的悲喜交雜不啻反映出中國知識份子自古以來的困境 處在入世與出世的兩難之間，不是容易的抉擇，這也構成了莎士比亞式的「悲喜劇」。

<sup>48</sup> 見宋明煒：薩依德：思想「流亡者」，（《聯合報》周日版 B4，2003 年 9 月 28 日）

<sup>49</sup> 見廖炳惠：緬懷故土，重建中心，收入自著：《回顧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論文集》，頁 132。

<sup>50</sup> 見陶東風：《後殖民主義》，頁 65。

<sup>51</sup> 見陳映真：《知識人的偏執》，頁 31。

<sup>52</sup> 見許南村：試論陳映真，收於陳映真：《知識人的偏執》，頁 33。

?? ? ? ? ? ? ? ? ? ? 咖? ? ? 券? ? ?

?? 乏 ? ? ? ? ?

(一)

在殖民母國的文化或思想侵入殖民地時，會有人站出來高舉民族主義的旗幟來對抗/抗拒(resistance)殖民母國的侵略，避免喪失殖民地的自主性或主體性；然而這種民族主義後來卻變質成為極端的文化本質主義者，他們要求回到殖民前的本真或純真的民族文化或種族文化，認為如此方能真正擺脫殖民。法農因而提出「批判性的民族主義」概念，認為這種「文化民族主義」實質上即是「文化民粹主義」的再現；以文化民族主義為藉口，進行另一種新形式的「內在殖民」，而人民則成為另一套殖民主義的受害者。所謂本質式的傳統文化，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是不存在的，因為在任一地區，尤其是被殖民過之區域，文化是經過多重的

混合與雜交而形成的。故積極的後殖民論述，是結合/瞭解歷史現實而積極走出後殖民狀態的；其觀點是指第三世界的人要向全世界開放，並積極投入/參與資本主義的歷史<sup>1</sup>。所謂文化抵抗意指「論述權」的爭奪，亦即歷史身份、主體表述、自我再現等發言權的爭奪，文化反抗的目標則是西方數百年來以理性主義之名而進行之認識論壓迫。「抗爭」與「重建」是第三世界文學的主要策略，就此點而言，後殖民論述不啻就是反殖民論述(anti-colonial discourse)；而其文學文本就不是形式主義與結構主義的封閉空間，是向外對政治、社會、經濟等歷史現實開放的空間，並指涉權力與權力的支配<sup>2</sup>。

薩依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第三章 抗拒與反對 中引用馬來西亞後殖民學者阿拉塔斯(S.H.Alatas)的《懶惰土著的神話》*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 說明第三世界的後殖民困境。「懶惰土著」本為西方殖民者為了合理化對土著的經濟剝削，必須建構一套系統性地貶抑土著以便能施展其殖民宰制手段的意識形態，土著的種種不利於經濟生產的習俗和行為模式常被解釋為是懶散墮落的特質之表現，使被殖民者產生錯誤意識，面對殖民者只能自甘下流，並任其施與懲罰與訓誡之手段，以便順服地接受殖民者的勞力壓榨。此一廣義的東方主義神話不僅為馬來統治者所用，並且為經濟上強勢的華人少數族群所深信不疑，從而造成了族群之間的矛盾和互相歧視，如此更加有利於統治者去分化與操弄<sup>3</sup>。

## (二)

詹宏志在評論陳映真 基督徒與大眾消費文化 一文中提到：

在陳映真的心目中，守窮是一種力量，是一種對抗消費社會的腐敗墮落的精神力量。但是，這是從個人靈命修養的觀點來看的，當它作為一種普遍的祈求時，不免就有歷史上的反諷了。回頭看中國苦楚的近代史，「富」，自始就不是自願的，「富」與「強」都是在炮火中、鮮血中、羞辱中被「逼」出來的。這段期間，臺灣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富足飽食的一個社會，不能夠單獨解釋為「貪慾」，不能單獨解釋為「物慾的追逐」，因為「富」這個概念，曾經是一百年來中國知識份子受挫受辱之餘，立誓要建造給他們的子孫的一個「理想國」。

從「不富」到「不得不富」，從「不得不富」到「富錯了」，這是一場曲折、黝暗、不堪回首的歷史。從歷史的眼光，我們才會看到第三世界當中各種原民的美好文化，如何不得不「自毀」以求富求生存；從長期的視野中，我們才看到這個人類史上「文化

<sup>1</sup> 見李英明：《全球化下的後殖民省思》，頁 80 頁 84。

<sup>2</sup> 見孟 樊：後殖民論述的文學觀，頁 163。

<sup>3</sup> 見蔡源林：薩依德的後殖民論述與伊斯蘭，收入黃瑞祺主編：《後學新論 後現代/後結構/後殖民》，頁 316 頁 317。

種」快速消滅的大悲劇<sup>4</sup>。

對於陳映真和當時許多知識份子而言，中（臺）美關係的破裂使他們產生一種對於經濟依賴的不安全感與危機意識。他假設臺灣的經濟體制也會如同國際關係一般陷入孤絕，資本主義是所有人性腐敗、墮落和罪惡的淵藪，因此「守窮」是唯一可以抵抗社會墮落的一種力量<sup>5</sup>。貧困是一種客觀現狀，而苦難是一種人心體驗，過往的戰爭屠殺、貧困，勞苦、死亡，人的麻木、疏離，人與自然之間的相互剝奪，善惡的相互糾纏，這一切組成了無法逃避的苦難處境<sup>6</sup>，則是陳映真更深層的體認，隱現於文本之中。

我的弟弟康雄 中，姐姐回憶起康雄的日記裡說：

富裕能毒殺許多細緻的人性， 貧窮本身是最大的罪惡，它使人不可避免的，或多或少的流於卑鄙齷齪<sup>7</sup>

表明康雄的內在矛盾性格，同時受縛於制度的無奈，使他最終成為一個行動的無能者。

某一個日午 中，房恭行翻閱父親年輕時所研究有關社會主義之藏書，因而愧怍自戕，在留給父親的遺書裡說：

讀完了它們，我才認識了：我的生活和我二十幾年的生涯，都不過是那種你們那時代所惡罵的腐臭的蟲豸。我極嚮往著您們年少時所宣告的新人類的誕生以及他們的世界。然而長年以來，正是您這一時曾極言著人的最高底進化的，卻鑄造了這種使我和我這一代人萎縮成為一具腐屍的境遇及生活；並且在日復一日的摧殘中，使我們被閹割成為無能的宦官。您使我開眼，但也使我明白我們一切所恃以生活的，莫非巨大的組織性的欺罔。更其不幸的是：您使我明白了，我自己便是那欺罔的本身。欺罔者受到欺罔。開眼之後所見的極處，無處不是腐臭和破敗。我崇拜您，但也在那一瞬之際深深地輕蔑著您，更輕蔑著我自己。我無能力自救于這一切的欺罔，我唯願這死亡不復是另一個欺罔<sup>8</sup>

山路 中，蔡千惠的信裡也同樣寫著：

<sup>4</sup> 見詹宏志：《理想論者的思想與歷史觀——札記陳映真的文學評論》，收於自著：《閱讀的反叛——大致與小說有關的札記》，頁 97—頁 98。

<sup>5</sup> 見楊曉琪：《鄉土文學論戰暨 70 年代的文學場域變遷》，頁 82。

<sup>6</sup> 見李 銳：《重新敘述的故事》，收於自著：《無風之樹》，頁 226。

<sup>7</sup> 見陳映真：《我的弟弟康雄》，收於《陳映真小說集 1——我的弟弟康雄(1959-1964)》，頁 14。

<sup>8</sup> 見陳映真：《某一個日午》，收於《陳映真小說集 3——上班族的一日(1967-1979)》，頁 60—頁 61。

我突然對於國木一寸寸建立起來的房子、地毯、冷暖氣、沙發、彩色電視、音響和汽車，感到刺心的羞恥。那不是我不斷地教育和督促國木「避開政治」、「力求出世」的忠實的結果嗎？我感到絕望性的、廢然的心懷。長時間以來，自以為棄絕了自己的家人，刻意自苦，去為他人而活的一生，被資本主義商品馴化、飼養的了、家畜般的我自己，突然因為您的出獄，而驚恐地回想那艱苦、卻充滿著生命的森林。然則驚醒的一刻，卻同時感到自己已經油盡燈滅了<sup>9</sup>。

她認為「我來你們家，是為了喫苦的」，而「現在我們的生活好了這麼多，這樣妥當嗎<sup>10</sup>？」她早期教導小叔國木「同樣是窮人，就要互相幫助」，為贖兄長之罪把自己奉獻給貧窮的李家，敢於承受並安貧若素；千惠的死因此可以解讀為蘊含陳映真矢意為資本主義在臺灣的發展，向他心目中有如神明一般的勞動者贖罪的示意作用。她為追求最大的幸福「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因而作出無我的獻身，與房恭行二者同樣縈繞著理想幻滅的悵惘。陳映真在角色上讓房恭行與蔡千惠歷經了生命原始的酷虐，卻又提升他們成為救贖社會不公不義的象徵。

王禎和的小說形式常以符號取代文字，如《玫瑰玫瑰我愛你》用□形容董斯文放的屁，而《寂寞紅》中秦世昌與阿彩的床戲則以「一空心長方形」代之。並非不能直接描寫，而是利用此一空白圖像象徵秦世昌所面對瑣碎糾纏的人際關係、重壓的生計責任，抗拒一成不變的婚姻關係；與阿彩的作為不啻為他的煩悶人生開啟的一扇窗<sup>11</sup>。

### （三）

面對一個既不安定又不保險的世界，在為個人提供安全方面（身體上的或感情上的），族群的支配力與影響力絕不亞於公民身份。在自己的「國家」中，不論多麼壓抑、不滿、疏離，最無奈的事實就是，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只會更加陌生、更加疏離；在一個國家擁有公民身份，但卻被剝奪了族群意識，也就無異於被拋擲到無家的荒漠，無異於處身於猛獸出沒的蠻荒<sup>12</sup>。由於臺灣和中國大陸之間特殊微妙的歷史關係，當人們強調要回歸本土的時候，不只會面臨對西方中心主義，甚至更是對中原中心主義的挑戰。臺灣的官方政權，不再只是孤立於臺灣的外來政權，而是與「中國」沆瀣一氣，同命共運的殖民先鋒，這也是對於臺灣政府的外來殖民政權性質再予更明確的定位以及更直接的抵抗。

一般總把追求西方現代知識當作進步的象徵，並模模糊糊的相信，這樣的追

<sup>9</sup> 見陳映真：《山路》，收於《陳映真小說集5 鈴鐺花(1983-1994)》，頁89-90。

<sup>10</sup> 見陳映真：《山路》，收於《陳映真小說集5 鈴鐺花(1983-1994)》，頁74。

<sup>11</sup> 見高全之：《寂寞紅的非常體制及其詮釋》，收於《王禎和的小說世界》，頁85。

<sup>12</sup> 見Harold R. Isaacs 著，鄧伯宸譯：《族群》，頁255。

求不但可以對抗保守的政治，甚至還可能反過來改變保守的政治。這種「向西方學習」的知識探求，雖然隱含了某種「對抗政治」的潛意識，但也造成知識份子普遍不了解事實，不了解經濟，不了解「本土」的缺失<sup>13</sup>。在後殖民情境下，知識份子學習西方啟蒙文化而試圖自我解脫，因此嘗試重新審視本土文化傳統，想發展出國民精神或「自上而下」的內在族群認同，透過史詩、民謠、鄉土文學的模式，所刻意運用的抗拒策略，來宣稱某一種永恆而純真的大敘事體<sup>14</sup>。

?? 乏 ???? 恂

(一)

後殖民主義者在論述西方相對於非西方的後殖民現象時，最常使用的是傅柯(M. Foucault)的「知識權力」概念和葛蘭西(A. Gramsci)的文化霸權(hegemony)理論。傅柯在《知識考古學》*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中強調西方近代知識建構和權力獲取之間的關聯；葛蘭西則是強調知識建構與統治正當性基礎之間的關係<sup>15</sup>。在著名的後殖民理論家薩伊德的著作《東方主義》*Orientalism* 裡，卻將兩者結合，運用傅柯和葛蘭西的理論批判西方中心主義及其所含攝的本質主義。

葛蘭西的霸權是指在自由資本主義社會中，統治階級通常不是經由直接強迫，而是透過被認可的方式，將權威加諸於其他階級；統治階級更試圖將一切異端都框架在其自身之思想視野內部。霸權意即意識形態的領導權，經由家庭、教育制度、教會、傳媒和其它文化形式而得以運行；它並不是處於永恆的狀態之中，而必須經由統治階級主動爭取並鞏固；霸權是社會統治集團可使用之各種社會控制模式，其產生背景即為社會衝突<sup>16</sup>。葛蘭西認為，西方資產階級強有力的統治建立於政治、思想和道德的領導權之上，它更多地依賴於群眾的自願接受統治，而不是依靠暴力來維持。意識形態並非虛妄，它是建立霸權的基礎；無產階層與資產階級之間誰勝誰負的鬥爭，就取決於誰先掌握了霸權，誰先擁有意識形態的支配權。霸權的生產、再生產與轉化均是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之產物：市民社會的特徵是它所標榜的自由與民主，而教育、家庭、教會及大眾文化與傳媒等社會機制，無不是為霸權以文化和意識形態之形式大行其道。故可見霸權是社會支配集團為確保對其被支配集團之領導權，不斷變換手法予以推廣之一系列觀念，其錯縱複雜之特點，使其有別於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功能，而後者帶有更多之強

<sup>13</sup> 見呂正惠：七、八十年代臺灣鄉土文學的源流與變遷，收於張寶琴、邵玉銘、? 弦主編：《四十年來中國文學》，頁150。

<sup>14</sup> 見廖炳惠：時空與性別的描述——論《霸王別姬》，收入自著：《回顧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論文集》，頁197。

<sup>15</sup> 見李英明：《全球化下的後殖民省思》，頁73。

<sup>16</sup> 見陸揚：《大眾文化理論》，頁114—117。

制性特徵<sup>17</sup>。

自由霸權的盛行及其導至的市場化勃興經歷過兩個主要階段：第一階段涵蓋十九世紀大半葉，英國憑藉有利的工業發展、殖民帝國和卓越的海軍而成為支配霸權，這是國際秩序與國際安全時期，在此一階段中，國際關係作為國家之間反思性的外交策略已然出現，而盟約、聯盟和全球帝國主義的擴張亦出現於該時期；第二階段從 1950 年到 1970 年，美國依恃技術優勢，大量生產系統和軍力成為此階段之霸權，透過布列敦協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設立的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來穩定匯率和抑制國際通貨膨脹，另外也訂定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協助歐洲經濟重回世界市場，也創設關稅暨貿易總協定以及最惠國系統，嘗試降低國際上的關稅保護<sup>18</sup>。

雖然冷戰的結束使全球權力結構進入後霸權時代，但並非等於霸權消失了。事實上，美國的實力並未削弱，由於兩極體制的瓦解，在某種意義上反而增強了：它在經濟、軍事、外交、意識形態、文化諸方面都處於主導地位，並且具有在全球幾乎任何一地促進其利益之手段與能力；它在 90 年代確立的策略是維持一極之下的多極格局，積極參與全球行動，並且力爭領導權。所謂的多極相互之間存在著利益分化，基本上不可能協調行動，或採取策略上的平衡制約；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在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使得美國在某種程度上更容易實現自己的意志<sup>19</sup>。而文化資源的不均衡使得在整個文化融合過程中，既定霸權（西方、多國資本主義）佔據相當的優勢地位，而且確保任何對霸權地位構成挑戰威脅的嶄新事物不至於發生。

## （二）

葛蘭西強調霸權從廣義上來說，之所以普遍被接受涉及到社會中的主導集團，對其從屬階級作出的一系列讓步與妥協：

霸權的事實是假定採取步驟照顧到了蒙受霸權集團的利益和傾向，假定是作出了某種妥協平衡。換句話說，領導集團應當做出經濟方面的一些犧牲；但是無疑地沒有這些犧牲妥協無法觸及本質的東西，因為霸權雖然是倫理的、政治的、它必然同時也是經濟的，它的基礎必然是領導集團在經濟活動的關鍵內核中，所發揮的舉足輕重之功能。

社會支配集團的權力最終可由經濟地位說明，很明顯地霸權的基礎即是資產階級。霸權背後的讓步與妥協主要是經濟上的，福利提供與增加工資即為此一讓步與妥協之外在表徵<sup>20</sup>。發達資本主義文化霸權已經強有力地制約著人們的潛意

<sup>17</sup> 見陸揚：《大眾文化理論》，頁 125 頁 126。

<sup>18</sup> 見 Malcolm Waters 著，徐偉傑譯：《全球化》，頁 50 頁 51。

<sup>19</sup> 見楊雪冬：《全球化》，頁 195。

<sup>20</sup> 見陸揚：《大眾文化理論》，頁 121 頁 122。

識，即使是那些看上去是在反抗西方霸權的民族主義色彩濃厚的作品裡，其實卻隱含著更為嚴重的「後殖民性」的心理。

陳映真自言：

回顧走來的道路，明晰地感覺到，我在台灣的半生，無非都活在「對美制霸下的世界秩序」(Pax Americana)的反撥中<sup>21</sup>。

對陳映真而言，美國的勢力真是無處不在，著作一系列有關跨國公司的小說（尤其是《雲》），清楚地表示痛惡西方霸權勢力的無孔不入；也正因為如此，如何從中脫困成為其人生的重要課題。

賀大哥 中陳映真藉由賀大哥之口控訴美國老大哥參戰的功過是非：

因為他們的後面站立著一個巨人 國家，在越南的孩子們，都是越南的受害人。 由於是被害者，終於成為加害者；然後加害者又成了加害於人這個事實的被害者<sup>22</sup>。

越戰可說是美國的致命傷，為維持「世界警察」的角色，卻落得兩敗俱傷 美國人民的生命及越南人的生命，還賠上數以億計的金錢，吃力不討好。

王禎和對此卻持相反的看法。《美人圖》裡航空公司小姐接待剛從美國回來轉機到科威特的客人，詢問他對美國的印象，他回答：

Huh,America,ho-ho-ho has no culture at all.Huh,you know they even don't know how to get dressed.

（美國 呵 呵 呵根本沒文化。嘿！你曉得嗎？他們甚至連衣服都不曉得怎麼穿！）<sup>23</sup>

並且大力推銷科威特的好處，聽得這些小姐暗地偷笑。當然他主要目的在反諷這些崇美的「美」人一心想拿綠卡，在家鄉卻猶似過客的居留心態；挖掘其深層意義，美國的霸權如前述主要建立於經濟之上，不是美式文化；崇美的人們（包括留學、研究者）多為仰慕美國的國力強大，生活品質與研究環境優良，並非對其大雜燴文化的嚮往。法國社會學家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在他一次長程的橫跨美國之旅後，有感而發的提到：「未來，權力屬於人造衛星，而不是地球。」他並非指美國擁有全世界最多的人造衛星，而是指美國本身就是一個超大型的人造衛星，不依附、從屬於地球上任何一塊土地。他解釋，未來權力將屬於那些沒有起源、沒有真實性，卻知道如何充分運用這種狀況的人。美國的流行文化得以橫

<sup>21</sup> 見黎湘萍：《臺灣的憂鬱》陳序，頁 5。

<sup>22</sup> 見陳映真：《賀大哥》，收於《陳映真小說集 3 上班族的一日(1967-1979)》，頁 123。

<sup>23</sup> 見王禎和：《美人圖》，頁 131 頁 132。

掃全世界，原因即在於美國這樣由眾多殖民族群所構成的國家，與其他有長久歷史、有傳統的國家相比，它是沒有文化、歷史與傳統的<sup>24</sup>。

「美援」對於臺灣經濟提升固有一定的貢獻，然而到了 70 年代末期中美建交、台美斷交，大批的移民如潮水一波接一波，「內在美」的情形比比皆是；王禎和的《美人圖》中深刻地以文字為顏料，畫出了周遭人等的浮世繪。這些中產階級美其名為留在臺灣「為國家效力，與國家共患難 愛國的情緒可比阿里山高」，實際上「紅著眼地到處向人求借身份證，準備把賣房子得來的兩百多萬新臺幣化成一筆筆小額美金匯出去援美」。由「美援」而「援美」，金額的大小與流向截然不同，也代表一種意涵：由直接的霸權展現轉而成為間接的助長霸權。美國雖是經濟強國，但因其老大心態，援助許多開發中或未開發國家，連年預算赤字，金玉其外而虧空其中；多虧了這些移民的「外匯」，方維持住表面功夫；因此我們也許無甚理由批判世界強權對弱國的壓迫，因為我們其實大多數是幫兇，與之形成共犯結構。

?? 乏 力???? 券

薩依德的「東方主義」主要是指一套由西方所建構的關於東方的認知與話語系統，在此一系統中，東方被置於西方文化的權力話語之下，「東方主義是一種支配、重構東方並對之行使權力的西方文體」；意即「東方」在東方主義的話語權力網絡中心被他者化了，成為被評判、被研究、被描寫的對象，以確證西方自我。這種權力話語的基本操作方式是一套二元對立模式：東方/西方、落後/進步、荒誕/理性、神秘/科學<sup>25</sup>。東方作為一種實際上的現存，卻淪為西方學術地圖中的想像物；並被視為無法發聲的第三世界。

薩依德並且認為，東方主義是為了帝國主義的目的而創造東方或將東方「東方化」(orientalized)的一種霸權話語。東方被西方「命名」和「界說」了，不僅因為十九世紀歐洲人普遍認為東方具有「東方特徵」，且因為可以被製造和被俘虜為西方文化霸權體系中的一個他者形象。他提到：

出現在東方主義中的東方是一個由一整套把東方帶入西方的學術、西方的意識以及西方的帝國的暴力形構而成的再現體系<sup>26</sup>。

在東西方之間的勢力懸殊之情形下進行任何關於東方的話語交流只能是文化霸權的體現，文化霸權使東方主義具有力量和持久性<sup>27</sup>。

<sup>24</sup> 見王盈勳：《世界是斜的——從本地觀點看切身經濟問題》，頁 68。

<sup>25</sup> 見陶東風：《後殖民主義》，頁 80 頁 81。

<sup>26</sup> 見 Edward Said：《東方主義》，頁 178。

<sup>27</sup> 見張京媛：彼與此——愛德華·薩依德的《東方主義》，收於自編：《後殖民主義理論與文化認同》，頁 39。

東方主義完全是男性中心思想的產物，充滿性別歧視的盲點。在許多西方作家筆下的東方，往往是一個充滿神秘、冒險色彩，並且擁有廣大資源的終極疆域 (final frontier)；一個西方人既可馳騁浪漫情懷，又可實行經濟剝削的邊陲地帶。如同女性一般，東方已然被定型為浪漫化和掠奪的客體，亦即男性權力幻想 (power-fantasy) 的符徵；所謂「東方新娘的面紗」或「神秘的東方」已經成為日常的措辭。這是以西方為指涉主體的自我，東方為概念化他者的本體性區分；這種意識形態是西方人藉以壓制，另行塑造，並且支配東方的做法；換言之，將東方予以概念化的行徑，並非全然哲學思維的問題，而是隱含實際的社會、經濟目的<sup>28</sup>。

薩依德在《東方主義再思》 *Orientalism Revisited* 一文中提到，在種族和性別的面向上，西方人將東方人視為是肥沃的土地或性能力特別強以至於造成某種威脅，並且透過膚色與外貌的區分將其妖魔化<sup>29</sup>。東方人被想像成娘娘腔或陰柔，亞洲女性更是如此。

陳映真的《夜行貨車》裡，總經理艾森斯坦對張維傑轉述麥迪遜遠東總裁麥伯里的觀念：

「他慣常對我們說：東方像是個深情而又保守的寡婦。各位先生，只要你懂得討她的歡心，她會獻出她的一切。但是即使在最輕狂的時刻，也要顧到她的面子，以及一切東方人的禁忌<sup>30</sup>。」

因此「如果你要整廠長，意味著你和宋之間的決裂」，宋老闆代表的是守舊的勢力，這裡直接指涉的就是宋弼與跨國公司之間的關係：他不惜獻身給可帶給他巨利的西方投資者，但仍要維持中國人式的人情面子問題。與他合作甚或受過其恩惠的跨國企業經營者，為宋弼者流建構了一既定的框架，表面上平起平坐，實質上利用企業的巨輪將其碾過，拋棄在歷史的洪流中。

唐倩的喜劇《裡》，喬治 H D 周對唐倩說：

光談戀愛，安妮是個舉世無匹的對手，伊是那麼令人歡躍啊！但做妻子就不行了。每個男人都需要一個溫順賢淑的女人做妻子<sup>31</sup>。

因此他還是回頭娶了唐倩，象徵在東方與西方之間各取所需。

《夜行貨車》裡，摩根索先生大言不慚地說：

我們外國公司就是不會讓臺灣從地圖上抹除。我們美國商人認

<sup>28</sup> 見張國慶：《吉姆大公》敘事、言詞與東方主義，收於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頁 64。

<sup>29</sup> 見廖炳惠編：《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頁 223。

<sup>30</sup> 見陳映真：《雲》，收入《陳映真小說集 4 萬商帝君(1980-1982)》，頁 77。

<sup>31</sup> 見陳映真：《唐倩的喜劇》，收於《陳映真小說集 2 唐倩的喜劇(1964-1967)》，頁 152。

為臺北比紐約好千萬倍，而你們 XX 的中國人卻認為美國是 XX 的天堂<sup>32</sup>。

「小姐，人間要真有天堂，我敢說舊金山就是天堂。你不知道舊金山是全美國最漂亮的城市，一年四季都是春天，都是春天。」<sup>33</sup>

臺北之於摩根索，相較於其他人，是他大展身手之地；留在紐約，他不過是個無名小卒。換言之，他眼中的臺北即是臺灣人眼中的紐約，時同而地不同，角色互換，相互以他者視之。

王禎和在《玫瑰玫瑰我愛你》中，諷刺美國的金援是多方面的，派遣美軍保衛臺海安全，間接利用美軍度假也可活絡經濟，發展觀光，成為另類的「美援」；文中董斯文批評四大公司的營業場所：

這種骯髒兮兮的房間用來接待我們自己同胞，那我莫有異議，因為國人向來不注重衛生，拉撒吃拉撒肥，拉撒暎拉撒好。哼！就是在牛窩豬寮裡苟且，也不要緊<sup>34</sup>。

雙重標準在此表露無疑：為了迎合美軍，間接醜化臺灣男性為落後的象徵，與女性一同被視為商品，只不過是劣質的。董斯文欲扭轉西方對「東方」的形象卻適得其反，落入等而下之之境。

?? ? 俟 嶸

(一)

文學文本是和社會大文本相互結合的產物，審美活動和社會政治經濟活動並沒有大的區別，雙方的再現是相互的、相通的，甚至是相同的。一個文本，既隱藏著自我的某些真實，又隱藏著自我藉助對社會、文化等「他者」話語的某些訴求，屈從、理解、改造與反叛而獲得的「意外」的內涵和力量。他者的話語與個體的、自我的話語在一個文本中被融合在一起，而且彼此聲音的差異往往細緻地難以察覺<sup>1</sup>。

在陳映真與王禎和的小說中均可看出這些端倪。陳映真自命為「知識的偏執者」，所承擔的社會責任不可謂之不重；他為弱勢及邊緣族群（老兵、婦女等）發聲，同時也為自我發言。他從受迫受害者的歷史情境出發，經由歷史化的同情投

<sup>32</sup> 見陳映真：《夜行貨車》，收入《陳映真小說集 3 上班族的一日(1967-1979)》，頁 181。

<sup>33</sup> 見王禎和：《小林來臺北》，收入自著：《嫁妝一牛車》，頁 243 頁 244。

<sup>34</sup> 見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頁 170。

<sup>1</sup> 見黎湘萍：《臺灣的憂鬱》，頁 150。

注他所有的關懷<sup>2</sup>，也從中汲取生命之力量。陳映真更繼承了臺灣光復前後小知識份子對政治的期望與幻滅，他的藝術感性表現了日治時代末期龍瑛宗、葉石濤等人曾經經營的「厭悒的、纖麗的東洋色調」，此一色調成為被殖民者欺罔與怨懟(ressentiment)的印記<sup>3</sup>。王禎和作為鄉土文學的代表，則力圖避開官方論述的控制，刻劃城鄉差距，凸顯臺灣經濟的殖民地性格；不過二者之核心思想仍有著由民族主義分化出的社會主義與本土主義的區別。

薩依德所提到的一些在中東世界所發生的現象，在東亞世界也同樣存在，臺灣自不例外。例如：美式通俗文化之吸引年輕一輩、世俗化與物質主義、年輕學生留學西方的熱潮、知識份子甘為西方殖民主義之買辦等，並有產生「東方主義化的東方」的現象，即本土知識份子以西方的東方學者所建構出來的東方來看待自己的母文化，而造成自我認同混淆的問題<sup>4</sup>。這些現象陳映真先於其他臺灣知識份子，率先為文論述；王禎和踵至其後，《華盛頓大樓》系列、唐倩的喜劇是，小林來臺北、《玫瑰玫瑰我愛你》又何嘗不是？

王禎和作品中的主角都有一個需要對抗、受盡它威脅的勢力，有論者以之為「危機時代的新反抗文學」<sup>5</sup>，認為「一個反抗的文學作家的責任是，去發掘神秘的表現技巧和尊嚴的生存原則。」<sup>6</sup>這點王禎和當之無愧；而陳映真的作品亦復如是。抗拒的對象小從婆媳、父母，大至跨國企業、國家，如同臺灣本身處境一般。

施淑說：

就像一般殖民地社會的發展，臺灣由傳統農業經濟躍向資本主義的獨佔形態，以及由之而來的資本主義階級關係的產生，都不是因社會本身內部的發展，而是由於殖民的外來需求而產生的<sup>7</sup>。

王禎和作品中的人物，多半為臺灣經濟轉型期居住在鄉間的小人物，他們雖然秉持原有素樸的苦幹作風，但卻在資本主義的成長與滲透下，因與外來力量戰鬥而被扭曲變形；同時，都市土地成為掠奪對象，在競爭之下落敗。在這種社會轉變中，不僅一般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由和諧趨於傾軋，倫理關係也日見澆薄<sup>8</sup>。陳映真同樣關注鄉土的發展，關注社會底層卑微人們的生存，也關注知識份子的社會流動；但他卻從對社會問題的超然關注逐漸轉向對自我困境的反省，直接書寫個

<sup>2</sup> 見曾萍萍：《陳映真小說與後殖民論述》，頁206。

<sup>3</sup> 見王德威：《最後的馬克思——評陳映真〈歸鄉〉及其他》，收入自著：《眾聲喧嘩以後——點評當代中文小說》，頁189。

<sup>4</sup> 見蔡源林：《薩依德的後殖民論述與伊斯蘭》，收入黃瑞祺主編：《後學新論——後現代/後結構/後殖民》，頁325。

<sup>5</sup> 見舒凡：《嫁妝一牛車》遠景版序之標題，頁265。

<sup>6</sup> 見舒凡：《嫁妝一牛車》遠景版序，頁267。

<sup>7</sup> 見施淑：《臺灣的憂鬱——論陳映真早期小說及其藝術》，收於自著：《兩岸文學論集》，頁153。

<sup>8</sup> 見尉天驄：《王禎和小說的現實意義》，收入《嫁妝一牛車》，頁277。

人苦境，呈示個人話語。這些亦為鄉土文學的傳統：「貧困」的表現與人性密不可分，且越到後期越注重「貧困」對人性尊嚴的影響與考驗<sup>9</sup>。

(二)

一個「後殖民主體」本身即為一「缺名」的存在，它像是流連邊界的遊客，按著模糊難辨的足跡，卻苦尋不著失落的精神家園。這種主體的龜裂既滋育著一種支解自我的寫作，文體和語言的戲弄又像正在解構自身的殘缺<sup>10</sup>。虛構是對單方論述的解構，亦是對真實史實的重構，多層意涵的虛構，是用來諧擬一種後現代式的文本策略。

黎湘萍先生說：

陳映真的語言是知識份子的語言，具有濃厚的五四時代的抒情與思辨的色彩，而很少將臺灣本土的口語方言寫入作品，王禎和在熔鑄方言於人物的內心獨白和敘述方面，深受亨利 詹姆斯和張愛玲的影響<sup>11</sup>。

依此而論，陳映真與王禎和在語言上其實殊途同歸，均有五四新文學的因素；不過陳映真風格趨於京派（尤近於魯迅）<sup>12</sup>，而王禎和則近似海派<sup>13</sup>。陳映真風格沉穩，王禎和的語言風格毋寧更接近後殖民的諧謔。

「單一母語寫作」的觀點，只有在把語言看成是一種純淨無染之文化載體的假設上方能成立。然而，從未有任何一種文化是純淨的，歷來所有的文化都是混雜兼蓄的。反對官方語言並主張回歸一種毫無雜質的本土語言，和自稱唯一高等的文化一樣，都是站在一種「語言本質主義」的立場。挪用殖民語言本身就是一種「寫作權力」(power of writing)的再生產，通過作家運用轉換(code-switching)和方言音譯(vernacular transcription)等策略，產生棄置霸權又展開重寫定義(re-define)的雙重作用，將帝國論述原先用來劃定中心與邊緣之疆界的論述權力

<sup>9</sup> 見黎湘萍：《超越壓抑：臺灣小說寫作總論》，收入自著：《臺灣的憂鬱》，頁 33。

<sup>10</sup> 見宋國誠：《後殖民文學：從邊緣到中心》，頁 423。

<sup>11</sup> 見黎湘萍：《被拋入歷史的人們——重讀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的小說》，收入自著：《臺灣的憂鬱》，頁 244。

<sup>12</sup> 王德威認為「陳映真與五四以來左翼文學的論式，畢竟有互通聲息之處」。見《最後的馬克思——評陳映真 歸鄉 及其他》，收入自著：《眾聲喧嘩以後：點評當代中文小說》，頁 189。同時如以「互文性」而言，《萬商帝君》中描述林德旺吃自助餐時「看見那些粉紅色的豬頭皮中，竟而參雜著人的耳朵和指頭。凡是有肉的菜，其中莫不躲藏著人的頭皮、指甲、脛骨、甚至於人的生殖器」，「每一個人都互相欺詐，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把人的筋、骨、肉、皮，當作豬肉、雞肉吃掉」，幾乎是魯迅《狂人日記》的再現。見陳映真：《萬商帝君》，收於《陳映真小說集 4 萬商帝君(1980-1982)》，頁 203 頁 204。

<sup>13</sup> 高全之舉出許多王禎和與張愛玲文學間息息相通的例證：例如張之《桂花蒸 阿小悲秋》，王則有《來春姨悲秋》之作；另外如文學主張與文字敏銳、人性看法、對自私求生的諒解等，均可找到共同（或相似）之處。見高全之：《張愛玲與王禎和》，收入自著：《王禎和的小說世界》，頁 162 頁 163。

奪取過來，重新協商並重定文化疆界<sup>14</sup>。運用包含豐富之轉喻、對比、互譯的混合語言，是後殖民文化抵抗行之有效的策略。王禎和混雜了國、臺、英語，甚且加進空缺等，陳映真則多少混雜日語（凸顯日治的影響）及英語（凸顯帝國主義的霸權），正是以文本表述奪取論述主權的手段。

（三）

後殖民主義在語義上傳達出一種透過「殖民主義」之單一範疇而歷史化的世界觀。在今天全球化的形勢下，必須排除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而真正使民族達至統一的是文化。陳映真一向被認為是「大中國主義」者，但在其作品中期許人們的是「作一個世界公民」，因此似乎對他的評價失之過當。他以異端敘述挑戰當道，應是一種「抵中心」，符合在後殖民時代為重建主體性所作出的執著。

陳映真與薩依德相同之處，在思想上是「精神貴族」，蔑視一切形式的思想束縛；在政治上是「孤家寡人」，不和任何勢力進行合作或妥協。作為自身與他者間曖昧難自明的身份，讓陳映真有著難於確立自己觀看臺灣位置點的惚恍模糊特質；而尤其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強勢介入，更加添了彼與此恩怨情仇的複雜性。因此透過一部部小說，有使命感的作者不允許臺灣人繼續將不愉快的記憶、難堪的狀況、痛苦的責任，全都堆到集體潛意識的黑暗角落裡去；因為文學能為時代、為歷史作見證，能替人類的困境尋找出路<sup>15</sup>，作家的任務不僅是反映人生，更是從文學喚發行動的力量，改造社會；「不信真理喚不回，不信青史盡成灰」。

## 參考書目

1.? ?

陳映真部分：

《陳映真小說集 1 我的弟弟康雄(1959-1964)》（臺北：洪範書店，2001年10月初版）

《陳映真小說集 2 唐倩的喜劇(1964-1967)》（臺北：洪範書店，2001年10月初版）

《陳映真小說集 3 上班族的一日(1967-1979)》（臺北：洪範書店，2001年10月初版）

<sup>14</sup> 見尉天驄：王禎和小說的現實意義，收入《嫁妝一牛車》，頁217-218。

<sup>15</sup> 見王禎和：永恆的尋求，收於自著：《人生歌王》，頁11。

- 《陳映真小說集 4 萬商帝君(1980-1982)》〔臺北：洪範書店，2001年10月初版〕  
《陳映真小說集 5 鈴鐺花(1983-1994)》〔臺北：洪範書店，2001年10月初版〕  
《陳映真小說集 6 忠孝公園(1995-2001)》〔臺北：洪範書店，2001年10月初版〕

## 王禎和部分：

- 《香格里拉》〔臺北：洪範書店，1980年10月初版〕  
《美人圖》〔臺北：洪範書店，1982年1月初版〕  
《玫瑰玫瑰我愛你》〔臺北：遠景出版公司，1986年4月三版〕  
《人生歌王》〔臺北：聯合文學雜誌社，1987年5月二版〕  
《嫁妝一牛車》〔臺北：洪範書店，1993年9月初版〕  
《兩地相思》〔臺北：聯合文學雜誌社，1998年6月初版〕

## 2. ？ ？

- 王 寧、薛曉源：《全球化與後殖民批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  
王岳川編：《後殖民主義與新歷史批評》〔山東：新華出版社，1999年〕  
徐 賁：《走向後現代與後殖民》〔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  
張京媛：《後殖民理論與文化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宋國誠：《後殖民論述 從法農到薩依德》〔臺北：擎松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宋國誠：《後殖民文學：從邊緣到中心》〔臺北：擎松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  
陶東風：《後殖民主義》〔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王逢振：《文化研究》〔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廖炳惠：《回顧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論文集》〔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  
廖炳惠：《認同、差異、主體性：從女性主義到後殖民文化想像》〔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4年〕  
廖炳惠編：《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羅 鋼、劉象愚主編：《後殖民主義文化理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黃瑞祺主編：《後學新論 後現代/後結構/後殖民》〔臺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3年〕  
李英明：《全球化下的後殖民省思》〔臺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  
李英明：《全球化時代下的臺灣與兩岸關係》〔臺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2001 年 )
- John Tomlinson 著，鄭元、陳慧慈譯：《全球化與文化》（臺北：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2001 年）
- Malcolm Waters 著，徐偉傑譯：《全球化》（臺北：弘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 年）
- Ulrich Beck 著，孫治本譯：《全球化危機 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9 年）
- 黃瑞祺主編：《現代性 後現代性 全球化》（臺北：左岸文化，2003 年）
- 陸揚：《大眾文化理論》（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 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臺灣 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 陳芳明：《後殖民臺灣 文學史論及其周邊》（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 方孝謙：《殖民地臺灣的認同摸索 從著書到小說的敘事分析(1895-1945)》（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1 年）
- 江自得主編：《殖民地經驗與台灣文學 第一屆台杏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0 年）
- 湯林森：《文化帝國主義》（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4 年）
- Bart Morre-gilbert 等編，楊乃喬等譯：《後殖民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
- Bart Morre-gilbert：《後殖民理論 語境 實踐 政治》（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
- Jacques Derrida 著，張正平譯：《他者的單語主義 起源的異肢》（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 Edward Said 著，蔡源林譯：《文化與帝國主義》（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 年）
- Edward Said 著，單德興譯：《知識份子論》（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
- Edward Said 著，王志弘等譯：《東方主義》（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 年）
- Edward Said：《賽義德自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
- 朱剛：《薩依德》（臺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年）
- Valerie Kennedy 著，邱彥彬譯：《認識薩依德 一個批判的導論》（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 Bill Ashcroft、Gareth Griffiths、Helen Tiffin 著，劉自荃譯：《逆寫帝國 後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臺北：駱駝出版社，1998 年）
- 艾勒克 博埃默著，盛寧、韓敏中譯：《殖民與後殖民文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年）

- 邱貴芬：《仲介臺灣：女人 後殖民女性觀點的臺灣閱讀》（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
- 王潤華：《華文後殖民文學 本土多元文化的思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1年）
- 陳明姿編：《後殖民主義 臺灣與日本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日文系，2002年）
- 侯立朝：《後殖典範與美國中國圖像》（臺北：博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
- 龔鵬程：《臺灣的社會與文學》（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
- 游勝冠：《臺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臺北：前衛出版社，1997年）
- 林瑞明：《臺灣文學的本土觀察》（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
- 陳昭瑛：《臺灣文學與本土化運動》（臺北：正中書局，1998年）
- 張茂桂等：《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臺北：業強出版社，1993年）
- Harold R. Isaacs 著，鄧伯宸譯：《族群》（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年）
- 郭洪紀：《台灣意識與中國情結》（臺北：慧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
- 黎湘萍：《臺灣的憂鬱》（臺北：人間出版社，2003年）
- 張誦聖：《文學場域的變遷》（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年）
- 施 淑：《兩岸文學論集》（臺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7年）
- 丁 帆等：《中國大陸與臺灣鄉土小說比較史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 趙遐秋、呂正惠主編：《臺灣新文學思潮史綱》（臺北：人間出版社，2002年）
- 呂正惠：《殖民地的傷痕 臺灣文學問題》（臺北：人間出版社，2002年）
- 許南村編：《反對言偽而辯 陳芳明臺灣文學論、後現代論、後殖民論的批判》（臺北：人間出版社，2002年）
- 古繼堂：《臺灣小說發展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7月初版）
-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91年9月初版）
- 葉石濤：《走向臺灣文學》（臺北：自立晚報社，1990年3月一版）
- 王德威：《從劉鶚到王禎和 中國現代寫實小說散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6年6月初版）
- 王德威：《眾聲喧嘩 三〇與八〇年代的中國小說》（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8年9月初版）
- 王德威：《閱讀當代小說》（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1年9月初版）
- 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 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臺北：麥田出版公司，1998年10月初版）
- 王德威：《眾聲喧嘩以後 點評當代中文小說》（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1年10月初版）
- 張素貞：《細讀現代小說》（臺北：東大圖書出版公司，1986年10月初版）
- 張素貞：《續讀現代小說》（臺北：東大圖書出版公司，1993年3月初版）

- 張素貞：《現代小說啟事》（臺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年8月初版）
- 呂正惠：《戰後臺灣文學經驗》（臺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2年一版）
- 呂正惠：《小說與社會》（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年5月初版）
- 黃繼持：《魯迅 陳映真 朱光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公司，2002年初版）
- 陳義芝主編：《臺灣現代小說史綜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12月初版）
- 李瑞騰主編：《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評論卷(壹)》（臺北：九歌出版社，1989年5月初版）
- 楊 澤主編：《從四〇年代到九〇年代 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11月初版）
- 臺灣文學研究會主編：《先人之血，土地之花 臺灣文學研究論文精選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89年8月台灣版）
- 詹宏志：《兩種文學心靈》（臺北：皇冠出版社，1986年1月初版）
- 詹宏志：《閱讀的反叛 大致與小說有關的札記》（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9月初版）
- 龍應台：《龍應台評小說》（臺北：爾雅出版社，1985年6月初版）
- 何 欣：《當代臺灣作家論》（臺北：東大圖書出版公司，1983年12月初版）
- 劉春城：《臺灣文學的兩個世界》（高雄：派色文化出版社，1992年7月初版）
- 高全之：《王禎和的小說世界》（臺北：三民書局，1997年2月初版）
- 張大春：《張大春的文學意見》（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2年5月初版）
- 楊 照：《夢與灰燼 戰後文學史散論二集》（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年4月初版）
- 黃重添：《臺灣長篇小說論》（臺北：稻禾出版社，1992年8月初版）
- 黃重添等：《臺灣新文學概觀》（臺北：稻禾出版社，1992年3月初版）
- 詹宏志等：《文學的思考者 論陳映真卷》（臺北：人間出版社，1988年5月初版）
- 尉天驄等：《愛情的故事 論陳映真卷》（臺北：人間出版社，1988年5月初版）
- 張寶琴、邵玉銘、？ 弦主編：《四十年來中國文學》（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5年6月初版）
- 王震亞：《臺港小說二十家》（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年初版）
- 朱耀偉：《本土神話：全球化年代的論述生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年5月初版）
-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五十年來臺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一） 臺灣文學中的社會》（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6年6月初版）
- 陳義芝主編：《臺灣文學經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聯經文化事業公司，1999年6月初版）
- 陳麗芬：《現代文學與文化想像 從臺灣到香港》（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5月初版）

### 3. ？ ？ 嶄？

- 胡清輝：解讀西方影展的「中國熱」現象——一個後殖民的詮釋觀點（《東亞季刊》33卷1期，2002年1月）
- 廖炳惠：臺灣文學中的四種現代性——以《背海的人》下集為例（《中外文學》354期，2001年11月）
- 廖炳惠：從後殖民思潮看臺灣（《文化視窗》31期，2001年7月）
- 廖炳惠：後殖民研究的問題及前景：幾個亞太地區的啟示（《當代》121期，1997年9月）
- 高全之：閻王與小鬼——後殖民張論引起的省思（《當代》177期，2002年5月）
- 宋國城：後殖民理論在中國——理論旅行及其中國化（《中國大陸研究》43卷10期，2000年10月）
- 匡思聖：從後殖民理論論臺灣族群關係之辯證（《師大三民主義學報》21期，2000年9月）
- 胡衍南：（學人專訪）後殖民的省思——專訪李有成教授（《文訊》167期，2000年9月）
- 劉宏：隱喻象徵、後殖民變遷——中國與印尼的現代化論說（《香港社會科學學報》15期，1999年秋季號）
- 陳映真：等待清算的後殖民臺灣歷史——評「皇國少年」李登輝（《海峽評論》103期，1999年7月）
- 陳春燕：生活在去丫方——一位亞裔美籍作家看（後殖民情境的）書寫倫理（《中外文學》322期，1999年3月）
- 蔡瑞霖：文化交匯與世界主義之解消（《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5期，1999年1月）
- 江宜樺：當前臺灣國家認同論述之反省（《臺灣社會研究》29期，1998年3月）
- 盧莉茹：後殖民與生態——美國早期作家文本中的國族建構與生態破壞（《中外文學》307期，1997年12月）
- 簡瑛瑛：蝴蝶、石榴與黃玫瑰——試論《貪婪》中的（後）殖民論述與女性救贖（《中外文學》299期，1997年4月）
- 傅雋：跨越疆界的後殖民認同——從《大海螺》到《自由事業》（《中外文學》294期，1996年11月）
- 林文淇：殖民主義與法律——《印度之旅》對後殖民理論的省思（《中外文學》280期，1995年8月）
- 林耀福：後殖民迷情——惠特曼與美國國族認同（《中外文學》292期，1996年8月）
- 楊麗中：傅柯與後殖民論述——現代情境的問題（《中外文學》255期，1993

- 年 8 月 )
- 廖咸浩：南方異類 以後殖民視角看《悲情城市》與《牛棚》中的語言、沉默與歷史 (《中外文學》260 期，1994 年 1 月)
- 曾麗玲：起舞弄清影 西西的香港文本與後殖民地擬像(象) (《中外文學》298 期，1997 年 3 月)
- 陳長房：考掘地理、性別與文類的交集 論南非與西西印度群島的後殖民文學 (《中外文學》297 期，1997 年 2 月)
- 廖朝陽：異文典與小文學：從後殖民理論與民族敘事的觀點看《紅樓夢》 (《中外文學》299 期，1997 年 3 月)
- 朱耀偉：並置、含混、後殖民 從《暗戀( )桃花源》想起 (《中外文學》252 期，1993 年 5 月)
- 孟 樊：後殖民論述的文學觀 (《聯合文學》116 期，1994 年 6 月)
- 陳儒修：殖民論述三重奏 殖民、後殖民、去殖民 (《電影欣賞》82 期，1994 年 8 月)
- 陳儒修：電影研究中的後殖民論述 (《當代》89 期，1993 年 9 月)
- 邱貴芬：後殖民的臺灣演繹 (《十年來臺灣文化研究的回顧研討會論文集》，1999 年 9 月)
- 陳芳明：臺灣研究與後殖民史觀 (《歷史》105 期，1996 年 10 月)
- 蔡瑞霖：文化交匯的主體性之解消 從世界主義觀點到後殖民觀點 (《資料與研究》25 期，1997 年 1 月)
- 石之瑜：蔣夫人與中國的國家性質 後殖民父權文化的建構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4 期，1996 年 8 月)
- 陳建忠：末日啟示錄：論陳映真小說中的記憶政治 (《中外文學》32 卷 4 期，2003 年 9 月)
- 林麗如：以認真、嚴肅的態度思想與創作 專訪陳映真先生 (《文訊》196 期，2002 年 2 月)
- 邱亞才：論陳映真作品中的情意結 (《自立晚報》14 版，1988 年 8 月 4 日)
- 建 言：從陳映真小說《夜行貨車》談知識份子回歸鄉土與民族的問題 (《中外文學》8：5，1979 年 10 月)
- 李 堯：《夜行貨車》的意象和人物描寫 (《臺灣文藝》61 卷，1978 年 12 月)
- 林雙不：《夜行貨車》 (《書評書目》92 期，1980 年 12 月)
- 高天生：野火在暮色中燒 論陳映真的作品及其「轉變」 (《民眾日報》12 版，1979 年 4 月 27 日)
- 歐宗志：現代人的自覺 評《夜行貨車》 (《自立晚報》3 版，1979 年 7 月 15 日)
- 周宜文：《夜行貨車》開向何方 陳映真筆觸下流露的情感 (《自立晚報》3 版，1978 年 9 月 3 日)

- 迅 清： 陳映真的《夜行列車》（《更生日報》7版，1978年5月10日）
- 陳嘉宗： 生命的哀愁 讀《夜行貨車》（《民眾日報》12版，1980年6月21日）
- 羅夏美： 擊起黑暗的閘門 論陳映真的三篇小說新作（《國文天地》208期，2002年9月）
- 郝譽翔： 感傷的凝視 陳映真最新中篇力作《忠孝公園》（《聯合文學》201期，2001年7月）
- 李爽學： 遊園驚夢 讀陳映真的《忠孝公園》（《聯合文學》201期，2001年7月）
- 黎湘萍： 重返心靈的故鄉 重讀陳映真近年作品並論其新作《歸鄉》（《世界華人文學論壇》，2000年2月）
- 宇文正： 訪陳映真談近作《歸鄉》：第二問（《聯合報》37版，1999年9月23日）
- 林育慶： 從「批評歷史」的角度看陳映真三篇政治小說（《臺灣文藝》(新生版)166/167期，1999年2月）
- 杭 子： 一個無力的蒼涼的手勢：試評陳映真的政治小說（《自立早報》14版，1988年8月4日）
- 徐華中： 陳映真小說的文本訊息 以《將軍族》及《山路》為例（《勤益學報》13期，1996年2月）
- 歐宗智： 陳映真小說人物的女性自覺（《明道文藝》223期，1994年10月）
- 張錦郎、塗靜慧： 陳映真生平及作品評論資料目錄（《臺灣文學觀察雜誌》4期，1991年11月）
- 亮 軒： 淚眼問天天不語：陳映真著《第一件差事》（《愛書人》112期，1979年6月）
- 馬海僕： 一個市鎮小知識份子的心聲：評陳映真著《第一件差事》（《書評書目》35期，1976年3月）
- 張素玲： 走出水仙之湖：論陳映真筆下的死亡（《文風》33期，1978年6月）
- 范裕華： 試論陳映真小說中的“無意識”（《浙江社會科學》1999年3期，1999年5月）
- 盛昭國： 陳映真早期短篇小說之分析（《自立晚報》3版，1978年8月20日）
- 王震亞： 永遠的人文關懷 簡論陳映真小說的思想特質（《肇慶學院學報》23卷1期，2002年2月）
- 張雁泉： 試論陳映真小說中的人生救贖之路（《河南師範大學學報》28卷3期，2001年6月）
- 趙 非： 一取兩岸小人物的純情悲歌 評陳映真短篇小說《將軍族》（《河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7卷4期，2002年12月）

- 姜智芹：論陳映真小說創作中的“中國情結”（《東岳論叢》22卷2期，2001年3月）
- 簡偉斯：現代企業行為下的人：談陳映真的小說《華盛頓大樓》第一部《雲》（《文藝月刊》206期，1986年8月）
- 彭燕彬：勇闖夜行貨車的角色 論陳映真與其創作探索（《河南大學學報》42卷5期，2002年9月）
- 王向陽：陳映真藝術特質論（《婁底師專學報》3期，2002年7月）
- 顏敏：尷尬的力量 從陳映真小說中的父性權威看其敘事的尷尬（《華文文學》54期，2003年1月）
- 漁父：憤怒的雲：剖析陳映真的小說（《中國時報》8版，1984年1月21日）
- 胡民祥：三度思維空間的《山路》（《新文化》5期，1989年6月）
- 張國禎：這是什麼樣的一條「山路」？評陳映真小說《山路》（《自立晚報》14版，1988年11月10日-13日）
- 劉慧媛：惘然記：讀陳映真的小說《山路》（《自由時報》11版，1988年6月1日）
- 葉石濤：解剖歷史的病灶：論陳映真的三個短篇（《中國時報》18版，1988年8月6日）
- 楊照：純真理想的典型塑造 陳映真的《鈴鐺花》（《中國時報》37版，1999年7月7日）
- 焦慧蘭紀錄整理：倉惶的年代：陳映真《鈴鐺花》的歷史處境（《幼獅文藝》496期，1995年4月）
- 水晶：「才女」外一章（《中國時報》12版，1974年1月21日）
- 廖炳惠：下一輩生命理想的迷失？評陳映真的《趙南棟》（《聯合文學》35期，1987年9月）
- 黃凡、廖仁義、康來新：筆在原地，意念先行：評陳映真的《趙南棟》（《自立晚報》6版，1988年12月4日）
- 郝譽翔：我是誰？！（《中央日報》19版，2002年1月7日）
- 葉石濤：評《人生歌王》（《文訊》30期，1987年6月）
- 余玉照：王禎和的語言實驗 評《人生歌王》（《聯合文學》3:8期，1987年6月）
- 鄭樹森：王禎和遺作《兩地相思》（《聯合文學》9:7期，1993年5月）
- 蕭錦綿：滑稽多刺的玫瑰 細談王禎和的新作《玫瑰玫瑰我愛你》（《新書月刊》10期，1984年7月）
- 賴松輝：《玫瑰玫瑰我愛你》書中的敘述模式（《文史論集》創刊號，1990年1月）
- 東年：美國美國我愛你 鬧劇《玫瑰玫瑰我愛你》的荒謬寓意（《聯合文學》7:2期，1990年12月）

- 章正忠：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的語言藝術（《中國語文》550期，2003年4月）
- 李文卿：走過殖民 論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之諧謔書寫（《文訊》206期，2002年12月）
- 蔡芳定：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的小說藝術（《中國學術年刊》17期，1996年3月）
- 陳瓊琪：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的敘述形式（《中山中文學刊》4期，1998年6月）
- 劉恆興：臺灣現代文學(9) 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中的諷刺特徵兼論中國傳統文學的諷刺技巧（《國文天地》153期，1998年2月）
- 許琇禎：多語言的文化衝突 王禎和小說研究（《中國學術年刊》20期，1999年3月）
- 鄭恆雄：論王禎和《美人圖》的意圖和文學效果（《中外文學》225期，1991年2月）
- 尉天驄：消費文明下的屈辱與憤怒 談王禎和的 小林來臺北（《聯合文學》7:2期，1990年12月）

#### 4. ？ ？ 嶄？

- 蔡碧華：從社會語言學觀點剖析王禎和的小說「玫瑰玫瑰我愛你」（輔仁大學語言所碩士論文，1987年）
- 李宜靜：王禎和小說研究（東吳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4年）
- 劉玟伶：王禎和作品論：小說、劇本與影評（清華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6年）
- 呂文翠：狎呢故鄉 王禎和小說研究（淡江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8年）
- 林增益：王禎和小說創作風格析論（南華大學文學所碩士論文，2003年）
- 李俐瑩：臺灣寫實小說中的風塵書寫 以王禎和、黃春明為例（臺灣師範大學中文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3年）
- 羅夏美：陳映真小說研究 以盧卡奇理論為主要探討途徑（成功大學史語所碩士論文，1990年）
- 蘇慧雲：紅色的執著與白色的焦慮 陳映真及其小說研究（成功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97年）
- 管永仲：陳映真小說主題研究（華梵工學院文學所碩士論文，1997年）
- 曾萍萍：陳映真小說與後殖民論述（彰化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00年）
- 宋玉如：陳映真文學作品思想探討（文化大學文學所碩士論文，2002年）
- 林碧霞：陳映真小說中意象的研究（文化大學文學所碩士論文，2004年）
- 劉依潔：人間雜誌研究（東吳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0年）

方婉禎：從城鄉到都市 80 年代臺灣小說與都市論述〔淡江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2 年〕

楊曉琪：鄉土文學論戰暨 70 年代的文學場域變遷〔暨南大學中語所碩士論文，2002 年〕